

毛泽东哲学思想精髓

主 编 宋一秀
作 者 (以姓氏笔划为序)
冯国瑞 宋一秀 陈葆华
陈战难 张文儒 郭建宁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新登字（京）15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宋一秀主编.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

ISBN 7-301-02185-2

. 毛...

. 宋...

. 毛泽东思想：哲学思想-研究

. A841 . 63

书 名：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

责 任 者：宋一秀

标准书号：ISBN 7-301-02184-2/ B·126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100871

排 印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6.375印张 420千字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定 价：13.30元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的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邓小平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核心,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书中对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体系、内容、特点、发展过程和历史地位,作了独具特色的探索和研究。全书共分三篇,一是总论篇,二是基本理论篇,三是实际运用篇。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展开了多方面的深入的论述,并揭示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书中用专章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阐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书体系新颖,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哲理性强,是一本系统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和发展规律的最新力作。

目 录

前 言.....	1
----------	---

总 论 篇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	2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2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3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5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8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8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	12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19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23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始萌芽	24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26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31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36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42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49
一 具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49
二 对主观主义作了深刻批判的哲学	51
三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哲学	52
四 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哲学	53
第五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54

一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55
二	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57
三	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59

基本理论篇

第二章	毛泽东唯物论思想	64
第一节	物质与精神	64
一	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二性	64
二	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67
三	精神对物质可以起反作用	69
第二节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70
一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	71
二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75
三	物质世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学说的重要意义	77
第三节	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	80
一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80
二	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	83
三	坚持唯物辩证的物质运动观	85
第四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87
一	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87
二	共产党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基础	92
三	思想战线上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	93
四	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方法	94
第三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102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102
一	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103
二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104

三	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的钥匙	105
四	对立统一规律也是认识的根本规律	108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	110
一	矛盾普遍性含义的科学规定	110
二	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述	113
三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119
第三节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124
一	矛盾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基础	125
二	系统论述了主要矛盾的理论	126
三	详细阐明了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129
第四节	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的理论	132
一	矛盾同性含义的深刻概括	133
二	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和条件性	135
三	同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137
四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139
第五节	对立统一的范畴论	142
一	量变与质变	143
二	肯定与否定	145
三	本质与现象	149
四	主流与支流	151
五	内容与形式	152
六	可能与现实	154
第四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158
第一节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158
一	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认识路线的界限	158
二	划清了能动的反映论与形而上学反映论的界限	159
三	划清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与不可知论的界限	162
四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概括的理论贡献	162

第二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164
一 什么是实践?	164
二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69
三 实践观点与天才问题	175
第三节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180
一 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	180
二 认识的多次反复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185
三 真理发展的规律	189
第四节 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	194
一 规律是客观的发展的	195
二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东西.....	195
三 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自觉能动性	197
四 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199
第五节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202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202
二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	202
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	204
第五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	206
第一节 社会革命论.....	206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207
二 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三大法宝	213
三 人民民主专政学说	217
第二节 社会基本矛盾.....	221
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提出	221
二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主要内容	223
第三节 两类社会矛盾.....	225
一 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与形成	225
二 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基本内容.....	227

第四节 党的群众路线.....	230
一 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形成	230
二 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	232
三 在新时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237

实际运用篇

第六章 毛泽东领导方法论.....	242
第一节 必须讲究领导方法.....	242
一 方法与领导方法	242
二 领导与领导方法	244
第二节 三个基本的领导方法.....	249
一 实事求是的方法	249
二 群众路线的方法	258
三 独立自主的方法	267
第三节 生动具体的领导方法.....	272
一 调查研究,多谋善断	272
二 “弹钢琴”,“两条腿走路”	276
三 胸中有“数”,留有余地	279
四 不断革命,波浪式前进	281
第七章 毛泽东党的建设辩证法思想.....	285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	285
一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285
二 抓紧抓好党的组织建设	291
第二节 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	300
一 党内矛盾的根源和特点	300
二 党内斗争与党内团结的辩证关系	307
三 必须正确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	311

第三节	党的建设与反倾向斗争.....	317
一	“左”右倾向的界定.....	317
二	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319
三	一种倾向常常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322
四	反倾向与反派别.....	325
第八章	毛泽东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	327
第一节	政策和策略的客观依据.....	327
一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	328
二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与策略.....	330
第二节	政策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332
一	坚定的原则性.....	333
二	必需的灵活性.....	334
三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	335
第三节	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	339
一	社会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	339
二	统一战线的具体斗争策略.....	343
第四节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	356
一	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356
二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358
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	361
第九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364
第一节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364
一	战争的起源.....	365
二	战争的本质.....	367
三	战争中经济与政治、人与物的辩证关系.....	369
第二节	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特殊性.....	372
一	战争是发展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是发展的.....	372
二	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指导规律的历史演变.....	375

三 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378
第三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性	381
一 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382
二 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	384
三 兵民是胜利之本	387
第四节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辩证法范畴	390
一 全局与局部	390
二 量与质	393
三 得与失	396
四 进攻与防御	398
五 主动与被动	401
第十章 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	405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405
一 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特殊性	405
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点	409
三 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历程	412
第二节 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	416
一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416
二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421
第三节 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初步阐述	426
一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	426
二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429
三 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	432
四 大、中、小企业	435
五 实现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	437
第四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哲学意义	438
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客观依据	439
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争取外援的相互关系 ...	442

第十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446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发展.....	446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446
二 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	448
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新发展	450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454
一 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	454
二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	456
三 具体分析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460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	462
一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改革的理论基础	462
二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465
第四节 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468
一 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一个过程	468
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472
第五节 社会主义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的再认识.....	476
一 阶级斗争问题的再认识	477
二 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478
三 利益矛盾与两类矛盾	481
第六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483
一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483
二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488
结束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493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贡献.....	493
二 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	499
三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哲学基础	504
四 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武器.....	506
后 记.....	508

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成果为基础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定历史时代需要的产物，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且是以中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以中国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种种成果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中华民族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其优秀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种哲学理论像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发挥过如此巨大的作用。其所以如此，因为它是科学的真理。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46—47页。

发展系统,不是僵化系统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一个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的僵化的系统。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它过去是,今后仍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早在 60 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关于读书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马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科学理论发展的辩证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了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从而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应有的权威。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断推向前进。应当指出,它的主要历史篇章,不应局限于过去,而应着眼于未来。实践终将谱写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贯穿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始终的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这是因为,毛

转引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 年版(下同),第 35—36 页。

泽东思想,同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否定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容许的。因此,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就能够正确地阐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就能够指导我们找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就能够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未来。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的历史规律。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概括地回顾了我党建国以前 28 年的革命实践斗争的曲折前进的历史;科学地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 32 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实事求是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原则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活的灵魂和科学体系,从而为系统地展开阐述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指明了正确方向。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也无论是对内或对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都一再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下同),第 36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 158—159 页。

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为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理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实践表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在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纪念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实践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撰写这部《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既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百周年华诞,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同志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系统地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让我们世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断开拓前进。

总 论 篇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具有严谨的科学体系。早在 1977 年,邓小平就倡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要全面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首先应当了解它形成的历史条件、理论渊源、发展过程、基本特点及其精髓。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40—41 页。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 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许多哲学理论问题上,都富有自己的系统性、鲜明性和创造性的特色。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行动指南,或者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是联系中国革命经验来论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所固有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反之,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能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和特征,也就不能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曾说:“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又说:“任何真正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定时代自然、社会和思维矛盾运动的概括和总结。因此，要准确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必须把握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时代特点

我们研究哲学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都必须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揭示时代的特点。伟大的时代必然产生伟大的哲学思想，离开一定时代，就不可能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并确定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马克思说：“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和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时，无产阶级革命还处于准备时期。怎样使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优秀成果，总结了西欧各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无产阶级创立一个崭新的科学的世界观。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

列宁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阶级斗争日趋尖锐，革命浪潮逐步高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此时无产阶级革命已由准备时期进入直接实践时期。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时代向革命者提出的一个新课题。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回答了时代提出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问题。他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生活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开创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有的矛盾缓和了,有的矛盾激化了。十月革命大大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事业,此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已不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范畴了。对此,列宁深刻指出:“东方觉醒之后,现代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还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毛泽东也指出:十月革命后,“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可见,十月革命后,时代给革命者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何进行革命这一崭新的重大课题,这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困难而又特殊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时代提出的历史任务。

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而又激烈尖锐的矛盾,成了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的对象。帝国主义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7页。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680页。

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地揭示了这种矛盾交错的情景。他指出：“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紧接着，毛泽东指出，伴随着上述矛盾的发展，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反动政府与士兵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就能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就能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很快就会到来；全中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这样，中国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时代条件。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阶级基础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0—101 页。

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的输入,逐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由此,中国工人阶级也随着在官僚买办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相互间的火拼,乱作一团无暇东顾时,中国民族资本趁机发展起来,同时日本和美国的企业也迅速增长。民族工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共同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日益成长和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50万至300万人,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造船、纺织等产业部门。

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是一个崭新的劳动阶级,它具有世界各国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许多突出的优点。这就是:

其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其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

其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645页。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时起,就勇敢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规模也日益扩大。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我国工人阶级进行过多次罢工、起义,并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罢工斗争共计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的短短几年中,罢工斗争就达到130多次,罢工的规模也一次次扩大。历史的发展,要求正在迅速成长的中国工人阶级起来取代资产阶级担当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正面临着新的转折点。

1917年10月,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始了。在十月革命以前,先进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为挽救祖国的危亡、民族的苦难,争取独立和解放,曾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企图仿效欧美资产阶级共和国,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们一次次的努力,一次次的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民族危机一天天加深,祖国前途一天天危急。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了产,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先进的中国人总结了多次斗争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新的阶级力量,以指导和领导新的革命斗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五四”运动中,经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宣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并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趋势。这一方面,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另一方面,加速了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就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恩格斯曾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这表明,任何真正的哲学,它的产生和发展,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新,除了为一定时代所规定和一定阶级利益所制约以外,还有其思想理论渊源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哲学是现实斗争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又是人类认识成果的继续和发展。任何一个哲学家,如果不从一定的思想资料出发,都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或哲学体系。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也有它的理论渊源和实践的需要。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5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关系。它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一致的,同属于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而决不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列的另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然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决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重复或机械套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回答了新问题,概括了新经验,增添了新内容。因此,任何企图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或者妄图抹煞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都是极端荒谬的。

十月革命后,特别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开始运用唯物辩证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周恩来则在敌人的监狱里同难友们举行的讲演会上,系统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宣称:“到了 1920 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 1921 年复蔡和森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此外,诸如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也都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从 1920 年读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起,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研读马列著作。他读马列著作的特点是,有重点地读,认真反复地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地读。他对恩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下同),第 39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下同),第 1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这几本书爱不释手，一直带在身边，甚至在长征路上，患病的时候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

到了延安，毛泽东广泛搜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的书，包括马列的原著和阐述马列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应邀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去讲授辩证法唯物论。他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分三章，分别为：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自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曾详细读过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并写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他在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批评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揭露了他们在思想方法上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曾说过：将来有可能，准备写一本“善于讲解的辩证法”教科书。可惜，这个宏愿未能实现。

毛泽东不仅自己发愤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鼓励有学习能力的干部学哲学。住在杨家岭的那段时间里，他每星期三晚上召开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参加哲学座谈会，推动干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党、政、军干部学哲学热潮初步形成以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下同），第67—68页。

后,又提出成立新哲学学会,倡议召开新哲学年会,并号召大家积极学习新哲学,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学习活动。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这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重新阅读的。他读得很认真很仔细。1948年4月,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他重读了《“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并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并指示中宣部,要求全党学习。

解放后,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著作。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极左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多次研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详细批注与长篇评论。他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的必然性,批评了那种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错误观点。他强调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至今还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一生都反复申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宇宙观。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

错误。” 他一再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他强调指出，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都要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都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

可见，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要创立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哲学体系，相反，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因此，那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歪曲为“中国农民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的观点，是极端错误和毫无根据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毛泽东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又不迷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本”。他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而且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色。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并不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毫无关系。相反，它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

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主张废除洋八股，反对唱空调，“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等，都有相当精湛的造诣。周恩来说得好：“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哲学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从而能运用自如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的民族形式、作风和气派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

中国的哲学遗产是异常丰富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精神文明的民族，也是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辩证思维的优秀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广。毛泽东以中国革命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不仅改造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而且也批判地引用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反证唯物辩证法的正确，从而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对古典哲学中朴素唯物论和认识论的改造与吸收。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大致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繁荣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大部分已提出来，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这在世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53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3页。

界哲学史上是少见的。中国古典哲学中有着朴素唯物论、认识论的优良传统。从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孙武的唯物主义、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直至集古典唯物主义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唯物论的传统从未间断。毛泽东从中吸收了大量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赋予崭新的意义。

最突出的事例之一,是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发挥,并一再运用。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把“实事求是”提到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的高度,并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赋予新意的解释,不仅把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点用民族化的语言作了深刻的表述,而且指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批判地分析、总结和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如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的孔、墨开始,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观。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观点。他撰写的《实践论》在革命实践基础上,吸收了中国哲学的优秀遗产,充分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从而使几千年来中国古典哲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得到了科学的解决。

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论军事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名言,这是反映战争规律的朴素认识论思想。毛泽东把它誉为“科学的真理”。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

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这就把战争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高度结合起来,揭示了战争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毛泽东指出,任何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问题的。

(二) 对古典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改造与吸收。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产生前近半个世纪,中国就出现了哲学思想的萌芽,在《周易》、《尚书》、《诗经》等典籍中,就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英国著名学者 T.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经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改造,而后又转向了它的发源地。这个看法是颇为深刻的。从古代的《周易》、《孙子》、《老子》起,直至集古典朴素辩证法大成的王夫之,其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从未中断过。毛泽东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料,通过改造使其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

中国古代辩证法最杰出的成就之一,是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对立面之间的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和相互转化,并看到了事物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源泉。毛泽东经常引用中国古典哲学、历史文献和成语典故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和提高,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赋予它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

《周易》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部算卦(卜筮)的书。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我国《周易》思想时,曾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在讲到辩证法的两点论和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的对立时说:“一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0页。

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经过毛泽东的阐释,就把古代的阴阳学说与辩证法的两点论联系起来,并有了新的内容。

《孙子兵法》是孙武对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战争经验的总结。它是一部论战争的书,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所以它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在中外军事史和哲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译成法、英、德、日、俄等国文字,广泛流传,至今不衰。孙武主张从事物内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促使矛盾的转化。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提出了许多矛盾对立的范畴,并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了一整套朴素的辩证法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无疑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但也不能否认吸收了孙子等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讲演中,就剖析了敌与我、全局与局部、前方与后方、主观与客观、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主攻与助攻、集中与分散、持久与速决、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等 35 对矛盾。毛泽东提出的“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以一当十,以十当一”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等等,可以说是在现代革命战争中,对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继承与升华。

《道德经》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重要著作。在这里,老子看到了许多对立的事物和概念,都是互相依赖和互相转化的。它对人类的认识 and 我国哲学思维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老子对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都看作是无条件的、自然而然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说明。毛泽东改造和吸收了老子的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0 页。

辩证法思想,并给予科学的解释。比如,他在讲到好与坏的辩证法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明确指出了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毛泽东历来重视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深刻阐明了对立双方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原理,这除了总结实践经验以外,无疑也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合理思想,并加以改造和提高。

(三)对古代文化典籍中言简意赅而又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成语典故的改造和发挥。

毛泽东的文章、讲演和报告中,经常引用古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富有哲理的警句、名言,以及散见于文艺、历史等著作中的成语、典故,民间的谚语、寓言、故事等,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原理,令人感到生动有趣,亲切易懂。比如,他引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说明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引用“闭目塞听”,来比喻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引用“一知半解”、“一孔之见”,来说明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引用“削足适履”,来比喻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引用“初出茅庐”、“纸上谈兵”,来比喻新手缺乏经验,空发议论;引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来说明指挥员是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的措施,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等等。所有这些,都形象生动地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道理。

毛泽东还广泛引用许多富有辩证法思想的名言,来说明深奥的哲理。比如,他引用“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说明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引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引用“物极必反”,来说明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引用“因势利导”,来说明只有根据事物发展的趋势加以引导,才能取得预

期的效果；引用“犬牙交错”，来形容矛盾错综复杂的状况；引用“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来说明要全面地看问题，切忌主观片面性；引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来比喻只见局部，不见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引用“曹刿论战”的故事，来说明战争发展不是“一”字形而是“之”字形；引用“后发制人”，来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先退让一步，然后创造条件去歼灭敌人；引用“出其不意”，来说明在敌人料想不到的情况下进行袭击；引用“兵不厌诈”、“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来说明用兵作战要尽量运用计谋去迷惑敌人；引用“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来说明动与不动的辩证关系；引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说明对敌斗争中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经过毛泽东的改造、扬弃，都加进了崭新的内容，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大放异彩。

毛泽东为了更生动地说明辩证法所说的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和有条件的。他引用神话中的许多变化，来和辩证法的矛盾转化加以比较区别。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所说的矛盾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的矛盾及其转化，不是具体的、现实的矛盾和转化，只有科学地反映客观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及其转化，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辩证法。

由此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有着客观的联系，因而使它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及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但我们决不能夸大这种联系。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虽然，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长过程中，蕴藏

着许多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但始终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以后,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什么“儒家哲学”、“孔孟哲学”的论调,是违背事实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化、民族化的形式的统一,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具有的中国特色。所以它能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喜爱,并容易掌握、理解和适用,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深刻说明,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所固有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是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它对这种“结合”作了充分的哲学论证,对如何实现这个“结合”作了方法论上的系统总结。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不会有毛泽东哲学思想;而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能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和特征,也就不能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杰出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毛泽东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说过,《毛选》是由血写成的。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人民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撰写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党建、文化和哲学等方面的论著,均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这些理论和经验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作出新的理论创造。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过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这“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错误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结果;也是指导新的伟大斗争和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如果把它们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们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没有亲身参加领导中国革命的人,没有同陈独秀、王明等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杰出的哲学论著的。然而,国内外的某些人把“两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重复,是外国哲学教科书中理论观点的“抄袭”。如果这不是蓄意的歪曲,就是十足的无知。

应当指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邓小平也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一论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观点,在党的七大以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这就是说,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并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由此,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一集体创造的科学体系是公正的。

毛泽东本人从来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他个人智慧的产物。早在40年代初,当毛泽东思想这类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他还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为党了。”在1948年8月给吴玉章的回电中,他不仅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而且还指出:“‘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建国后,1960年底,他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时,在文件论述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的地方,亲笔增加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一语。1964年3月,他在谈到《毛泽东选集》时,也说过:《毛选》哪是我一个人的著作啊,《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979年9月,党的十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9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03页。

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叶剑英在庆祝国庆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考虑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作为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他们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成果,为毛泽东总汇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例如,关于中国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自党成立后,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作过探讨,尽管他们的思想不太系统、不太完整,但都为毛泽东创立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又如,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正是毛泽东总结了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提出来的。

其二,他们对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在某些方面的卓越见解,被汲取或概括在毛泽东的论著之中。例如,1929 年秋,在周恩来主持下,陈毅代表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其中不少重要思想(如群众路线)被毛泽东汲取在他起草的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刘少奇提出的关于白区对敌斗争的许多策略思想,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章中也加以吸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等同志提出的游击战的许多战术思想,毛泽东加以理论概括形成完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等等。

其三,他们参与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有些著作就是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合作写成的。例如,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研究,刘少奇、周

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3 页。

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和毛泽东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建国后,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其四,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某些方面的经验所作的系统总结,对毛泽东论著中的观点,或者作出补充、丰富、发展,或者作出精辟的论述,或者说明了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白区工作、关于科学文化和知识分子工作、关于外交政策的论述;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工人运动的论述;朱德关于军事工作的论述;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论述等等,有许多内容是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这些论述,同毛泽东本人关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论述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观点,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此外,党中央总结的一些革命经验,提出的重大理论原则,制定的重要政策,在党的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文件和文献,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大飞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运用和重大发展。

第三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开始萌芽于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达到形成和系统

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在建国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了艰难前进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开始萌芽

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党的成长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称之为党的幼年时期。他说:“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这就指明了党的幼年性的具体表现,一是革命的实践经验非常缺乏;二是对中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没有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这一阶段里,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但它在中国革命的沃土上已经开始萌芽了。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初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开始致力于认识中国社会,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源泉,必须用革命手段消除列强在华特权,肃清军阀势力,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同年7月,党的“二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0页。

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走。先是,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然后,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回答中国革命提出来的问题。这就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

(二) 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中国民主革命领导权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机会主义观点,表现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他们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从不同的方面否定或架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学;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为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是当时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纲领性文献,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阶段。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 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在我党幼年时期,在农民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从不同的两个极

端否定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为了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指责和诽谤,毛泽东亲自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经过32天的实地考察,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是当时调查研究农民问题的一篇杰作。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并指出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态度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实际发挥,是战斗唯物主义的生动体现。

实践表明,毛泽东从党的创立时候起,就逐步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越代表。从1921年党的诞生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开始结合,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对实践经验在哲学上作出了一些概括和总结。但由于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还没有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还没有形成,但从实际出发、阶级分析和群众路线的观点已初步形成,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有了重要萌芽。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血的教训。经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党懂得了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紧紧依靠农民开展武

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随后,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大小 200 多次的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正是有这样大规模的革命实践,为迅速找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中国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陈毅曾说:“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在政治上,我党先是犯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随后犯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在军事上,我军经历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哲学上,苏联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在我们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这种“左”倾错误的主要特征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共产国际的指示是通过王明等代表人物来贯彻执行的。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中,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形成并达到了系统化。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开辟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转引郭化若:《毛主席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载《中国哲学》第 1 辑,第 33 页。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战争环境中,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写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分析了国内外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政治路线。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最杰出的创造和发展。它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

(二) 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创立了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和策略。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召开“九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史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它奠定了我军的建军路线和建军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和资产阶级建军思想的原则界限。早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就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此后,逐步制定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运用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

出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过程；论述了战争中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指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阐明了战争的全局与局部辩证统一；指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贡献。

（三）分析国内外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策略。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他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根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在不同时期，这种根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会发生变化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由此引起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根本矛盾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矛盾、中国人民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相对地下降为次要矛盾。他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分化，指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批评了那种“左”倾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他依据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对地主买办阶级内部矛盾及其变化作了科学分析，提出要善于利用和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总之,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动,论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郑重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和危害性,特别批评了“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思想,同时,他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这种对形势、矛盾的辩证分析,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对党的政治策略作出了完整的分析,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四) 揭露教条主义的错误,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1930年5月,毛泽东从哲学的高度对党的实践斗争经验作了概括,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调查工作》)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的哲学总结,它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首先,它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其次,它首次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其三,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同时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另一条是从本本出发按“既定办法”办的保守思想路线。它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表明,本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同党内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哲学概括和总结,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撰写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论文,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两论”紧紧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划清了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和形而上学思想路线的界限。它们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1927年8月至1937年8月,在这10年的时间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系统化时期。同前一时期相比,它的内容更深刻、更充实、更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反映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也反映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1937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时期。这是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内容最丰富多采和多方面展开的时期,同时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生动证实和发展的时期。

这个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更系统更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就是在这个时期分别得到深刻论证的。在本世纪的40年代初，毛泽东思想最终为全党所公认，被确定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已达到了完全成熟，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发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1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党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重要报告。在这些文献中，指明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阐明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强调了必须在实践中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是反对唯心论宣传唯物论、反对形而上学宣传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端正全党思想路线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明确规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在经过长期革命实践斗争考验，并一再证明其为科学真理以后，为全党一致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

（二）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军事运动，完整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

为了正确指导抗日战争，批判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战争问题。他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

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战争的客观规律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并论证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又撰写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略进攻学说,制定了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得到了充实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三) 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形成了独特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毛泽东历来强调在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原则。在《论政策》和《不要四面出击》等一系列论著中,他明确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在统一战线和对敌斗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例如,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有理、有利、有节;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面,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予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深刻

阐明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辩证法。

(四)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

毛泽东从参加革命第一天起,就致力于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在深入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他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批判了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精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方面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五) 依据历史辩证法,阐明了革命转变论,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早在抗日战争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作了系统的论述。而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继续阐明了革命转变的根据和条件。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

报告,及时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政策;阐明了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内在根据、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他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里所说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主要矛盾。这就阐明了革命转变的基本原因,说明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国家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新中国诞生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各个阶级在政权的地位怎样,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如何,国家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是全国人民极为关心的重大问题,迫切要求作出及时的明确的回答。为了正确回答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为了抨击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的错误观点,为了驳斥国内外反动派的攻击和诬蔑,也为了答复国际朋友的关心,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的时候,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深刻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这是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光辉范例。

(六) 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化为科学的方法论,形成了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怎样把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一贯强调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早在 30 年代初,他就提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

在 40 年代,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的工作经

验,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的工作方法》等文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他在 1958 年和 1959 年,先后拟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和《工作方法十六条》等文件,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创立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辟了更加广阔和现实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独具特色的新贡献。

综上所述,在这 12 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和深入,我党的革命实践愈来愈丰富,这些都反映在毛泽东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中。因此,在这个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更深刻、更完整,在体系上更严谨、更系统,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76 年 10 月,在这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曲折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又可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 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10 年,以及“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

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有正确的和错误的两部分,二者往往交错在一起。我们必须把正确和错误区分开来,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分开来。毛泽东在晚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还增添了不少光彩夺目的新内容,同时,在他的言论中也存在着一些背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错误论断。然而,即使他犯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还始终坚信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正是他晚年的悲剧所在。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增添的新内容,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这些思想,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

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完成以后,党及时地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我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创造性运用的杰出范例。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课题。1956年初,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应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亲自听取了工业、农业、商业、财政、运输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久,他集中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薄一波等人的意见,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即十大矛

盾。他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十大关系,是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形而上学错误倾向提出的,是为了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十大关系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从而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

50年代,国内外许多人,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早在50年代以前,苏联某些党政领导人和哲学家们就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只有统一、只有差别。他们认为,发展已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是差别的统一和融合。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彻底背叛。毛泽东针对这种公然抹煞矛盾,反对辩证法、鼓吹形而上学的思潮,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确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具体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创立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从而科学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

(三) 揭示了人类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

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2年1月,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人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他举民主革命为例说,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此,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他深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总结。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发展的规律。他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毛泽东通过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又反对了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错误倾向,指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对

转引《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0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83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自由和必然这一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四) 揭示了形成正确认识的多次反复性,阐明了物质和精神辩证转化的规律。

1963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对《实践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毛泽东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这篇文章简洁明晰还不足一千一百字,但思想容量很大、很丰富。它批判了唯心主义认识论,指出正确的认识只能从实践中来;阐明了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转化,指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阐述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指出了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等等。总之,它不仅揭示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也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分过程,从而把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辩证运动,简明扼要地叙述出来了,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1963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文中,指出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有许多人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1964年8月,他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分别谈到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关于认识主体不仅是个人,而且是阶级、政党、群众;关于“认识工具”的作用,以及“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观点,提出了很有价值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思想。同年9月,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 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

(五) 批判了唯心的先验论和英雄史观,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

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抡班夺权的野心,事先密谋炮制了一份“称天才”的材料,竭力鼓吹天才论。为了戳穿他们的罪恶用心,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认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的先验论,还是唯物的反映论?还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就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破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称天才”的真面目。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唯心论的英雄史观,坚持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这就把认识论中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历史观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了起来。

(六) 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斗争,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壓力,准确地把握世界形势的新发展,确立我国对外关系的新格局,作出了高度的评价。早在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两种矛盾、三种力量和中间地带的理论。进入60年代,国际政治力量、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变化,到了1974年2月,他就完整地提出了划

分三个世界的正确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为国际反霸斗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这个发言,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从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结成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这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代各种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的结果。实践表明,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里,尽管毛泽东哲学思想走着艰难前进的道路,但它还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新内容、新思想,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应当指出,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上,虽然他一再重申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但在实践上却往往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从实际出发,过分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虽然他坚持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正确观点,但有时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倾向;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有时夸大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用的倾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上,背离了“八大”的科学分析,作了违反客观实际的估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招致了严重失误,付出了重大代价。我们应当认真分析这些错误,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找出它的规律性来。由于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认识上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范畴,所以我们应当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观点严格区分开来。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毛泽东思想继续推向前进，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论著和党的历次会议的文件中。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上，为重新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进行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确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指出了不解放思想，不冲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束缚，就无法拨乱反正，也无法开创新局面。但是，解放思想必须符合而不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那种歪曲解放思想的方针，把它曲解为随心所欲，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只能有害于党的事业，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这就把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提高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提高到是否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发展。

(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是当年毛泽东探索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和发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定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不断充实和发展,但它的基本点已初步形成。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总结了10条。在12大报告中,则规定了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并且指出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的几个重要原则问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纲领。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这个阶段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肯定我们党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理论观点,共列举了12个方面,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国前进的轨道。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从 1991 年到本世纪末,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制定和实施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必须遵循正确的指导方针,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这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划了更加明确的基本任务和方针政策。

江泽民在庆祝党的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提出了基本要求,并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加强这三方面的建设,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关于祖国统一的问题等九个方面。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杰出贡献。

(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深化和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并未丧失它的真理性,正确认识 and 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也是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理论前提。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和邓小平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面情况,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方针、政策、途径和方法,它已成为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重要理论依据。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进一步总结了30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从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我国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党的十三大、十四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曾经提出过一系列的正确思想,但在一个时期里有严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对我国现阶段的两类社会矛盾进行了再认识,揭示了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特点和规律,重申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四) 提出建设高度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思想。

党中央和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思想。邓小平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1—282、293页。

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就深刻说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大关于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决策,根据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根据我国全面改革的要求,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着重解决了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和全局性的认识问题。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于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深化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体制和统一战线理论。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

务具有重要意义。《意见》指出，实践证明，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是维护我国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和平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人民政协是我国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实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同人大、政府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政治协商、互相监督是我党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党的总路线、总任务和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因而，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及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宜宽不宜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颠覆和“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实践证明，中国各族人民、各党派、各团体，只有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任何困难，去夺取胜利。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1页。

人,从多方面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范例,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不断开放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就其思想体系来说,它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具有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例如科学性、实践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等等。

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发展着的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它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不同的,它所遇到的主要思想论敌是不同的,因而它所强调和发挥的侧重面也是不同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也就必然表现出相对不同的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中国土壤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它最本质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概括。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其基本原理是一脉相承的,同属于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反映了中国的特点,带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从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有多方面的重要表现。

一 具有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集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型。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还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就深刻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此,从思想内容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就在于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活动,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所说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指对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从理论上作出科学的回答和系统的阐述。其一,根据实践的发展,创造性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民民主专政学说、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等等;其二,根据实践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并加以系统化,如《实践论》、《矛盾论》等等;其三,根据实践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新领域,提出新领域的新理论,如毛泽东军事辩证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第335页。

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政治工作辩证法、国际斗争辩证法、唯物辩证的工作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的独特范例,具有中国的鲜明特色。

二 对主观主义作了深刻批判的哲学

哲学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党内突出地表现为对于主观主义的批判和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原则在中国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但在本世纪 20、30 年代妨碍这种“结合”的主要思想障碍,是主观主义思潮。这种主观主义不是社会上那种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而是在革命实践中、在党内表现出来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这种情况,就决定毛泽东的哲学活动,不能不以扫清主观主义为主要目标。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其批判锋芒主要地都是针对主观主义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以王明为代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实质、根源、危害性,以及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从哲学上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述。他指出,主观主义的实质,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他把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提到坚持党性的高度,深刻揭露了主观主义的危害。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

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因此,从社会作用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就在于要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把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批判背离这种结合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倾向,为我们如何实现这种结合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为此,毛泽东十分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 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的哲学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他还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刘少奇说:“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815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页。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强调共产党人要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要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因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原理的简单运用,而是依据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综合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一贯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多次号召哲学要从课堂上和书斋中解放出来,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深奥的哲理,把它变为群众所掌握的实际哲学、应用哲学。毛泽东历来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论的完整体系。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显著特色和杰出贡献。

四 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哲学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批判地改造和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不能不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8年10月,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周恩来也说:“毛泽东思想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运用到中国的土壤上。”刘少奇说得更明白: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同样,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典型。所谓民族化,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既要批判地汲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又要改造运用它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并赋予它崭新的内容。

中华民族的哲学发展史表明,它素有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的思维特点,它常常与伦理、道德、思想、政治结合在一起,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论证,形成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在表达形式上,则历来崇尚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常常以近乎格言的形式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虽然,中国是一个优秀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但近代以来经济落后,文化科技不发达,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低,素质也不高。这就决定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所掌握,变为手里的尖锐武器,就必须尽可能地使之通俗化、大众化。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宝贵的思想成果,也继承了它的思维特点和表达形式,同时又注意运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来阐明深奥的哲理。因此,从表现形式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浓郁的中国民族化的色彩。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独具的鲜明特色。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下同),第336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页。

第五节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它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从而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并表明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一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史书记载,“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汉书》,班固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热衷于搜集“古文先秦旧书”,得到不少“经传说记”的真本。班固赞扬他在古书搜集中的求实精神。唐颜师古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颜注中所谓“务得事实”,是指刘德搜集古籍,务必考证翔实;“每求真是”,意思是力求得到真本(正本)。可见,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现代人按字面解释,把“实事求是”理解为根据实证,求索真相。就是指治学严谨,根据事实材料,求索真相的意思。这一用语,在中国哲学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

毛泽东从中国历史遗产中发掘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形式,对它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

研究。” 经过毛泽东的解释,就赋予了它崭新的涵义,从而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概念所作的科学规定,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概括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统一,高度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它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他接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他还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不仅指明了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概括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

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其本身就蕴含着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内在因素。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必然要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基石。历史表明,从客观事实出发,还是从本本出发;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出发;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是以“本本”、主观为标准。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根本对立的突出表现。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242、64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7页。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内在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早在 30 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僵化的“遵守既定办法”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对立。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他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实践论》、《矛盾论》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论。在延安整风中,他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并精辟地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在 60 年代初,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的认识往往需要从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从而阐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特征。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长期的实践经验,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新概括,说明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见前面的引文)。这一完整的科学的新概括,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要实事求是地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邓小平所概括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四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补充,而最核心的是实事求是。他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还说:“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21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33、123 页。

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在这里,邓小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核心。

二 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实事求是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核心,而且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根本点。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还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这些论述,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同时,也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背离实事求是,就必然抛弃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

在我党历史上,不论犯右倾或“左”倾错误的同志,在口头上一一般都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承认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从主观出发、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出发,表现为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亦即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坚持实事求是还是背离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成为我们党内部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121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实事求是,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正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点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领域中的多方面展开,从而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性。从党创立的最初年代起,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后60年代初期,党的思想路线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指出什么时候我们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挫折、以至失败。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呢?这种根本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的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这就是说,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抛弃实事求是,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这是对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3页。

三 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我们党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明确地规定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当然也是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进展。它无疑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根本的、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早在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思想路线”这个概念。虽然，它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还未作出明确的表述，但可以说已初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点的雏形，并相当深刻地阐明了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通篇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它指出了只有深入群众去作实际调查，才能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才能实现这个结合；它论证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真理。因此，可以说，它既讲了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问题，也讲了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文献。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形成有机的统一。这三者之间，实事求是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这更深刻地说明，实事求是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 47 页。

想的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紧密结合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告诉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二是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方面,都离不开实事求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就要老老实实在地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同样,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因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党的群众路线是相辅相成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意义上说,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思想觉悟程度出发。可见,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两者是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

实事求是与独立自主是有机联系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就说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当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是说不要外援和拒绝向外国学习。但是,争取外国援助和向外国学习,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以增强我国的国力为目的。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在哲学上说,就是内因与外因、根据与条件的关系,二者既相反又相成、既对立又统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8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9页。

决不能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绝对对立起来。但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实践表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离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反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抛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也不可能有革命和建设成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探索前进的道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其所以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因为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它不仅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贯穿在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成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因此,抛弃它,就等于挖掉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等于丢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灵魂、精髓。

基本理论篇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中,其核心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又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还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些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它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统一。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反之,背离实事求是,就必然抛弃唯物论、辩证法、反映论和历史唯物论。

第二章 毛泽东唯物论思想

毛泽东唯物论思想,不是一般地重述和阐释哲学教科书上已有的理论观点,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上,一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唯物论的理论问题,一方面着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并在不断总结革命实践新鲜经验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思想、新原则,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节 物质与精神

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二性以及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毛泽东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了革命与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吸收了现代科学的新成果,在阐述这一基本原理的过程中,不仅有了新的丰富和深化,而且也有许多新发展。

一 物质第一性与精神第二性

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就依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列宁指出:“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唯心主义者看来则相反。”他还说:“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感觉、知觉、表象和一般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

在1938年12月以后,毛泽东在读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批注中就指出:“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在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摘录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摘录了这样的话:“我们所用的一切名词(或概念,范畴),例如‘绝对’、‘相对’等等,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重申并且发挥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思想,他指出: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他还指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实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仅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唯物主义的学说,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划分之根据的思想,而且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强调唯物主义的思想,强调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其认识意义就是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实践意义就在于要从中国的国情、从客观存在的现实出发。1939年,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时,当读到“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中把握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7、27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第296、296、19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时,毛泽东在这一段话旁边加了批注:“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1942年5月,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论思想非常成功,不仅使革命实践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而且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指出:只有从实际出发,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也就是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又指出:根据农业、手工业和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实际情况,指出:这是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这个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毛泽东从当时革命转变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要建立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情,及时地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可惜,由于后来对实际情况的认识发生错误,这种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未能很好地坚持下去,致使指导思想上发生愈来愈严重的“左”倾错误,因而在实践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0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3页。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路线,才能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较大的成功,而尽可能少犯错误。

二 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决不可以把思维同那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他们还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恩格斯认为:“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宁指出:“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

毛泽东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物质世界是可认识的,不是不可认识的。”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经验教训,总是反复强调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思想。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在承认物质(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同时,还要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44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98页。

问题。

解决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问题,有其客观的基础和内在的要求。毛泽东在同一谈话中指出: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

坚持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说来,坚持这一原理,其意义至少有:

其一,从实际出发,尽可能逼近真实地反映、认识客观世界的情形、特点、本质和规律。坚信人们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把握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坚持认识辩证法,承认世界上只有尚未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不可知论。

其二,坚信认识主体能够认识与其自身相对待的客观世界,而不必主要寄希望于认识主体网络中自身以外的其他认识主体。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62年,在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时,毛泽东又一次深刻地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其三,可以同否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观点划清界限。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说思维和存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这就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所以,我们应当坚持恩格斯关于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论点,坚信认识可以把握客观世界。

从实践上来看,坚持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原理,就应当努力做到:

首先,应当认识到,思维与存在的符合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客观世界既不是不能认识的一种孤零零的绝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在实践上就要坚持这种认识辩证法,坚持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其次,既然思维与存在的符合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就难免要犯错误。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就应当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客观真理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舍弃其他一切个人的或小团体的面子和不正当的利益等等的东西。

三 精神对物质可以起反作用

精神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理论对实践可以起反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

的人。” 列宁指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很重视精神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理论对实践的反作用，并且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概括。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强调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是更重要的飞跃。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的东西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在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的过程中，当读到“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的发展过程”时，毛泽东加了这样的批注：“还有，由思维到物质。”“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思维能够反映存在，反映客观的性质，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在同一谈话中，他还指出：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指出，由精神向物质的飞跃，其“意义更加伟大”。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既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又丰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同时有效地指导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发展。

第二节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物质世界的无限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265—26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同时总结了现代科学的许多最新成果,吸收了同时代人的若干哲学见解,对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作了发挥和发展。

一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

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物质世界无限性的理论根据何在?其现代科学基础是什么?提出这一理论有哪些重要意义?这些是我们首先应当研究的问题。

物质世界的无限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恩格斯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步过程”。这就是说,物质是在时间、空间中运动的,作为无限的物质世界存在形式的时间的永恒性、空间的无限性,是指“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他还认为:物质世界是无限运动“过程的集合体”,充满了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在“我们的宇宙”以外,还存在着“无限多的宇宙”。因此,人们能够“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它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列宁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关于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思想时,指出:客观物质世界有限与无限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着“事物本身、自然界本身、事件进程本身的辩证法。”并且认为,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可以“应用于原子和电子的关系。总之就是物质的深邃的无限性”,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557、89、557、5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4、114—115、115页。

的前进的(一切部分的)联系。”

毛泽东在新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条件下,在50年代、60年代,经常邀集著名科学家座谈,会见外国著名科学家,并阅读了许多科学论著,如坂田昌一的文章和李四光教授的《天文、地质、古生物》等。他进一步指出: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千千万万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

毛泽东作出上述关于物质世界无限性的哲学概括,既有其深刻的现代科学基础,又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不断证实。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不仅在时间上、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且在结构和关系上也日益展示出无限性的丰富内容。

比如,现代科学的综合发展告诉人们,宇宙是由胀观层次、宇观层次、宏观层次、微观层次、渺观层次等物质结构组成的物质世界。

而且,超弦理论的发展,有可能揭示无限的物质世界中的四种作用力(引力、电磁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的统一,这就可能为物质世界的无限性与统一性提供一个方面的现代科学的证明。

更何况,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不仅研究了观测所及的宇宙(100—200亿年、100—200亿光年这样大尺度的时—空天区)、星系系统、恒星系统、行星系统的演化机制及相互关系,而且预言了观测所及的宇宙以外的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分子天文学的进展,更表明了宇宙天体的研究中,发现星际分子的大量存在,其中有

参见《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第1—2页;《毛泽东同志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选》,第232页;《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4页。

些是有机分子。这对于人们研究生命的起源,进而探讨宇观(包括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无机界与有机界的联系,从而论证物质世界层次结构的无限性和物质联系的无限性,很可能提供有力的科学证明。这些现代天文学的成就,不仅证实和丰富了恩格斯当年从天体演化学角度探讨物质世界无限性所得到的科学的、哲学的见解,而且为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物质世界无限性的哲学结论,提供了丰厚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当年指出:在天体演化过程中,一方面,“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另一方面,在“属于我们的星系”中,很可能存在着“很远的独立的宇宙岛”。天体演化的起源物质是原始星云,“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当然,从物质世界无限性的观点来看,更应考虑到,“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

人体科学和脑科学的发展,也为物质世界的无限性提供了日益有力的科学证明。人体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体系统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它是由生理的、心理的、精神的、社会的诸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就我们这里研究的特定角度来看,人体系统是物质间的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对人体系统的研究,正在为人们探索物质世界的无限性提供着日益丰富的证据。再从脑科学来看,人脑不仅由基本粒子、原子、分子、细胞器、细胞、柱状体、大脑皮层等物质构成,而且人脑系统是一种由物质构成的复杂的信息控制系统,它由前脑(大脑、丘脑、下丘脑、基底核)、中脑(上丘、下丘、网状结构)和后脑(小脑、延脑等)等不同的物质部分构成,这些物质系统通过神经网络的上行传导系统、下行传导系统,

与身体内部的各器官、各系统以及连结外界的各种感官系统相联系,形成一种极为复杂的整体优化的信息控制系统。脑科学研究的进展,从微观的结构和关系上揭示了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同时,分子生物学的进展,也为这一方面的观点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不仅如此,现代科学特别是交叉科学的发展,多角度、多层次、动态地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系统性、相似性、中介性、规律性等等的情形和特点,丰富了物质世界无限性的内容。

交叉科学中的系统科学告诉人们,客观物质世界是由无限的系统组成的宇宙总体,这种宇宙总体包含着无限的系统网络,每个系统网络乃至每个系统都具有不同于各组成要素的整体新质和整体的功能效应,等等。这就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无限性的丰富内容。

相似论研究表明,客观物质世界中相似的事物、现象、过程和规律,正在被人们日益揭示出来,展现着客观物质世界无限性的丰富内容。

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揭示出信息是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社会系统乃至思维系统的一种重要的中介,另一方面,交叉科学的发展,成为人类知识体系动态网络结构的中介学科,这些中介学科所揭示的客观物质世界的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情形、特点和规律,能够联结、丰富、深化具体科学和哲学所揭示的客观物质世界无限性的内容。

交叉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若干不同领域的某些共同规律。这些共同规律乃是各门具体科学所揭示的各自的特殊规律与哲学所揭示的最一般规律之间的中介层次,这样从人类知识体系动态网络结构所反映的客观物质世界来看,就展现了规律体系的总体性、层次性与网络性。这就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丰富了物质世界无限性的内容。

二 物质的无限可分性

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是包含在物质世界无限性这一命题之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本质上是研究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问题的。由于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把它单列出来加以研究。

关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大量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指出:物质,“这样的名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许多不同的、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把握住。”这就从总体上论述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与无限性的辩证关系。他还认为:分子不过“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针对一些科学家把原子当作“最终的”物质实体的错误看法,恩格斯明确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列宁总结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期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一方面批判了新物理学的唯心主义,指出:“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他们不了解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竟然把当时发现的电子当做“最终的”物质实体,甚至有些人认为“物质消灭了”,唯物主义被驳倒了。另一方面,列宁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坚决认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它无限地存在着。”后来的科学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伟大预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56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7—268、268页。

毛泽东在新的科学技术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物质世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毛泽东在50年代至60年代关于哲学问题的文章和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因而都是可以分解的。他又说:“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他还指出: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毛泽东看到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教授《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中译文章后,对坂田关于基本粒子可以分割的观点倍加赞赏,指出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并就此邀集了一批著名科学家进行了几次座谈,发表了重要的哲学谈话。70年代前期,毛泽东会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并座谈科学前沿成就时,毛泽东问杨振宁: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杨振宁说:这个问题科学上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毛泽东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320、350—351页。

参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选》,第232页;《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2—103页。

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当然,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并不是指单调地按某一种特定的形式无限地分割下去,而是将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研究物质世界的结构、关系、本质和规律。毛泽东指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是情况不同,二是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和规律,例如矛盾的统一,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定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确实如此。现代科学的发展,从许多新的方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复杂性的情形、特点、关系、本质和规律。例如,分形理论、分叉理论、混沌理论就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复杂性,更深入地体现了客观物质世界多样性与统一性、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分形理论、分叉理论、混沌理论的研究进展,丰富、深化、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的学说。这些理论表明,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不仅表现在结构层次的可分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物质的关系、本质和规律的复杂性方面,同时也表明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须视不同领域、不同条件,在分法上进行具体研究,而不能机械地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分法。这就更深刻地体现了应当把对立统一规律应用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把握上。

参见周培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光明日报》1978年9月10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三 物质世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学说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关于物质世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思想。

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毛泽东上列关于物质世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论述,就在这种“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新的证明。毛泽东的论述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许多成果,不仅从物质世界的大的方面阐明了物质世界的无限性,而且从物质结构、关系、本质和规律的无限可分性,论述了物质世界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统一。这就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哲学论断。

(二) 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指导。

这种正确指导既体现在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指导了相关的科学研究的发展上,也体现在科学家们结合亲身实践的体会等方面。

就指导科学研究来看。本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科学研究还只达到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的认识水平时,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基本粒子的可分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这些东西是可分的。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引起中外科学界的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大惊异和研究兴趣。相隔半年,美国科学家发现了“反质子”,一年以后又发现了“反中子”。科学研究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伟大预见。再如,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特别是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思想,对科学研究的巨大指导作用,也是为中外科学家所承认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指出:“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毛主席预见二十年后高能物理学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6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家提出了“层子模型”理论,西方科学家提出了与此相似的“夸克”理论。1979年,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等人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胶子”,这进一步表明层子结构也是可以再分的。

就科学家们的体会来看。日本著名科学家坂田昌一教授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切身感受,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关于物质可以分割的思想,“确实鼓舞着我去抵制那种认为基本粒子是物质极限的观点,并运用‘物质层次’的观点来集中研究复合模型。”坂田教授作为日本科学家代表团的团长,于1964年8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科学讨论会,当毛泽东接见与会的各国科学家时,与他亲切握手并告诉他读过他的文章,坂田非常惊讶和喜悦。此后,坂田得知毛泽东称赞他对基本粒子研究的重大贡献和理论观点,回国后多次写文章宣传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他还特别强调地指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经过中国革命考验的卓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也必然是强有力的武器。”

钱学森:《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人民日报》1976年9月16日。

转引自湘潭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科学家哲学文选》(下),第558页。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4页。

转引自《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第8页。

美国科学家格拉肖的思想变化过程更能说明问题。他与温伯格、萨拉姆由于在建立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获得了1979年度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奖。他们原来都认为基本粒子不再可分,后来逐渐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也承认基本粒子可分了。1977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国际专题会议上,格拉肖建议把比夸克具有更深层次的物质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1979年,在一次答记者问时,格拉肖说:他之所以这样建议来命名“毛粒子”,是“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着。因此,我想取用他的名字。”

第三节 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

在物质的运动观方面,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而且结合现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进一步丰富、深化、发展了这些思想。

一 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恩格斯指出:“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应用到物质上

参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0—106页;《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第10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的运动,就是一般的变化。” “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物质为什么会运动?列宁认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 而如果不坚持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的观点,妄图“使运动和物质分离”,就会“转到唯心主义方面去。” 列宁的这些思想,从一个方面来看,是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有关思想的结果。黑格尔认为:“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在本身之中包含着矛盾,所以它才能运动,才具有趋向和活动。” “矛盾是在其本质规定中否定的东西,它是一切自己运动的原则,而自己运动就是矛盾的表现。”

毛泽东在物质的运动观上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一是深入地论述了物质运动由于事物自身的内部矛盾性,二是揭示了认识物质运动形式的重要性。

就前一方面来说。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 正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内部矛盾,决定了物质世界中运动的必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

就后一方面来看。由于“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 而物质的变化都必然处在一定的运动形式当中,因此,要研究物质的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273页。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145、14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30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4页。

动,就应当研究物质的运动形式。毛泽东指出:“每种事物有一定的运动形态,有些是几种运动形态,但必有一种运动形式是表现该物的特质的。不同的运动形态,就是表现不同的特质或定性。”因此,“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

毛泽东关于认识物质运动形式的思想,不仅揭示了物质运动形式的网络性和相互转化的递阶性,这对列宁的下述思想是一种直接继承和重要发展。列宁认为:“如果说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那末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这个运动,即这个物质的运动的无限错综复杂的表现来对物质进行无止境的研究”。而且丰富、深化了恩格斯主张的“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思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新的社会实践条件下,贯彻了唯物主义路线和辩证法的要求,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他还指出: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批评了苏联上述教科书中“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见解,指出“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自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

毛泽东针对“彻底巩固”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他不仅指出苏联的集体农庄不能“彻底巩固”,而且阐明了中国的社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1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35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会主义经济也不应“彻底巩固”下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也不能“彻底巩固”下去,它们都是历史的范畴,都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死亡的变化过程。就是共产主义时期也是有不断的发展的。共产主义可能要经过许多不同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什么都不变了吗?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了,就只有量变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他接着指出,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因为物质世界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在这样的运动过程中,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中没有质变;质变中有量变,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

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物质世界不断运动的观点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不仅坚持了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的观点,坚持并且深化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强调了认识物质运动形式的重要性,而且把这些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丰富、深化、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

二 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

正由于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是由于物质自身的内部矛盾引起事物的运动,因而运动是无条件的、永恒的和绝对的。又由于在物质运动的网络系统中,物质的运动必然采取一定的运动形式,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运动形式以外的运动形式来说,这时的事物可以称作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例如,处于机械运动中的事物,相对于量子运动等运动形式来说,可以称作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对于同一种运动形式的过程来说,事物处于不显著变动的量变状态,这时也可将这种状态称之为相对静止的状态。从以上两种情形可以看出,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因而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恩格斯考察了宇宙间事物发展的种种情形和特点,

揭示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平衡的相对性。他指出：“在天体的运动中是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在活的机体中,我们看到了微观过程和宏观状态之间的“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毛泽东结合新的社会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条件,对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基本原理作了新的展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又说:“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阐明了事物运动、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他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他又指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不仅丰富、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基本原理,而且为人们正确地观察和处置国际上社会主义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正确指导。近些年来,国际上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暂时的曲折和某些困难,但是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我们应当高瞻远瞩,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4、313、361、314页。

信心,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并且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英勇斗争。那种所谓“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该结束了的谬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种理论的鼓吹者们,其命运必将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则将克服困难,战胜挫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空前崭新的事业,是一项创造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但是这种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种种困难、曲折和矛盾。我们应当根据唯物主义的路线和辩证法的要求,在胜利时头脑冷静,分析情况,制定对策,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优化运行;在困难时充满信心,调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影响,沿着既定的方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三 坚持唯物辩证的物质运动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割的原理,特别是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平衡的相对性的原理,对于我们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了革命实践和领导工作的基本经验,强调指出要正确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方面,也要反对左翼空谈主义,因为“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

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要‘戒左’戒右。”并指出:“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二) 在经济建设工作中要搞动态的综合平衡。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运动观,特别是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平衡的相对性的原理,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就应当实行动态的综合平衡,以使经济建设这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够优化地运行,优化地管理,并向优化的目标逼近。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十分注意解决动态的综合平衡的问题。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做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毛泽东还指出:平衡是对不平衡说的,没有不平衡就没有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才有平衡的要求。不仅就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过程来看,要正确地观察和处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平衡与不平衡、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而且就经济建设的系统来看,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在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

在经济建设工作中,一定要实行动态的综合平衡,不仅要实现农业、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交通运输、商业之间的综合平衡,而且要实现生产、积累、消费之间的综合平衡。不仅要实现经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济建设系统内部的综合平衡,而且要实现经济建设与科学技术、教育、人口、国防、生态环境等等系统之间的综合平衡。又由于上述诸方面的综合平衡是在不平衡的过程中实现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而应当实行动态的综合平衡,不能认为综合平衡一旦建立,就可以一劳永逸,一成不变。应当把唯物主义路线和辩证法的要求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和诸方面,以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当然,毛泽东这里讲的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是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考虑问题的。现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仍然需要实行社会规模的宏观调控、综合平衡。就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依然不失为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第四节 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这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所概括出来的一种新结论。这个结论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色,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的丰富、深化和发展,同时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事业并夺取伟大胜利的思想武器。

一 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就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一) 从世界观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首先是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反对唯心主义路线的基本要求。

列宁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

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毛泽东创造性地把这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客观情况出发。毛泽东指出:“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我们应当“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就是要从全面的情况和事实的总和出发。毛泽东很注意从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和事实的全部总和出发,他反复要求人们,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由于事物是处于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因此应当从矛盾运动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不但要了解昨天,还要看到今天,更要考虑到明天,要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而主观主义的实质是唯心主义。因为“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以前,作为主观主义之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以教条主义为主,其实质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观主义同样表现为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因而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使之提到哲学路线的高度,其意义是很重大的。

其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客观事物的特点出发。事物的特点是事物的矛盾特殊性的基本体现。而把握矛盾特殊性,不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但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根据,而且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把握特点的重要意义,而且更着重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考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把握特点的基本经验,并从对这些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中,更深刻地论述了把握特点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很注意把握客观情况的基本特点。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分析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基本特点,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反对的几种矛盾因素的重要特点,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毛泽东据此规划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蓝图,揭示了持久战和必胜论的客观根据。战争的实际进程和伟大胜利证实了毛泽东的理论分析和科学预见是何等的正确和深刻!

从客观事物的基本特点出发,还要考虑到特点本身也是在变化发展的,其间深藏着一定的规律性。毛泽东在分析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特点后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8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2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0页。

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不仅如此,而且应当考虑到,从客观事物的基本特点出发,还应把握现实的特点与未来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指出:“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我们就应当从对现实的特点出发,研究它们的发展趋势,把握它们内在联系的规律性,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指导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

其三,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更重要的是从客观规律出发。毛泽东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实质,是就本质和规律的意义而言的。事情的本质是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此,本质和规律具有稳固性和重复性。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不仅如此,还应考虑到,本质和规律是一种网络系统,它们有一级层次、二级层次乃至无穷层次之分,它们又与现象乃至假象彼此交错地存在着,因此,需要不断地透过现象,撇掉假象,把握本质和规律。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还要考虑到规律是发展的，不仅有一般规律，而且有特殊规律，还有更加特殊的规律。现代科学更揭示出若干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规律，这就要求人们去进行研究。

人们要做到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就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才能形成正确的理性认识，用之于指导实践，才能获得成功。所以，毛泽东又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二) 从方法论来看，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也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指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了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 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观主义，同样应该加以反对。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都应当看到“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0—15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95页。

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 因此,我们应当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

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必然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采取片面性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的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因此,为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应当提倡和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而对那些‘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从而推进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

二 共产党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基础

人们知道,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这是正确的政治的、军事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基础。而主观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则是错误的政治的、军事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经验时,毛泽东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13—414、413、412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3、844 页。

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总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同时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因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把理论与实践辩证地结合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战胜艰难险阻,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证明,主观主义的作风和方法,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打倒主观主义。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三 思想战线上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又说:“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也没有呀?我不相信。”反对主观主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352页。

义之所以是思想战线上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一是由于客观物质世界有一个逐渐暴露的过程,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如果不把主观符合客观看作是一个动态逼近的过程,而拘守于对客观世界了解的一个方面、一个阶段、一种关系,又不及时改正自己的认识,就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二是由于人们认识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前进的过程。人们如果不了解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而硬把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那末,这条直线就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唯心主义那里去。由此看来,主观主义有认识论的根源。列宁深刻地指出:“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考虑到,作为哲学唯心主义一种形态的主观主义,也将长期存在(当然,其表现形式会有不同),因此,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也将是长期的。毛泽东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哲学上的这两个对子的斗争包含了同主观主义的斗争。因此,从哲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来看,包含着同主观主义长期斗争的任务。

四 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提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的理论高度,并对调查研究作了系统的阐明,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一) 为什么要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重要的认识方法,它应贯穿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全部过程之中。

首先,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从实际出发,认识世界。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强调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931年,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941年,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毛泽东这样突出地强调调查研究的唯物论原则呢?这是因为,只有客观地、本质地了解周围世界的情况和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才能够据以有效地改造世界。

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就必须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把唯物论的原则和辩证法的要求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处于运动、发展之中的。因此,调查研究工作就应把握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物质世界。毛泽东指出:由于“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动着的,进步着的”,所以,“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的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正由于如此,因而调查研究工作是长期的任务,不仅今天需要调查研究,将来也需要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从运动、发展的观点去了解事物运动的情形和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0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点,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做到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

要正确地认识世界,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还必须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正确地把握中国特殊的国情。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的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认清中国这一特殊的国情,乃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不仅如此,要认清中国特殊的国情,既不能依靠本国资产阶级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一鳞半爪的材料,也不能依靠外国的什么组织的指示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的经验。中国共产党要认清中国特殊的国情,只有自己动手作调查研究的工作,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才能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其次,只有坚持调查研究,才能从实际出发,有效地改造世界。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而要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计划,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一起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即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就改造阶级社会而言,无产阶级政党认识社会状况时,必须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才能根据实际的阶级状况、阶级关系等制定正确的改造该社会的路线、方针、政策。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页。

查,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1930年,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在同年5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指出,调查阶级状况、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形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当然,就改造世界而言,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基本上结束了剥削阶级的存在历史,我国发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以来,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应再以调查研究阶级状况、阶级关系为主要内容,而应以调查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情形、特点、规律为基本内容。在这样的新阶段,不仅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且调查研究的方法、手段也相应地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新阶段,不仅应当继续重视并适当应用传统的对现在有用的调查研究的方法,而且应当努力采用新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同时,在这两种情形的实施过程中,都应高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82—18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3—114页。

重视并积极采用科学技术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因为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非常迅猛而又综合交叉的发展,既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空前深刻的内容,又为调查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日益崭新的知识成果和认识手段。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干部队伍和全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在坚持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应当在新的实践条件下,研究实践中的新问题,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二) 怎样进行调查研究?

如何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这方面有系统的论述。

首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毛泽东一贯强调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调查研究工作也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具体地说,就是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作为革命工作的向导。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其重点在于强调它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毛泽东讲了他在青年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体会,说他当时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1—11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801页。

“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武器,去调查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物质世界,根据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的辩证综合,作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最优的或次优的决策,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一切机会主义者,包括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起来,并把这一要求贯彻于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他们制定了错误的战略、策略,结果都使中国革命遭致了失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并且深刻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本本主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他号召“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为此,就必须大力纠正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其次,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调查研究的出发点,是基于群众乃是实践和认识的主体;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调查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的过程,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领导广大群众进行革命的社会实践。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只有跟群众成了真正的知心朋友,群众才能跟你讲知心话,你才能真正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调查到东西,才能与群众一起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

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还指出，在调查中怎样才能使对方讲真话？“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要在谈话的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真意，把你当做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实情况来。因此，调查时必须有满腔的热忱，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有求知的渴望，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毛泽东正是以这种精神作了大量的、深入的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有了比较正确的了解，因而能够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和各种决策，从而引导中国革命不断地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进一步表示：“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强调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从实际出发和实践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实际运用和集中体现。

第三，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正确处理调查研究过程中一系列的辩证关系。基于主观与客观、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的认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只有自觉地应用对立统一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正确处理调查研究过程中一系列的认识辩证法，才能把握事物的情形、特点和规律，从而为改造世界提供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告诉人们，应当正确处理调查研究过程中一系列认识辩证法的问题，至少有如下各点。

一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指出，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认识事物，开始时总是获得大量的感性材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7、2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792页。

料,然后经过科学的抽象,才能达到理性的认识。例如,认识延安,开始只能了解一个大体的轮廓,形成一般印象,后来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经过科学的抽象,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即具体的了解了。

二是,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怎样进行科学抽象呢?一个重要的认识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分析与综合既各有侧重又互相渗透,两者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地统一起来。一般的认识过程是,在获得大量的感性材料以后,主要运用分析的方法,但同时也有小的综合;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则主要运用综合的方法,但同时也有深入的分析。所以,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应当自觉地运用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这个认识方法,来进行科学的抽象,以求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是,典型与一般的辩证统一。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既要掌握一般的材料,更要掌握典型的材料。所谓典型,是指同类事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个别。“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向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团介绍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时,把这种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叫做“解剖学”。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典型的客观性和辩证性。既不能人为地设定典型,唯我所需地去搜集材料,来填充主观的框框,而必须是客观世界同类事物中的确具有代表性的事物;也不能认为典型或者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坏,要看到先进的典型中可能包含着某些消极的因素,落后的典型里也可能蕴藏着某些积极的成分。然后通过科学的分析,找出各自的原因,创造必要的条件,调动内在的

积极因素,使客观上不同的典型向着有利于人民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进步、转化。

四是,曲折性与前进性的辩证统一。人们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总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因此,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在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沿着曲折而前进的轨道向前发展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例如,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土地斗争问题的认识就体现了这种曲折性与前进性的辩证统一。从1928年的《井冈山土地法》到1929年的《兴国土地法》,再到1933年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直到1948年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表明了调查研究过程中,认识的曲折性与前进性的辩证统一。对一个社会问题的认识是如此,对整个社会网络系统的认识更是这样。因此,调查研究运动、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就应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道路,通过曲折而前进的上升过程,使认识无限地逼近客观世界。

第三章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毛泽东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总结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深刻地论述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们着重谈谈他对辩证法最主要的、最突出的贡献,即对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所作的系统而深刻的说明和发挥;同时,简要说明他对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最根本规律,其内容异常丰富。人类对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内容的认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入。毛泽东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内容及其在辩证法科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作了明确的、系统的阐发。

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明确把对立统一规律规定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是列宁。他在《哲学笔记》里,多次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对立面同一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等著作中,系统地发挥了列宁的思想,进一步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8、111、240、278、285、407页。

一 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在哲学史上,一般只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看作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而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只看作是两种思维方法的对立。列宁揭示了两种发展观,他说:“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在这里,列宁指出了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法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是对立面的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形而上学则否认对立面的统一,把发展看成简单的数量的增减。辩证法的观点是活生生的,而形而上学的观点则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

毛泽东把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看作是贯串整个人类认识史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这对吗?对的。因为客观世界既是物质的,又是运动的,是运动着的物质。所以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世界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以及如何运动变化的问题,同样也是世界观问题。整个哲学史除了贯串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之外,还贯串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毛泽东这一观点是一贯的。在《矛盾论》中,他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的矛盾看作是构成哲学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殊矛盾,构成哲学科学所研究的对象。1957年,他在谈到哲学里边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时说:“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以后,他在一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些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里,又多次强调过这一点。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符合整个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它对指导哲学史的研究和进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得出有两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结论。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问题,比世界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还是静止不变的问题更为根本,两者不能并列。

二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不仅指出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在于:“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他用简明易懂的例子有力地说明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矛盾方面的互相依赖和互相斗争,决定了事物的生命,推动了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所以,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

毛泽东还指出:唯物辩证法主张“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但它并不排除外部的原因。因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互相联系着的。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如果否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认外因、外部条件的影响和作用,那就割断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陷入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他以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大量事实,科学地论证了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深刻地说明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他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就既有力地驳斥了外因论或被动论,又防止了只讲内因,否认外因作用的另一种片面性,从而补充和丰富了前人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一再指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又说:“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因此,学习辩证法,最主要的是弄清对立统一规律。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也就“在根本上懂得了辩证法”。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进一步说明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根本对立之所在,划清了两种对立宇宙观的界限,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三 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辩证法其他规律的钥匙

列宁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时曾指出:只有对立统一的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列宁还把量和质的互相转化等等看成是对立统一的实例。列宁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与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要确立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详细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和其他规律及范畴的主从关系。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地说明列宁的上述思想,但他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丰富内容的过程中却具体地发挥了列宁的思想,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同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关系,说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实在内容,是理解其他规律和范畴的钥匙。

在论述矛盾特殊性时,毛泽东指出了事物的质与矛盾特殊性的内在联系。他说,事物的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他根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复杂性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他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步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这说明,在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虽然事物的根本矛盾和由此矛盾规定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但由于事

《列宁全集》第 38 页,第 408 页。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3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4 页。

物根本矛盾的逐步激化和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的复杂变化,事物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局部可以发生质的变化,使事物发展过程显出阶段性来,揭示了总的量变过程中存在着部分质变的深刻根源。

毛泽东还分析了矛盾运动与量变质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发生变化。在分析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时,他又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时,尽管矛盾双方处于不断的斗争状态,但事物仍然只处于量变过程中。只有当这种量变到一定阶段,达到一个最高点,矛盾的主次地位发生转化时,事物的性质才发生变化。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分析表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是量变质变的实在内容。

在论述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原理时,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他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这一分析揭示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真实内容,指出了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3页。

和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

由此可见,对立统一规律是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在内容,而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和具体化。

四 对立统一规律也是认识的根本规律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曾多次指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的一致性;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而且也是认识的规律。他批评了普列哈诺夫等人对此的忽视和不了解。

在抗大讲课时,毛泽东非常重视列宁的上述思想,并多次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唯物辩证法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的其他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因此,它是真正科学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基础,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真实的方法论。他以通俗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他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大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在《矛盾论》里他又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410、407页。

思维的根本法则。”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从理论上说明了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更主要的是表现在他把辩证法就是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是认识的规律具体化了。他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在《矛盾论》里,他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学说的每一具体原理时,不仅说明了它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且还指出它的方法论意义。如,他在阐明了矛盾普遍性后指出,矛盾分析的方法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最根本的认识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又如,他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具体地告诉人们如何分析矛盾,如何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等等。可以说,整个《矛盾论》鲜明地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总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他从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对立统一规律与其它规律的关系、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等方面,对列宁的思想展开了说明和论证。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重申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反复教育人们不仅要在口头上承认这个规律,更主要的是要善于运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各种矛盾。在他看来,能否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是关系到能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页。

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在1964、1965年,根据国际和国内的新经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不要把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平行地并列起来,平行地并列是三元论,而不是一元论,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统一。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在总结了列宁逝世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教训而作出的理论概括,是对《矛盾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当然,在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在强调辩证法的一元化时,决不能贬低,更不能否认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作用。如果认为辩证法只有一个规律,学习辩证法只需学习对立统一规律,而无需学习其他规律和范畴,那就会导致把辩证法的丰富内容简单化,肢解辩证法的科学体系,在实际工作中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各种矛盾。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反对把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并列起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贬低或否认辩证法其它规律作用的倾向,努力做到全面地把握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

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内容时,毛泽东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问题入手,然后再着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最后又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论断。这种安排,反映了人们对矛盾的认识过程。

一 矛盾普遍性含义的科学规定

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很多论述,《矛盾论》也引证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最有名的话。正如毛泽东所说:“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这里应指出的是,经典作家所强调的是每一个事物、现象都包含有矛盾,强调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他们虽然也谈到每一事物的自始至终都贯串着矛盾,但没有强调这一点。苏联的德波林学派认为,事物的发展经历“从单纯的同一,经过差别和对立,达到于极端的矛盾”等几个阶段。这样,在他们看来,矛盾并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思想,把矛盾的普遍性明确地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是对前人关于矛盾普遍性思想的总结和深化。这对反对形而上学,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已基本被消灭,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也基本上消灭。全体人民团结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取得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况就产生了一种假象,似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完全适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已不再是矛盾,而是全体人民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因此,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不了解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懂得在不断地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4、305页。

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在 30 年代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苏联的理论界曾占统治地位,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毛泽东坚持矛盾普遍性原理,坚持把辩证法贯彻到底,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批评和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论的形而上学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内团结的辩证法》等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指出,一分为二是个普遍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必须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不同的只是和旧社会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还具体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种矛盾。他重申了《矛盾论》中“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的名言,指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即使到了共产主义,仍然会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革命。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以及对无矛盾论的批评,为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揭露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反复教育全党,不应害怕矛盾,回避矛盾,而应正视矛盾,敢于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他说:“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

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他还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它，解决它，还是否认它，掩盖它，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的庸人之间的重要分歧之点。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必须坚持两点论，两分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毛泽东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因此“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对我们的工作，对一切人和事，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坚持两点论。当然不同的事有不同事的两点，不同的人有不同人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毛泽东所阐发的“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的思想方法，已为愈来愈多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不断前进的重要思想武器。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

《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第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二 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阐述

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些精辟的见解。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中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这就是说,要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必须认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每一方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他又说过:“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矛盾特殊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体现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中,他们并没有着重从理论上考察矛盾特殊性的原理。

中国革命的特点,特别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斗争的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对矛盾特殊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复杂而又曲折的矛盾运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又为研究矛盾特殊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在《矛盾论》中对矛盾特殊性原理作了详尽的创造性的考察,并在革命的实践中作了杰出的运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首先,深刻阐明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基于中国革命血的教训,详细地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与战争的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研究战争特殊规律的重要性。他认为,在研究战争的指导规律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他详细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论述了认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反对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并为实践证明正确的战略战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红军由30万人降到几万人。毛泽东指出,“左”倾冒险主义者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他们忘记了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从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他还从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来说明认识事物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他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7页。

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他深刻地揭露了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意义,不懂得人类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这样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教条主义者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认识矛盾特殊性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在于,只有认识了矛盾特殊性才能找出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比如,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至十月革命,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这是符合资本主义国家实际情况的,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中国革命应走什么道路,是不是也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这个问题,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没有能正确解决。毛泽东根据对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大国的科学分析,在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但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不少同志,离开中国革命的特点,盲目搬用外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经验,醉心于发动中

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和攻打大城市,坚持“城市中心论”,而把毛泽东的正确理论和实践诬之为“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右倾保守”。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毛泽东指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弄得很坏。

其次,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

毛泽东指出,研究矛盾特殊性就是要研究“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等五种情形,这五种情形归结起来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分析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

一是,要研究各种不同事物、不同矛盾的特殊性。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不能一律看待,必须分析其不同的特点。一个大的事物包含着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也各有其特殊性,同样不能一律看待,必须分析其不同特点。

二是,要以发展的观点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即研究同一事物发展的不同过程,或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的矛盾特殊性。毛泽东把中国民主革命过程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历史阶段,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区分为好几个阶段,具体地分析不同阶段的特殊性,正确地制定了党在不同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不去具体分析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所发生的变化,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不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变化了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路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7页。

线、方针和政策。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同样有必要把它区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分析它不同阶段矛盾的特点。

三是,要全面地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列宁曾说过,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他又说:“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在《矛盾论》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上述思想。他指出,不了解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就不可能把握矛盾的总体,真正认识矛盾,“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毛泽东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如何全面地分析矛盾。他还生动地揭露了形而上学片面性的种种表现、实质和危害,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做好所任的革命工作的。

最后,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必须防止主观随意性。

列宁把观察的客观性看作是辩证法的第一要素,强调辩证法要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指出对概念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中主义与诡辩”。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思想。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8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他说：“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了具体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他还谆谆告诫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后来，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要正确地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必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这些精辟的见解，决不是马克思、列宁思想的简单重复，它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

必须把辩证法牢牢地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在运用辩证法时必须反对和防止主观随意性，这在今天显得格外重要。从1956年以来，我们党和毛泽东虽然强调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但在实践上，却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辩证法的运用离开了唯物主义基础，陷入了主观随意性。在口头上虽然也讲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就是要尊重群众。但在实际上却离开了辩证法，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致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遭受到不应有的挫折。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记取。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页。

三 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关于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有精辟的论述,并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作了杰出的运用。列宁曾说:“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把个别与一般的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时,列宁又指出:“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革命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列宁的这些话深刻地揭示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在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时,进一步发挥了列宁上述思想。

首先,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这里所说的普遍性是指同一类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

事物所具有的共同矛盾或共同本质,所说的特殊性是指某一个(或某一类)事物区别于别一事物(或别一类事物)的特殊的矛盾或特殊本质。所以,这里所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指某一一定的范围一定场合而言的。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會性的矛盾,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普遍性的矛盾,但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对于一般社會中存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它又是特殊性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对整个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社會形态来说,是普遍性的矛盾,但它对整个宇宙来讲,又是特殊性的矛盾,因为它只存于社會运动这一特殊的运动形式之中。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这种相互联结、相互贯通、相互转化关系,要求我们在运用某一理论时必须具体地了解这一理论适用的范围和条件,既不能随意地加以缩小,也不能随意地加以扩大,更不能把适用于一定场合、一定条件下的真理变成一种到处可以套用的公式或教条。在無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中,要善于区分哪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哪些只是适用于某个国家(或一类国家)而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经验,否则就要犯错误。

其次,毛泽东还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还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每一个事物是特殊与普遍、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所以,我们研究事物时,应当注意发现一事物内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两个方面及其互相联系,要善于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个性中概括出共性,同时又要善于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具体地分析特殊性,以便进一步丰富普遍性。

毛泽东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互关系的原理运用于实际工作的指导,提出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解剖麻雀”,抓好典型等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入群众,深

入实际,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通过典型示范,指导和推动一般工作。否则就会犯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贻误革命工作。

再次,毛泽东强调指出,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共性,是无条件的,是绝对的。然而这种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而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为什么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呢?

从理论上讲,这个问题贯串于对立统一学说的各个方面,是掌握对立统一学说的关键。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的结论中作了透彻的说明。他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贯串过程的始终,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所以,我们只有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时,才能真正把握对立统一学说的丰富内容,才算真正懂得辩证法。如果我们把矛盾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互相割裂开来,片面强调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片面强调对立面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否认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特殊性;或片面强调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否认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片面强调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形式的特殊性,否认对立面斗争的普遍性和绝对性,那就违背辩证法,而陷入了形而上学。

从实践上讲,这个问题是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如前所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贯串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所以承认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对科学地认识事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世界上不同事物的矛盾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所以要认识事物就必须进一步分析该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如果仅仅停留在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上,而不进一步具体分析该事物矛盾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对事物仍然没有真正的认识。如,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这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若仅仅停留于此,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作具体的研究,那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仍然一无所知,并且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了解也是空洞的、抽象的。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所以认识事物就是要发现事物内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及相互关系。人类的认识秩序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样两个过程构成的,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就不能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无产阶级政党在自己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如果片面强调普遍性,否认特殊性,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医百病的万灵药方,那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片面强调特殊性,强调本民族、国家的特点或新时代的特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指导作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会导致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党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拒绝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到处可以套用的教条,盲目地执行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有关中国革命的指示,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挫折。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反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关于矛盾精髓问题的概括,是毛泽东反对党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正确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相互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才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前进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总之,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是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学说的关键,是正确地运用辩证法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所以,毛泽东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提出,对于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正确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杰出贡献。

第三节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的概念,但是他们在具体运用辩证法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还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一切矛

盾,都受这个根本矛盾所制约。列宁在《黑格尔 逻辑学 一书摘要》中,明确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列宁和斯大林在分析十月革命后苏联过渡时期的经济矛盾时,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抓主要矛盾的方法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也是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苏联过渡时期经济时告诉我们的方法。

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时,指出价值起主导的作用,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时,指出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在分析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斗争时,指出社会主义因素起主导作用,新经济政策虽然会引起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不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蜕变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复杂多变的情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一 矛盾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因此,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平均看待,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其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同样,无论什么矛盾的双方,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有时对立着的双方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所以对矛盾着的双方也不能平均地看待,必须区分其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毛泽东说: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这两种情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0页。

形，“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这就把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理论放在了坚实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

事物所包含的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拒绝分析矛盾特殊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进一步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必须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又不懂得在强大敌军存在的情况下，我军无论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兵力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他们反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而是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全线抵御”等消极的平均主义作战方针。在政治上，他们同样不是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而是错误地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加以孤立和打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看不到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否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在《矛盾论》里特地用一节对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加以详细地论述的原因。

二 系统论述了主要矛盾的理论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又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他还以中国革命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复杂关系，论证了什么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毛泽东的论证还表明：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及时地注意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

由于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抓主要矛盾的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列宁曾多次说过：“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32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殊环节”。他又说：“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毛泽东的全力找出并牢牢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与列宁全力抓住主要环节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固然起着决定的、领导的作用。但非主要矛盾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主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我们在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可忽视非主要矛盾。为了正确地、顺利地解决主要矛盾，必须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非主要矛盾，防止孤立地、片面地去抓主要矛盾，把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

关于主要矛盾的理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作了杰出的运用。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及时地指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地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国内的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促进下，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复杂多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抓住中日民族矛盾，坚持并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抓住中日民族矛盾的同时，毛泽东丝毫也没有否认、忽视国内的阶级矛盾。他说：“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526页。

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 为了正确地处理国内各阶级间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对上述种种矛盾进行具体地、深入地分析,提出了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的原则、政策和策略。他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和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在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他指出,必须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总之,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是运用主要矛盾的理论,辩证地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关系的杰出范例。

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是极其复杂的,多变的。为了正确地找出事物发展过程或同一过程不同阶段上的主要矛盾,正确地处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关系,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各种矛盾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丝毫不能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颠倒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那在革命实践中就会犯全局性的、战略上的错误。

三 详细阐明了主要矛盾方面的原理

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他还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依照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在矛盾发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可能互易其位置。“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如前所讲,毛泽东对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宇宙间新陈代谢规律的实在内容。

毛泽东把矛盾主要方面的原理出色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在战争中,作战双方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这并不是随意地主观地决定的,而是由作战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在中国革命战争过程中,在开始和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里,敌人处于战略优势和主动,人民军队处于战略劣势和被动,这就决定了人民军队在长时期里实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持久战的作战方针。但是敌我之间的这种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民军队可以人工地造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和主动,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主动。这就是实行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军队就能从小到大,越战越强,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而把敌人抛入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时,人民军队也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直至最后彻底消灭敌人。

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我们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那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这决不是说,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不发生影响,更不是说可以忽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矛盾论》并没有进行论述,但在实际的运用中,毛泽东在十分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丝毫也没有忽视次要方面的东西。如,在进

行党内思想斗争时,他总是从“左”右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他指出,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右。因此,在注意到一个主要倾向的时候,要注意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左”的时候要防止右倾,在反对右的时候要防止“左”倾。总之,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他还明确地指出:在强调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时,不能忽视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在论述重工业和轻工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国民经济的重大关系时,精辟地分析了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说明了非重点对重点的影响和作用,批评了把重点与非重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一点论,进一步发展了《矛盾论》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相互关系的思想。

毛泽东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互相转化的原理贯彻到底,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上述矛盾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他批评了否认这些矛盾双方的地位是能够转化的机械唯物论的见解。这是毛泽东在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和认识过程中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有的人在否认矛盾着的双方必有主次之分的同时,还否认矛盾双方主次地位互相转化具有普遍性,否认上述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这种否认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人所缺少的是辩证法,不懂得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懂得‘相互

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否认主次地位互相转化具有普遍性,实际上也就否认了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原理的普遍性,其结果必然是把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看成是僵死的、凝固的,从而根本上否认了事物有发展的可能性,陷入了形而上学。

总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和其它著作中完整地、系统地论证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并在革命实践中作了出色的运用,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全面地、正确地把握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对于反对形而上学的均衡论、机械论和一点论,对于做好各项工作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四节 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的理论

马克思没有从理论上对矛盾同一性进行说明。但他在科学研究中却作了出色的运用。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他详细地分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同一性。他把这种同一性归结为三个方面:

(1) 直接的同一性:生产直接也是消费,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主体(劳动力)和客体(生产资料)的消费过程。消费也是生产,在消费过程中生产主体(劳动力)。

(2) 生产和消费互为媒介、互相依存、互不可缺。生产媒介着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使消费成为可能。消费媒介着生产,消费为产品创造消费者(主体),使产品得到最后完成。

(3) 生产和消费互相创造对方。消费完成生产行为。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生产生产出消费,不仅生产出消费的对象,而且生产

出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

马克思说：“对于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同一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为我们如何理解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对矛盾的同一性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说：“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他们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在论述真理和谬误的关系时，他又指出：“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详细论述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和辩证法的同一性的根本对立。他指出：“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他以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大量实事论证了辩证法的同一性。

列宁在研读黑格尔的《逻辑学》等著作时，对矛盾统一性原理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探讨，他十分注意黑格尔的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思想，并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研究对立同一的学说。他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当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列宁特别注意到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的问题，他认为，“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向每个它者〔向自己的对立面〕的转化，”他还明确提出了对立面的统一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9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同上，第538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1页。

同上，第239页。

是相对的,而对立面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列宁的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矛盾同一性的内容。但列宁对自己的思想没有加以详细论证和展开。

毛泽东依据列宁的思想并吸收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合理思想,进一步详细地阐明了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原理。

一 矛盾同一性含义的深刻概括

毛泽东说:所谓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他又说:“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明确概括以及具体的论证,进一步发挥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关矛盾同一性的思想,是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有力思想武器。

应当指出,斯大林并没有理解列宁和马克思关于矛盾同一性的思想。他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同一。在斯大林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苏联哲学界在一段时间里,抛弃了他们原先关于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观点。他们认为,斯大林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的提法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7页。

同上,第330页。

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

1952年《矛盾论》修订后重新发表。显然,苏联的这些观点也是针对《矛盾论》而发的。在1954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则不指名的批评了《矛盾论》中同一性原理。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列举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例子来说明对立面具有同一性。《简明哲学辞典》的同一性条目则说:“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象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他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了斯大林和苏联哲学界否认对立面之间具有同一性的观点。他说:《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一条,“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否认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还详细地说明了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之间的同一性,有力地驳斥了《简明哲学辞典》的责难。他尖锐地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同一性的含义概括为两个方面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参见《学习译丛》,1953年第6期。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348页。

二 矛盾转化的重要性和条件性

毛泽东在说明同一性的两种情形时，特别强调了转化的重要性。他说，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一点还不够，“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为此，他用较多的篇幅，举了大量的例子来阐明转化的原理。为什么对立面的互相转化是同一性的更为重要的内容呢？因为矛盾着的对立面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可变的，事物只有通过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向非主要方面的转化，才能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才能有质的飞跃，旧事物才会灭亡，新事物才会产生。所以转化的理论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毛泽东说得好：“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人就是做转化工作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又进一步论述了对立面的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思想。他特别反复地讲到好事与坏事、香花与毒草、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等等看来绝然相反的东西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他曾说要例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搞通思想，提高认识，防止思想僵化。他一再告诉人们，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页。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对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新的总结,进一步丰富了《矛盾论》中关于同一性的原理。

在辩证法的转化理论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转化的条件性问题。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在谈论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时,一般都没有注意到转化的条件,所以这种古代的辩证法很难同诡辩论、相对主义划清界限。黑格尔讲转化是概念的转化,他也不讲转化的条件。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他又说:“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的这些论述划清了在转化问题上辩证法与诡辩论和相对主义的界限。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根据矛盾同一性是有条件的思想,特别说明矛盾转化条件的重要性。他说:对立的東西,缺乏一定的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他强调唯物辩证法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在后来,他更明确地说:“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因此,为了要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促成事物向有利革命方向转化,就必须具体地分析矛盾转化的条件,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转化的条件,促成事物向有利于革命方向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离开了具体的条件来谈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在哲学上就会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在政治上就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三 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

列宁曾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的这些话指出了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根本特点。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告诉我们,同一性的相对性在于:第一,对立面的同一性是暂时的。辩证法的同一性是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等同,在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而这种对立面斗争的结果,迟早会导致对立面同一的破裂。所以“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第二,互相排斥对立面的同一是有条件的。互相排斥的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共居,才能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说来,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也是相对的。那为什么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呢?他告诉我们,因为矛盾着的双方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矛盾着双方的这种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2页。

并使一过程向着它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在考察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时必须注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毛泽东曾指出:“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任何矛盾的双方始终存在着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同一的这两种关系。矛盾双方的斗争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之中,而矛盾双方的联系也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和斗争之中。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因此,任何离开斗争性来谈同一性,或离开同一性来谈斗争性都是错误的。辩证法要求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坚决反对只讲同一否认斗争,或只讲斗争,否认同一的形而上学。

既然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那为什么不能讲矛盾的同一性也是绝对的,斗争性也是相对的呢?这是因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如果我们把同一性看作是绝对的,那就是把对立面的同一看作是僵死的、凝固的,就否定了事物的任何运动、发展和变化,陷入了形而上学。如果把对立面的斗争看作是相对的,那就否认了对立面本来就是互相排斥的、互相斗争的,就会陷入矛盾调和论。

总之,继列宁之后,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里深入地、系统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0页。

地研究了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矛盾的双方如何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的说明和发挥,对我们坚持彻底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诡辩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四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在研究矛盾斗争问题时,毛泽东特别研究了矛盾的性质和矛盾斗争的形式,说明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别及其相互转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历史过程时,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揭露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进步的革命阶级和落后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对抗,阐明了这些矛盾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不同的社会革命,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详尽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

列宁指出:“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在这里列宁首次提出了对抗和矛盾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对抗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研究矛盾的斗争性问题时,把对抗在矛盾中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列宁《对布哈林 过渡时期的经济 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地位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大大发挥了列宁的思想。

首先,他对对抗性矛盾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那么什么是对抗性矛盾呢?他告诉我们,对抗性矛盾是指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才能解决的矛盾。如社会生活中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自然界的炸弹爆炸等。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明确指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其次,提出了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的思想。他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切不可将解决某一种矛盾的方法当作公式去套在一切事物身上。一般说来,非对抗性的矛盾则只能通过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来解决。因此,在“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要犯错误。

再次,提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互相转化的原理。他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他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性质为例,来说明矛盾性质可以互相转化。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在我党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懂得矛盾的性质有对抗和非对抗之分,不懂得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他们对一切不赞成、不执行他们路线的人,不问明情况如何,统统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用对待犯人和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党内的同志,致使党内大批优秀同志受到错误的处理和诬陷,造成了党内极为痛心的损失。鉴于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一般不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第五节 对立统一的范畴论

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认识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分别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发展的状态和形式,发展的趋势和道路。它们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最基本的部分。此外,辩证法还应包括同上述规律紧密联系的、诸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一系列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这些范畴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侧面的联系和关系。它们同上述规律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体系。这些范畴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因此,只有根据对立统一的观点,才能把握住这些成对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纯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理论，去从事革命，指挥战争，领导建设，进行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这里我们简要地介绍毛泽东有关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内容与形式、可能与现实等范畴的有关论述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范畴理论增添的新内容。关于自由与必然、全局与局部在认识论和军事辩证法中有所论述。

一 量变与质变

量变质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它着重说明事物矛盾运动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表现为由量变到质变，又由质变到量变的无限交替的过程。离开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质量关系的辩证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自身固有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7 页。

以区别于别的事物。事物的质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那么事物的质是由什么规定的呢？怎样才能认识事物的质？毛泽东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他还进一步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事物的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认识事物的质关键在于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找出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一再阐明了认清事物的质，注意事物质的区别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不仅深刻地阐明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分析了引起中国革命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还详尽地论述了认清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他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就其认识根源来说，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没有正确的认识。

在质与量这一对矛盾中，一般说来，质是主要的，质决定量。但这决不是说量是无足轻重可以忽视的。毛泽东说：“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这就是说，质量和数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在注意认识事物的质，区别事物质的界限时，也要十分注意事物的量，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要胸中有“数”。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对于一个复杂的大事物来讲,事物的质和量是多方面的,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在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变化时提出了要注意区别事物新的质与旧的质,新的量与旧的量的概念。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方面将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变化,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二种是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毛泽东特别指出:“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种分析,不仅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而且告诉人们应如何分析一个复杂的事物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如何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方向。毛泽东关于新的质和旧的质,新的量和旧的量的概念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量变质变规律的内容。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量变与质变往往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进行的,而是互相交错的。在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在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扩张。毛泽东从量变和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上,从量变和质变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上,说明了部分质变原理的普遍性。他说: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他又说,在一个长的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毛泽东的这些说明,把量变中的部分质变以及质变中的量的扩张原理放在可靠的唯物辩证的基础之上,谁要否认这一原理的普遍性,就首先要否认对立面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贯通的普遍性。

当然,任何部分质变也必须要有一定量变作准备,但部分质变又促进了总的量变,并为根本质变创造条件,所以它对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页。

具有重要的意义。自觉地认识掌握部分质变原理,我们就可以发挥自觉能动性,创造条件促进量变,促进许多部分质变,加快根本质变的到来,加速事物的发展。

二 肯定与否定

肯定否定规律(或称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又一基本规律,它同量变质变规律一样,是对立统一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变化不是循环的,更不是倒退的,而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波浪式(或螺旋式)的前进运动。

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是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其本身灭亡的方面。事物的内部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当事物肯定方面占优势时,事物保持其原来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当否定的方面战胜了肯定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时,事物就转化为自己对立面,原来的事物就被新的事物所否定。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否定是辩证法革命的批判的本质的集中表现。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事物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才能使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毛泽东进一步说明了否定的革命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毛泽东在谈到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不把这

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事物内部所包含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斗争,新的方面与旧的方面的斗争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不破坏旧的东西,不否定旧的东西,新的东西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中,毛泽东运用辩证的否定观强调对任何事物都应取分析的态度,反对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倾向。

他反复阐明了在文化遗产方面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批评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两种错误态度。对待外国文化,不论是古代的,还是今天的,亦应采取有分析的批判吸收的态度。

对于党的工作和历史经验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切勿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毛泽东指出:“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不应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似乎都做得不好,一团糟。这也不合乎事实。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一般说来,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因此,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是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

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以自然界、社会的大量事实和革命实践中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说明了事物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不是一字形的,而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是“之”字形,曲线形的。

那么事物的发展为什么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呢?关于这一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进行具体说明。毛泽东则从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上揭示了波浪式前进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任何事物内部所包含的肯定与否定,新与旧两方面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开头,代表新的,否定方面的力量总比代表旧的,肯定方面的力量要弱,要小。弱的、小的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战胜强的、大的。必须经过一系列曲折的斗争,弱的、小的才能变为强的、大的,并最终取得支配地位。而原来强的、大的变为弱的、小的,最后归于灭亡。这种情形在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毛泽东总是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不平衡性来说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以矛盾不平衡的绝对性、平衡的相对性来说明经济建设是波浪式的前进。客观事物是丰富多彩的、各不相同的,因此,事物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情况也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只要把握一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那就一定能具体地说明该事物运动发展的大体进程。

凡是运动都是波浪式前进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如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对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历来把波浪式发展当作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我们作工作、订计划,要照顾到这一点。不仅在困难的条件下,不能搞冒进、搞直线论。就是在顺利

的条件下,也不能搞冒进、搞直线论。毛泽东一再告诉我们:凡是运动都是波浪式前进的,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反对直线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凡遵循波浪式发展规律,革命和建设就能比较快地发展,就少走弯路;违背了这一规律,企图走直路、搞冒进,结果革命和建设就发生更大的曲折,走了不少弯路。

总之肯定否定规律是一个极为普遍地、广泛地起作用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对这个规律的论证提供了大量的生动材料,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这种规律的根本内容,即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以及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的重大意义。

三 本质与现象

本质与现象,是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本质显现为现象。两者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对什么是本质作了规定。他指出,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它事物的内部联系。又说:事物内部包含着特殊矛盾“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只要事物发展过程的这种特殊矛盾还没有解决,过程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毛泽东对本质所作的科学规定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要暴露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特别是要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毛泽东还指出,现象与本质不同,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页。

面特征,是我们感官可以直接感知到的。他说:“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象的分析 and 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人们的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理性认识,只有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

毛泽东告诉人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毛泽东不仅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且十分注意判明假象与真象的区别,不被假象所迷惑。假象是同本质正好相反的一类现象。“假象 = 本质的否定的本性”,“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所以假象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假象是从反面来表现事物的本质。假象的这种特点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困难。人们常常容易为假象所迷惑,将假象当作真象。历史上行将灭亡的一切反动阶级,总是用狡猾的手段,造成各种假象,掩盖自己的真实本质,迷惑革命人民,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

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现象上,必须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0—15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4页。

深入到本质。本质表现为现象,人们不能离开现象去认识本质,而必须从现象出发。毛泽东强调,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矛盾。他批评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法很不好,指出,这种教科书总是从概念入手,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他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这种教科书从概念、定义出发,实际上是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不承认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指导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四 主流与支流

主流与支流是毛泽东在总结实践经验中所提出来的一对新范畴。这对范畴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趋向。

由于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造成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趋向。这种不同的趋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由事物本质决定的代表事物发展基本方向的趋向,即所谓主流;二是,由事物非本质决定的并不代表事物发展基本方向的趋向,即所谓支流。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发展的主流。从这方面讲,本质与主流是同等程度的范畴,两者密切相关,毛泽东也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运用。

主流,代表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正确地区分主流与支流,牢牢地把握住主流。在革命斗争中,我们如果分不清主流与支流,把支流误认为主流,那就一定要摔跤,一定会迷失方向。毛泽东反复告诫人们:在分析形势、总结工作、评价人物等问题上,一定要注意区分事物的本质、

主流方面与非本质、非主流方面,不应当将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在强调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时,还告诉我们不要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虽然主流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但非主流对事物的发展也起着制约的作用。如果忽视了非主流方面的问题,那它就有可能转化为对事物的发展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这样事物的发展就会出现暂时的倒退。所以他说:“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他在肯定我们工作取得成绩是主要方面的时候,也注意揭露和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实践表明,在革命和建设,如果能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主流和支流之间的相互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前进,就发展。反之,就会招致挫折和失误,这是必须牢牢记取的。

五 内容与形式

一切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只有内容而无形式,或只有形式而无内容的事物,在现实世界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内容,是指构成事物要素的总和;形式,是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方式。

在内容与形式的这对矛盾中,一般说来,内容处于主导地位,内容决定形式,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适合于内容。依据这一原理,毛泽东强调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首先必须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

在论述文艺批评的标准时,毛泽东认为,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0页。

和艺术表现形式这两者都很重要,但首要的,第一位的是应着眼其政治思想内容。他说:“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对某些政治内容上根本反动而又带有艺术性的东西,就愈该加以排斥。毛泽东同志还尖锐地批评那种不注重内容,只讲究形式的形式主义,他指出,写文章,作报告,必须有充实的内容,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反对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开中药铺”的方法。他认为,这种窒息革命内容发展的形式主义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必须揭破它,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不仅重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同时也很注意形式对内容的反作用,注重选择适合内容的形式以促进内容的发展。文艺作品不仅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而且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他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不仅文艺作品是这样,整个思想文化也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思想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各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说:“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页。

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适当的形式,把形式与内容有机地统一起来,促进内容的发展,这是一项重要的领导艺术。

同一内容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甚至与内容相反的形式。在革命斗争中,学会善于掌握和运用多种斗争形式,使之互相配合。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吸取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依据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各种斗争形式。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其它各种斗争形式的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在文学艺术上,同一的内容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因此,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风格,会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反映了科学文化发展的规律。

六 可能与现实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一个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人们改造世界就是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因此,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经常遇到的一对范畴。毛泽东十分注意这对范畴的运用。

首先,他认为必须注意可能性和现实性、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的区别。他说:“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 现实,是指当前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或现象。可能,是指包含在现存事物中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着的尚未实现的东西。可能不等于现实,两者决不能混淆。无产阶级政党在分析形势,制定方针、政策时,必须把可能性与现实联系起来考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政策、方针和计划时,当然必须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方针和计划必须是以现实的东西,而不是以可能的东西为依据。因为可能毕竟只是可能,还不是现实,而且,只有从现实的东西出发,才能正确地估计到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和多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和国际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谈判签订了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协定签定后,有的人认为和平已经实现,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议会的斗争。毛泽东则清醒地告诫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就是说,纸上的东西,还只是可能的东西,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如果把纸上的东西,可能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那我们就犯历史性的错误。

毛泽东历来强调应区分虚假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能性。什么是虚假的可能性?他没有作进一步的阐明。但从他的整个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虚假可能性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可能性,这种虚假可能性实际上把不可能的东西甚至是主观虚构的东西当作可能的东西,把这种虚假可能性与现实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8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6页。

可能性混淆起来,其造成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有一定的客观的根据,但又不充分,在目前现实的条件下,还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这种虚假可能性是一般教科书中所说的抽象可能性。混淆了这种虚假可能与现实可能性,同样会给实践带来严重的危害。毛泽东指出,如果离开了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把仅在将来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就会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毛泽东还十分强调指出,在考察事物发展时,必须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他说:“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又说:“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事物发展过程存在着两种相反的,甚至多种的可能性,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所造成的。在新、旧事物的斗争中,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指发展总的趋势而言,这并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旧事物有暂时胜利的可能。

在估计事物发展好、坏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指出,要充分考虑到坏的可能性,要向着变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对付突然的事变。这样做不仅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在工作安排上,作最坏的可能性设想,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就可以处于主动地位,不致于吃亏,防止坏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即使在坏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时,也不至束手无策,不知所措,而能有备无患,为继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

续争取好的可能性的实现而积极斗争。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再次,毛泽东分析了主观能动性在可能性变现实性中的重要作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的许可条件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正确认识和掌握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客观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在社会运动中,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是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来实现的,因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表现十分突出。这种主观作用,决不是任意的妄为,而是要求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中存在的条件,以及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条件,然后积极创造条件,为防止坏的可能性,实现好的可能性而斗争。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反映了事物、现象的普遍联系和全面发展的不同的侧面和方面,表现着各自的特殊性,但它们又有其本质上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客观事物和现象普遍本质的反映;都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都在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认识的发展而发展,并反过来指导着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认识史表明,没有范畴,人类就不会有自觉的实践和科学的思维。恩格斯说: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列宁则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这就是说,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对世界的最一般的本质、最普遍的矛盾的概括和总结;反过来,范畴又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思想武器,并在这个过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程中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各对范畴之间彼此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在人们的辩证思维中,它们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往往是一系列范畴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一起,综合地发挥着作用,这样才能真实地具体地再现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

第四章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有助于完整地、准确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乃至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第一节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一 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两条认识路线的界限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为前提,主张从物到感觉到思想的认识路线。这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首先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是人脑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4页。

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且,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认为,客体既是进入认识领域的客观物质世界,它又是人们通过实践对之改造的对象,应当把客体的物质性与主体的能动性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地结合起来。

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则相反,它们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前提出发,或者认为认识是主观自生的东西,或者认为认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总之,它们坚持从思想到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现代科学的发展,证明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正确性。现代科学揭示了人们的认识在主要依赖外源信息的同时,也依赖于人体系统自身的内源信息,这种内源信息不仅包括认识主体与周围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人体系统内部产生的各种信息,而且包括历史上遗存下来并且内在于身体系统内的各种信息。认识主体在对这些外源信息和内源信息反映的过程中,经过神经网络、大脑系统的不同层次、多种类型的选择、整合、建构,才能认识事物的。这个过程更深刻地表明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正确,那种否定反映论的选择说、建构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科学的成果的。

二 划清了能动的反映论与 形而上学反映论的界限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全面地、纲要式地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认识世界的目的。这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本质区别之所在。恩格斯也认为,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和动力。他说:“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列宁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区别的根本标志,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了解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它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它们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旧唯物论是被动的纯反映的”,它们不了解能动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结合。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另一个特点,是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反映论是消极的、直观的反应论。这种反映论认为,人们的认识只是静止的直观,是照镜子式的反映,而且认为这种认识是一次完成、一成不变的。在这种反映论看来,客观世界只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的对象即改造的对象。更何况,这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把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它们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因此,这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下半截是唯物主义的,上半截则是唯心主义的。它们既不了解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又“不能把辩证法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1页。

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于是,它们把认识的能动方面拱手让给了唯心主义。

黑格尔抓住了认识的能动方面,唯心主义地加以发展。在他看来,认识只是绝对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绝对观念在逻辑发展过程中,依次外化为自然和社会,最后达到精神即绝对观念的完满统一。虽然在阐述绝对观念的逻辑发展过程中,黑格尔天才地猜测到了许多客观规律,但在总体上,这种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是头脚倒置的。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顺过来”,这是一项深刻的、巨大的革命改造的任务。马克思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来,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只有在坚持实践观点的基础上,正确地说明革命的能动性问题,同时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才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它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的唯心主义(以及一切唯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诞生,就成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还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就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毛泽东指出,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因而能使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4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1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的认识变成了科学”。可见,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伟大的认识功能,特别是由于把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因而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成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三 划清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与不可知论的界限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认为主体能够反映客体,这种过程是能动的、辩证的反映过程,这就坚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持了世界的可知性。不仅如此,而且由于正确地解决了对于社会历史的正确认识的问题,因而这种可知论是彻底的可知论。

而不可知论却认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不能被认识的,或者是不能被彻底认识的。休谟和康德是近代不可知论的代表。在现代条件下,不可知论有形形色色的变种,但它们的共同本质总是否定人们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

四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概括的理论贡献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在理论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首先,这一科学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这样的科学规定。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点和本质,突出地强调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他还指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在于改变世界的思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样,就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认识过程中的两种能动作用揭示出来了,把能动性与革命性统一起来了,从而就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其次,这一科学概括,把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高度地统一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原则上都指出过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在联系。列宁曾经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还严肃地、深刻地揭露了割裂认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在《实践论》的一开头,就从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了批判,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这样,既批判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心史观的错误实质,更重要的是把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高度地结合起来,即把历史唯物论的内容同时当作认识论的内容。

再次,这一科学概括,更加强调了人们能动性的巨大作用。在关于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能动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的上述概括,既体现了客观物质世界的第一性,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更突出了在实践过程中的主观意识、认识的能动作用;既应尊重客观规律性,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又说:“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还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样,既反对了唯心主义,又反对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而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统一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二节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毛泽东在研究认识论问题时,紧紧抓住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这一对矛盾,以实践为中心,系统地、深刻地考察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一 什么是实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刻揭示了实践的哲学内涵、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一) 关于实践的含义。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31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什么是实践？马克思指出：实践是“客观的活动”，是人类“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还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恩格斯在驳斥不可知论时，把实践认定为实验和工业。列宁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对实践的内容作了引申和发展。他认为：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过程。他指出：“实践、实验、工业是衡量这个正确性的准绳。”又说：“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东西。”他还指出：“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他在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时指出：“在这里，在每一步分析中，都用事实即用实践来检验。”他还指出：“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可见，列宁把“实践、实验、工业”、“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行动的结果”、“事实”、“行动”等等都了解为实践，这就把实践概念的内涵揭示得更加具体、更为丰富了。

毛泽东继承并且深化、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实践涵义的内容，明确指出：实践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实践是人们在主观指导之下的、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突出了实践的能动性，阐明了实践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二）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早在 1937 年，毛泽东就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了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16、17、18 页。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71、140 页。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35、357、229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5、284 页。

为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他指出：“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到了1963年，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社会实践主要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当然，对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应当作具体的分析。把阶级斗争规定为阶级社会中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这是对的。但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的条件下，就不应当再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了，而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的主要任务和社会实践的中心课题。尽管在这种条件下，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而且在某种条件下存在着激化的可能性，然而，从总体上说来，在这种条件下，不应当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

社会实践具有多种形式。毛泽东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

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实践形式的论述，应当注意探讨毛泽东关于社会实践基本形式和多种形式的理论贡献。

（三）社会实践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

社会实践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各自对认识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首先，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强调指出：“物质的生产是人类多方面生活的基础。”“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人的认识发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285、285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5页。

展的基本来源。”毛泽东的这一概括,既有理论来源,又有实践根据。

从理论来源来看,强调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列宁则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高度,阐述了生产实践即发展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革所具有的伟大作用,他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从实践根据来看,毛泽东总结了人类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生产实践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的实践经验,从而才更加坚定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基本观点。

其次,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实践给予人们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指出:“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在阶级社会中,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在剥削阶级消灭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这种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毛泽东还指出阶级也是认识的主体,阶级的认识也受到阶级斗争的影响。早在延安时期,他就指出:“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1964年,在谈哲学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深入地阐述了这个思想,他指出:“阶级就是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懂得,人类社会将来总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更高级的人类社会的。这是一条客观真理。而“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推翻。”这也表明阶级是认识的主体。

在这种条件下,人们认识的发展固然会受到仍将存在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但更多地则受到阶级斗争以外的广泛的社会实践的影响。

再次,科学实验是一项愈益重要的社会实践。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1940年,毛泽东又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里得到自由。”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毛泽东不仅多次指出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页。

转引自《光明日报》1978年9月18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1469页。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本形式之一,而且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伟大作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技术革命”的问题。1958年初,他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并指出:“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他认为要领导好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1963年,毛泽东又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他号召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可见,毛泽东对于科学技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强国中的愈益突出的重要作用,是有很好的认识和深刻的阐述的。这是我们党后来把科学技术规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这一方针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特别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列宁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作用,他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的最终目的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and 决定作用。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10、110页。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1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对象,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因为认识必须有认识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只有实践才是沟通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活动这个环节,把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这样才能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才能把客观物质世界反映到头脑中来。恩格斯在阐述社会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一问题时,强调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泽东认为:“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他还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批判了那种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和自己头脑中固有的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明确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们在同客观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感性经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认识过程的辩证的运动。而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人的认识,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是一种枯竭的、贫乏的、主观自生的东西。

在认识来源的问题上,毛泽东还阐明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286—287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288页。

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毛泽东关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一方面,坚持了实践是认识来源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批判了忽视直接经验、反对实践第一的唯心主义错误,强调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论述也为我们有分析地继承和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提供了理论指导,批判了那种否定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自大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错误。

(二)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推动认识不断地向前发展。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列宁认为:“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

毛泽东总结了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与列宁的有关思想,深刻地论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首先,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地提出认识的新要求,因而推动认识的不断发展。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回答社会实践提出的新要求,这样,人们的认识就能够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地向前发展。毛泽东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是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他还指出:“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4页。

自然界方面的认识,由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正日益揭示出自然界是一种具有复杂性的交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对社会的认识就更加体现了实践的动力作用。人们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

其次,实践规模的扩大和实践手段的提高,也可以推动人们的认识不断地向前发展。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们现在不仅能够认识自然界各个特殊领域的许多特殊规律,而且可以认识若干不同领域的某些共同规律,认识由自然系统、技术系统、社会系统等构成的复合网络系统的许多更为复杂的规律,如生态科学、天地生科学等综合科学就承担着这样的认识任务。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是由于社会实践的推动。毛泽东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现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条件下,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就更能了解其复杂进程的情形、特点和规律了。

实践手段的进步可以推动人们认识的发展,这是毛泽东极为重视的一个认识论方面的内容。60年代以来,毛泽东更加重视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的“认识工具”对认识发展的推动作用。

他指出: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这些东西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认识的工具,人们在使用工具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也就逐步深入。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表明了这样一个历程。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机器,模拟了人的手脚,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交叉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发展,研制出不断改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和人工智能,模拟人的感觉器官、神经网络和大脑系统,部分地解放了人的脑力劳动,从而不仅以多个数量级的方式拓展了认识的空间范围,而且以多个数量级的方式在提高着认识的速率,大大缩短了认识事物、现象、过程的情形、特点和规律的时间。

第三,社会实践的发展,能够使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毛泽东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在《实践论》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又以领导革命战争和做好革命工作为例,论述了人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思维水平由于实践的推动,加上用心学习而得到提高的道理。

第四,实践的发生和发展是无限的,因而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也是无限的。毛泽东指出:“社会实践中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人类认识发展史表明,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对立统一

参见周培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光明日报》1978年9月10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296页。

的,在实践和认识的矛盾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实践的不断发 展,不断地打破人们认识上的旧框框,引起认识上的新飞跃。正因为如此,“将来认识的,将是一个别有天地 的世界。”

(三)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

如何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呢?马克思指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恩格斯认为:判断认识、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列宁指出:“整个活生生的人类实践是深入到认识论本身之中的,它提供真理的客观标准。”“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实践是检验认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1937年7月以前,他在读书批注中就指出:“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实践论》中,他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认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强调了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认为“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1963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这是因为,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65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191—192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4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9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890页。

性,只能靠社会实践,既不能靠理论(即使是正确的理论)来检验,也不能靠逻辑证明来检验。理论和逻辑证明本身是从实践中形成的,而且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毛泽东对列宁关于实践检验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辩证思想,也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实践检验认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一种认识、理论、学说,需要经过较长时间和多次反复的实践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以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经历,说明了这个道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更以社会斗争中的认识检验的曲折过程阐明了这个问题。

(四)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通过实践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早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的读书批注中,毛泽东就指出:“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在《实践论》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能够正确地解释世界,而在于应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应当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应用。为此,毛泽东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割裂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错误,明确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一再告诫人们,不应当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应当“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总之,是为了用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的实践。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实际地改造客观世界,才是认识的真正目的。

三 实践观点与天才问题

关于天才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虽曾多次使用过天才这个词,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问题提出来并加以系统的说明。这个任务是由毛泽东创造性地完成的。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谈到过天才问题,1970年8月,在反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他又从实践论的理论高度,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天才问题,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 天才只能来自实践。

天才,是在才能的意义上说的。所谓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这种聪明才智也属于知识的范畴,属于认识论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用实践论的观点对天才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既然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知识、才能也是认识论的问题,那就很容易了解什么叫天才了。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加上主观的努力,形成过人的知识和才能,于是人们便称这种人为天才。无产阶级的领袖们也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这种过人的聪明才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对“天才条件”怎么理解?这里所说的“天才条件”决不是“天生条件”,而是指相对于他们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来说,在以前的实践中他们所形成的智慧和才能。这种智慧和才能,对于他们参加当时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便构成了很有利的认识条件。但是,就才能的总体来说,都是来源于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经过主观的努力,才形成了他们杰出的聪明才智的。列宁在评价斯维尔德洛夫时指出:“如果我们看看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一生走过的道路,马上就能发现,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是在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具有的大革命家的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可见,任何天才包括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杰出的聪明才智,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所以,毛泽东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

人们如果脱离了实践,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天才。毛泽东指出:“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事实确是如此。不仅狼孩的事例表明,而且生活在社会封闭环境中的婴幼儿,如果他们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实践环境的话,他们的大脑只处于生物脑的阶段,而没有发展到社会脑的阶段,他们的心理、性格缺乏社会化的素质,就是说,这些人离开了社会实践,根本就无所谓认识,更谈不上天才。鲁迅很重视天才成长的实践条件,不承认与生俱来的所谓天才。他说:“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是一首好诗。”这就充分说明,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天才也只能在实践中形成。

(二) 人们的实践地位不同,知识、才能也就不同。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第7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正由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所以,即使人们都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但因为所处的实践地位不同,知识、才能也就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社会制度不同,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处于完全不同的实践地位;另一种情况是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下,在同一的大的实践过程中,但由于人们的具体实践不同,也会造成知识、才能上的某些差异。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垄断教育和文化,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没文化,有许多优秀的人才被扼杀了。所以,在旧社会,剥削阶级中虽然出了许多人才,也并不表明他们天生就聪明;而劳动人民中没有出多少人才,也不是由于他们天生就愚笨。这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制度,使他们分别处于不同的实践地位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翻了身,当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条战线已经涌现了许多优秀人才。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出现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喜人局面。这就表明,由于社会制度变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实践地位变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获得知识和才能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又为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三)人们的主观状况不同,在实践中也会造成知识、才能上的差异。

这里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们的立场、世界观不同,在同一实践过程中,对同一事物的认识,经常会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1927年,对湖南农民运动就有“糟得很”和“好得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二是人们的立场、世界观虽然基本相同,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主观努力不同,获得的知识、才能也就大不一样。就这个意义上说,勤奋努力更易于获得知识和才能,即所谓天才在于勤奋。

毛泽东多次指出,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基础,大脑只是思想的

加工厂。他认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科学史和认识史表明确实如此。人们要有知识,就必须在实践中获得原料,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的制作,才能生产出思想产品。大脑只是认识的生理基础,而不是认识的来源。在一个时代里,对于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头脑的生理差别是很微小的,但人们的知识、才能却往往有很大的差别。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这主要是由实践地位的不同造成的。马克思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使脑量悬殊,是否人们的知识、才能也就相应地差别很大呢?也不是,关键是看实践条件。近代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人们的脑量总的趋势是在缓慢地增加着,但人们的聪明智慧的发展却主要不是由于脑量的增加,而主要地是由于实践条件和科技条件的改善,以及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不断更新。可见,那种所谓大脑固有知识的观点,林彪鼓吹“天才是爹妈给的”等等论调都是错误的。当然,由于人们的认识需要有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神经网络作为生理基础,所以,发展优生学是对的。但是,如果想否认后天实践,搞所谓“天才复制”,那就是荒谬的了。

马克思曾经揭露过唯心论的先验论与唯心史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在唯心论者看来,人民群众“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列宁多次论述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基本原理,并且揭露过以往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毛泽东关于天才问题的论述,从天才问题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识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认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毛泽东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历史唯物论相统一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毛泽东关于天才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在认识论上坚持并发展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基本观点，在历史观上坚持并发展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这样，就把认识论上坚持实践观点和在历史观上坚持人民群众创造世界历史的观点内在地统一起来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也是对他自己1937年关于天才问题的思想的前进和深化。

总之，把天才问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并用实践论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的、深入的分析，揭示了天才问题的本质，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第一次解决了关于天才的理论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创造性的贡献。

第三节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地、深入地考察了实践与认识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这种辩证运动的许多特点和基本规律，得出了许多新的概括和新的结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

关于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许多精辟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论述。马克思指出：“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在统一中。”恩格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特别重视认识的反作用，指出：“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还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总结了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再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或者叫做“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两个飞跃的著名论断，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过程辩证法的思想。

（一）关于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

什么叫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毛泽东指出：“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就是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1963年5月，毛泽东把这种飞跃叫做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他说：“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117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28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种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相比,存在着质的区别。他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指出:“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这两个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要实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

那末,经过怎样的思维过程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呢?这个思维过程就是科学抽象的过程。关于科学的抽象,马克思指出:必须从现实的具体事物出发,经过科学的抽象,才能透过混沌的表象,达到在思维中具体地再现事物的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即达到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这种由现实中的感性具体事物出发,经过思维行程中的抽象,再到思维中的具体的认识方法,就是科学抽象的方法。列宁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抽象的基本要求 and 重要意义,他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为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明确地论述了实现第一个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两个条件。其一是“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其二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第一个条件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有了的,而第二个条件则是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思想,并结合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新概括。这是把唯物辩证法具体地应用于认识论,也就是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对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科学的抽象,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总之,经过科学抽象,要达到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问题,把握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律。经过毛泽东这样的概括,人们对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飞跃的辩证运动过程,就有了更生动、更具体的了解了。

毛泽东提出的这十六字诀的科学抽象方法,不仅是对辩证逻辑的重要贡献,而且也丰富、深化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一致原理的内容。因为从逻辑上说,这一科学抽象的过程,就是由丰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也就是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同时,这一科学抽象的过程,也包含着或联系着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逻辑方法的过程。而且,在这种科学抽象的过程中,较好地体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三者一致的认识过程。

(二) 关于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

什么叫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毛泽东指出:这就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也就是应用“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读书批注中,也指出:“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理论,完成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291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识的路程。”并说，“正确的理论积极地指导着实践。”“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对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比起从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来“更重要”，毛泽东指出：“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这是因为：

第一，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

第二，这一次飞跃，既是检验认识和发展认识的过程，也是用正确的认识武装群众、指导实践的过程。毛泽东指出：“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第三，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实际地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现代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从理性认识向社会实践的飞跃，实际地改造世界，这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项社会系统工程要求人们把“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具体化，就是说，应当在理性认识指导之下，结合对现实的种种信息的把握，形成实践理性，这种实践理性至少应当包括对实践的综合目标、实践的精神力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4—35、143、1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84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

量和物质力量的设定；接着应当考察具体的实践过程的系统与网络实践过程的系统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最后，应当建立具体实践过程的系统在实施过程中的支持、反馈和监督系统，等等。

在研究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这一问题时，还应当考察一下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的东西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一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在承认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的前提下，又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可以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既跟唯心论划清了界限，又避免了机械唯物论，而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二 认识的多次反复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的辩证法时，深刻地阐明了认识的曲折性和前进性，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正确认识的多反复性。

人的认识，总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认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人的认识总是在曲折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页。

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他还指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列宁谈到认识的曲折性与前进性时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 他还认为:“真理是过程。”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在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也就是获得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概括更完整、更明确了,他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正因为人们的认识要受到上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人们在认识过程中,一般地总是曲折反复、辩证前进的,而不是径情直遂、一次完成的。在这种曲折前进的辩证过程中,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为什么?这是由于:

第一,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是一种认识无限逼近客观真实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因而在这个过程中,主观不符合客观——错误在所难免。但是,人们总是要避免犯错误,或者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认识客观对象的必然性,逐步摆脱受必然性支配的地位,逐渐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的。这样,在人类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的过程中,“错误往往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561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21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第二,错误与正确也是一对矛盾。恩格斯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列宁也有同样的思想。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⁰ 在一定的条件下,错误可以转化成为正确,关键条件是认识错误的根源,吸取犯错误的教训,找到克服错误、走向正确的道路和办法。列宁指出:“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¹ 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政党,从正面学习固然重要,但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往往更为重要。因为这样才能印象深刻,对比鲜明,引以为戒,鞭策前进。这样,既认识了错误与正确的辩证关系及其转化条件,又能为了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这样的条件下,错误往往就会成为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关于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可以获得一个正确认识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这一概括,在人类的整个认识运动中,区分出一个正确认识获得的分过程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过程这样两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认识过程,这就深化了对认识运动的了解。

其次,这一概括,还揭示了认识运动分过程的一个规律,即经过实践与认识的多次反复,可以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对列宁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217、257页。

⁰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4页。

¹ 《列宁选集》第4卷,第192页。

关于“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具体的”等思想是一种具体的展开和深入的发挥。

第三,这一概括,把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具体地统一起来了。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就应当把握认识的曲折性与前进性,防止和克服认识的直线性与片面性。因此,在认识方法上,就必须把曲折性与前进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同时,在实践中,就应当正确处理曲折性与前进性的辩证关系,不断地开创新的局面。

(二) 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关于人类认识运动发展过程的总规律,恩格斯指出:“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的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人类认识就是在这样曲折前进的过程中,无限地接近客观世界本身的。列宁认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可见,列宁也认为,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辩证发展的无限过程。

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总结了我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吸取了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明确地概括出认识运动的总规律。他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关于认识运动总规律的这一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126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2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学概括,既高出同时代人的理论水平,又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第一,这一科学概括,贯通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部内容。这就是说,认识的无限发展过程是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辩证运动的曲折前进的过程。这就不仅把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时代人(例如李达)关于认识运动总规律的思想在理论上提高了一大步,而且使认识运动总规律的表述,具有了更简洁、更明确、更完整的理论形态。

第二,这一科学概括,揭示了在认识运动的总过程中,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规律性,即尽管在形式上是循环往复的,而在内容上则是前进上升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深化和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

第三,这一科学概括,还揭示了人类认识过程就是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的辩证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由无数圆圈(即无限的循环)组成的无限的前进和上升的曲线。同时,这一科学概括,把认识总过程中的“循环往复”与认识分过程的“多次反复”内在地贯通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认识分过程中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而在认识运动的总过程中,“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即相当于认识分过程中经过多次反复获得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认识的矛盾运动是无止境的过程,人们在这一总过程中由错误日益走向正确,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但不可能穷尽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没有穷尽一切的“终极真理”。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人类实践也是无限发展的,因而人们的认识和真理也是无限发展的。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

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上海笔耕堂书店1937年版,第366—367页。

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那种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本质。

三 真理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在分析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践与认识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真理发展的规律和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

（一）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

人们的认识发展过程，既是真理战胜谬误的过程，也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关于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也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列宁指出：“任何真理，如果说得‘过火’，……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又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列宁认为：“绝对真理是由发展中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相对真理是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客体的相对正确的反映；这些反映日趋正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7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

确；每一科学真理尽管有相对性，其中都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

毛泽东在新的实践条件下，明确地把真理战胜谬误作为真理发展的规律提了出来。他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关于真理发展规律的这一科学概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首先，揭示了认识发展过程中一个方面的规律，即真理不仅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而且是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比起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思想来，在对真理发展规律的研究上确实是深化和前进了一步。

其次，把认识论、伦理学、美学三者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真、善、美三者以真为主的内在统一，并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真、善、美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这对推动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这些学科的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再次，根据真理发展的规律，指明共产党人应当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应当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执着地追求真理，勇敢地捍卫真理，坚定地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应当坚定地实践这样的要求：“共产党人的一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5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5页。

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坚持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为什么?因为真理是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东西。人民只要掌握了真理,就能所向披靡,百折不回。所以,无产阶级在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由于手中有真理,身边有群众,就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无所畏惧。

(二) 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在论述认识发展的辩证法特别是真理发展的辩证法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109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2页。

想。”毛泽东的这一结论,不仅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结,而且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这一结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和真理总是具体的等思想。列宁认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历史地,()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只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斯大林认为：“一切依条件、地点和时间而转移。”

毛泽东教导我们，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都必须注意它们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不能笼统地、抽象地加以看待。即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应当看到，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实践的情况不同，而且在同一历史时代，各国实践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或很不相同；至于在同一个国家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实践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应用理论于实践的时候，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地、历史地分析实践的不同情况，才有可能使理论和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同时，对理论本身也应当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理论不可能穷尽对事物的认识。而且理论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而实践却是活生生地向前发展着的。因此，在理论回到实践中去的时候，应当研究实践中新出现的东西，研究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变化等等复杂的情形，使理论在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能够得到证实、深化和发展。

其次，这一结论，揭示了党内不同政治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在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段时间内，党内曾经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了两次失败。这些错误路线，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却有共同的认识论根源，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总是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各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地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和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464页。

《斯大林选集》（下），第43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办法。因此,这种正确路线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作为其认识论基础的。

(三) 真理发展的规律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毛泽东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自觉地应用真理发展的规律,于1956年为我国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既是发扬学术民主,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也是发扬政治民主,巩固和发展我们国家的方针。

鉴于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各种社会矛盾,又迫切需要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而科学、文化实践中又存在着各种是非、真伪问题。因此,毛泽东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只有承认各种矛盾,应用真理发展的规律,自觉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认为:“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这是对真理发展规律在政治实践中的自觉应用,这是完全合乎认识辩证法的。鉴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将长期存在,而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又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4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415、414页。

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实践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正确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就满园春色，欣欣向荣；政治上就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经济上就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思想上就有力地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精神领域的指导地位。而这些方面的综合作用，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第四节 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

在对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问题的研究中，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思想，总结了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作出了多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具体展开，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问题上的思想。

一 规律是客观的发展的

所谓规律，是指事物、现象、过程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和关系。列宁曾经从多方面论述了规律的客观性、网络性。他指出：“规律是宇宙运动中本质的东西的反映。”“规律是本质的现象。”他还多次指出：本质和规律有初级的、二级的乃至无限层次的。

毛泽东认为，本质是“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又说：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60、15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揭露本质。他还指出:规律是客观事物固有的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应当从客观事物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要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规律”。

毛泽东不仅指出规律是客观的,而且认为规律是发展的。他以战争为例,明确指出,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他认为研究战争规律,不仅应当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应当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更应当着重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研究规律的客观性和动态性,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二 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东西

自觉能动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从多方面论述了在实践中人的这种自觉能动性,他曾以最蹩脚的建筑师和最灵巧的蜜蜂为例,深刻地揭示出自觉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东西。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而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列宁指出:“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把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和深刻的说明。他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518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页。

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这一科学界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特点。

第一,客观性。毛泽东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在讲到战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首先重视“客观物质条件”、“客观因素”。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地、客观实际中抽引出主观的东西,才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才能做好一切革命工作。

第二,目的性。人类实践的特点,就是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开始的时候,就把实践过程的结果在观念形态上确立起来,作为实践的目的,规范着实践的过程。恩格斯指出:“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列宁认为:“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毛泽东在阐述自觉能动性时,十分注意目的性的作用。他认为,人们根据客观实际,形成主观目的(表现为思想、道理、意见、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等精神性的东西),在这种主观目的指导之下,实践的过程就是动态地实现主观目的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非常复杂,包含着客观主观化、主观客观化的动态协同、整体优化的过程。但是,依据客观实际,形成主观目的,对于实践过程的展开和成功,的确十分重要。

第三,实践性。毛泽东认为,根据客观实际,形成主观目的,这固然重要。但这还是处于主观状态的东西。要能够实际地改造世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47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1页。

界,就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他指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认为,就战争问题来看,客观条件固然重要,但这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要真正地分出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三 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自觉能动性

人们的实践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网络系统,这既包括实践对象、实践的中介系统,又包括实践主体。实践对象、实践的中介系统存在着很多规律性的东西,而实践主体则具有自觉的能动性。如何在实践过程中,把这三类子系统优化地、动态地组合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自觉能动性。

首先,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们的实践,必须在实践对象、实践手段等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但是,如果只限于既定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还不能使实践过程顺利展开并取得成功。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毛泽东以战争为例,极其生动而又非常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

壮的戏剧来。”毛泽东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战争实践过程中，正是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这种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其次，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观努力能起决定的作用。人们的实践过程固然要使客观条件、客观规律性与主观作用、自觉能动性优化地匹配起来，并交互作用。但是，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是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因此，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在尊重客观条件、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主观努力、自觉的能动性可以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指出，在战争过程中，“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四 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必然与自由关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客观与主观、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互关系时，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贡献。

（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中反复重申了这些思想。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48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

毛泽东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必然与自由关系的命题的思想。他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旧哲学家们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但毛泽东认为:“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这两个过程的。”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还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1962年初,毛泽东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再一次深刻地阐明了必然与自由关系的问题,他重申:“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从必然向自由的转化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着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那末,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必须了解,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毛泽东一再指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又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怎样才能认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规律呢?

首先,要“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加深对它的认识,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485页。

同上书,第833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同上书,第824页。

同上书,第826页。

弄清楚它的规律。” 努力学习,最重要的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掌握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要使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

其次,“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调查研究就是从自身的实践过程、实践经验中,通过反复的比较研究,来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二)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历史过程

人类认识和处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不仅就一个具体过程来说,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而且就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和认识史来说,也是一个辩证转化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论断把人类的发展史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内在地贯通起来了。人类的发展史表明,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们应当根据“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运动总规律,“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

同上书,第 829 页。

同上书,第 828—829 页。

同上书,第 829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5 页。

所创造,有所前进。”从而不断地推进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辩证转化。

其次,从实践上来说,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转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强大生命力内在地贯通起来了。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当社会进入如马克思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在研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历史转化的辩证原理时,其结合实践的着重点也是在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性、优越性和生命力。我们应当以恩格斯和毛泽东的思想为精神武装,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清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自觉地为实现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第五节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学说。毛泽东根据革命实践的新鲜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解释、发挥、发展了这一学说。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前,哲学家们都力图用自己的世界观解释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认识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世界与改造世界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世界，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以社会实践为其基本的特征，“实践贯串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样，从整个人类认识史来看，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辩证地统一起来，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二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

认识世界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改造世界提供前提。改造世界的内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经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

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交互作用、辩证统一的过程。毛泽东指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中，更应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更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5页。

面地、更深刻地认识世界。“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辩证地统一起来。毛泽东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应当正确地处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就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关系来说,我们首先应当重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自身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人们可以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中,反观主体自身。因此,我们应当自觉地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学习和锻炼,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努力提高主体自身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在实践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

三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辩证统一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揭示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革命人民是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这一伟大任务的历史主体。毛泽东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就揭示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与广大革命人民。这同马克

同上书,第840页。

同上书,第48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恩格斯认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其次，指明了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共产党领导机关是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实现上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的指挥者和组织者。毛泽东告诉人们，领导机关在抓各项任务的过程中，要着力抓住“基本任务”——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这样，才能使领导机关、决策者保持清醒头脑，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下功夫，着力抓住牵动全局的战略问题，组织和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伟大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再次，阐明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和前进方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就是要把黑暗的旧世界“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方向又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我们应当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勇敢地承担起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历史重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又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地推进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事业，经过若干代人的不懈努力，使世界进入共产主义这个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更高级的人类社会。”

第五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做了许多重要阐发。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阐发的主要是关于社会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突出贡献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而贯穿这两个时期的则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毛泽东这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见解,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节 社会革命论

毛泽东的社会革命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比较,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而逐步形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是毛泽东阐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和理论的代表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阐述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三大法宝;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毛泽东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是什么呢？对于这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毛泽东作了系统阐发。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就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达到了顶点。这个革命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发生了根本变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开始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性质虽然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对象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外，还有官僚资本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依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从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来看，前者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者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1317页。

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从总体上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但是在不同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有所不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和站在他们背后支持他们反共剿共的帝国主义势力。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强大的封建势力,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和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等等问题都发生了。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毫无疑问,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7页。

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呢?毛泽东指出,应当依靠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而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动力,而农民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军。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农民战争,农民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5.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

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弄清楚之后,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也就不难解决了。因为既然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那么,中国革命终极的前途,就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毛泽东不仅深刻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而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关于政治纲领,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成的基本成分,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的过渡的国家形式。毛泽东批驳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指出在新的时代,国际国内条件都断绝了这条道路,它只能是旧中国的道路。毛泽东还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述,国体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地说,国体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采取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集中制,即国体——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关于经济纲领,其基本内容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反对一般资本主义,而要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因素的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这些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

关于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

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因此,文化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现阶段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整个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离不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

综上所述,从政治上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从经济上看,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从文化上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纲领的论述,体现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反映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 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的辩证统一

把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辩证地统一起来,是毛泽东历史唯物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毛泽东以革命阶段论为基础,以革命发展论为指导,在革命的大目标下,立足于当前阶段的任务,又为下一阶段准备条件,批判了混淆和割裂两个阶段的“毕其功于一役”和“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这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的认识,经

历了一个过程。虽然 1922 年 7 月党的“ 二大 ”提出了反帝反军阀的民主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但是在党的幼年时期,历任主要领导人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使党犯了许多错误。党内不仅有等到资产阶级发展了,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再行无产阶级革命的“ 二次革命 ”论,而且有企图合并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 一次革命 ”论。为此,毛泽东强调“ 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 左 ”的错误,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是说,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现时的革命还是第一步,即民主革命,它所要完成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是属于新范畴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过程,混淆两种革命的界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是根本错误的。

毛泽东不仅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而且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他认为,经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结果所决定的。因为在政治上,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52 页。

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获得发展,全国政权建立。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因此,割裂两个革命的必然联系的“二次革命论”也是根本错误的。

毛泽东曾经把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比喻为文章的上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过程有机构成的两个阶段。一方面,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从社会制度来看,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能把不同质的革命混淆起来。另一方面,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两者又是相互衔接的,不应当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毛泽东的论述,把革命发展论和革命阶段论辩证地统一起来了。

二 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三大法宝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主义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着城市。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可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利用议会等各种合法方式和手段,团结群众,积聚力量。或者象苏联那样经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然后再把革命推向乡村。而是必须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长期积蓄力量,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通过武装斗争,逐步夺取城市。

农村革命根据地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并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是具备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

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平衡与不平衡是反映事物运动状态的一对范畴。毛泽东把平衡与不平衡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运动状况结合起来,从揭示事物发展过程中诸矛盾或矛盾诸方面力量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不同对比关系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然后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可能性。他指出:“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落后和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具体表现在“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百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于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于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毛泽东还从空间和敌我力量分布上分析了这种不平衡,“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地域广大,地形复杂,敌人的统治中心和兵力集中在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则是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毛泽东的论述表明中国革命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只能首先在农村发展和首先在农村胜利的可能性。而共产党的领导和相当力量红军的存在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主观条件。有了这个主观条件,就能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在农村建立起一块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根据地建设。农民土地革命是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主要支柱,中国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而根据地建设则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依托。三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

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同武装夺取政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法宝之一。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由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不能享有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因此中国人民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另一个法宝。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就系统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后将会引起的各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批驳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

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在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1940年12月,毛泽东又写了《论政策》一文,深入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复杂矛盾,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即统一,又独立,明确提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恰恰不懂得这种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辩证法,而是割裂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陷入了形而上学。

党的建设,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法宝。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只有把党建设好,才能正确处理好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问题。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和曲折历程表明,党的建设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而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发展。所以,正确理解与处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中国革命正是依靠这三件武器即三大法宝,才取得了农村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三 人民民主专政学说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是毛泽东社会革命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着重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是党和毛泽东的一个创造,它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发展和系统化的。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提出了“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口号。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进一步指出,新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年6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党的历史经验加以总结,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把我国的政权称为人民民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主专政，体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使之更容易为各阶级和各阶层人民广泛接受。

那么，各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地位如何呢？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逐步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还应当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其次，阐明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呢？毛泽东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敌人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对于人民内部，应当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应当保障与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于反动派则应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当然，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要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并在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劳动中改造成成为新人。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阐明了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两个方面的区别与联结的辩证法。对人民民主和对敌人专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两个不同方面,“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民主只能给人民而不能给敌人,专政只能对付敌人而绝不能对付人民。对人民实行广泛民主,对敌人实行有效专政,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对敌人专政,才能保障人民民主;只有对人民民主,才能更有效地对敌人专政,这就是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

再次,阐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外职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有两种,一是国内职能,一是国外职能。国内职能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同时,还包括以民主的方法教育人民和解决人民的问题。对敌人则实行专政,即“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当然,对敌人专政也应当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他们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内职能,还有组织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在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6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外职能也有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二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胜利了,他们又封锁、孤立、扼杀我们,只有与之作坚决斗争,他们才可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最后,阐明了阶级、政党、国家的产生与消亡。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了阶级、政党、国家的产生与消亡问题。他指出,剥削阶级把国家看成是永恒存在的,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相反,公开阐明阶级、国家、政党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也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包括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丧失其作用,逐步地衰亡下去。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利、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远景和规律,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在对待国家问题上,毛泽东批判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永恒存在”论。资产阶级竭力宣扬党和国家的永恒存在,歪曲阶级、政党、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这是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不懂得阶级、政党、国家是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也不是永恒存在,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现象,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另一种是“立即消灭”论。资产阶级认为,无产阶级既然主张消灭国家和政党,就要立即消灭它,为什么还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政党呢?这里,又表现了他们完全不懂得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阶级、政党、国家的消亡是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的,条件不具备是不能消灭的,也不应该消灭。为了将来消灭一切国家和政党,现在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家机器,这

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节 社会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坚持用矛盾的观点考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且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特点以及解决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贡献。

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提出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吞吞吐吐,缺乏清醒认识的。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理论界在1955年至1957年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问题展开了讨论,报纸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文章。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回答的呢?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些表述的思路是基本正确的,可取的,但表述的不够确切。比如,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提法,容易使人误解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已经不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了。那么如何表述的更确

切、更科学呢？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早在 1937 年的《矛盾论》中，毛泽东就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提法，主要指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毛泽东明确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见于 1957 年初的两次讲话，一次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他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的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另一次是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抓住了影响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一把钥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邓小平也说：“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³⁴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73 页。

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

二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其次,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再次,毛泽东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由于有相适应的一面,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而不需要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方式。又由于有相矛盾的一面,就决定了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调节,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毛泽东明确表述了这一思想,他说:“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37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新范畴,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式,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但是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也是有其缺陷的,即过份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而对发展生产力重视不够。1953年,毛泽东在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在谈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也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生产关系的变革,特别是所有制的变革是十分关注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片面地强调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的变革,就有可能导致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归结为生产关系变革,又把生产关系变革归结为所有制变革的片面性错误。试图通过对所有制人为地不断变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所谓社会基本矛盾,实际上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么三个基本范畴和基本内容,这三个方面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在谈论社会基本矛盾时,一般地说,毛泽东更多地是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着眼的,而不是从生产力着眼的。例如,在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相适应又相互矛盾的情况时,认为其相矛盾之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所有制方面,公私合营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社有一部分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因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缺陷的存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

在等等,就是没有谈到发展生产力问题。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邓小平也说,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可以不注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首先应当注重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

第三节 两类社会矛盾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认识我国的社会矛盾呢?毛泽东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与分析我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明确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并且着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又一重大贡献。

一 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与形成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试图对错综复杂的两类矛盾做出概括和说明。1925年,他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工作总结》中指出:“我们有两种矛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329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3页。

盾,一种矛盾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种矛盾是外部的矛盾,即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由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谁把这两种矛盾混为一谈,谁就犯了最粗暴的反列宁主义的错误,谁就是糊涂虫,或者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1930年,斯大林进一步指出,应当努力把苏联国内矛盾区分为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可贵探索和新的概括。但是斯大林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些矛盾,其灾难性的结果是肃反的严重扩大化和骇人听闻的“大清洗”。

新中国成立以后,处理各种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社会矛盾的课题也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51年6月,刘少奇在谈到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时指出:“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矛盾的结构。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与资本家工厂中的阶级对抗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在相互非敌对的、可以和解和应该调和的矛盾。但它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节和处理的矛盾。” 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推而广之,把社会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可以和解的矛盾。”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6、343页。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4页。

1955年5月,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分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指出:“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一种是对人民内部(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经毛泽东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正式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1957年1月,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更为明确地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这就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明确而突出地提了出来。随后,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以及同年四月刘少奇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7—158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页。

参见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二 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毛泽东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强调处理两类矛盾时，应划清两种界线，解决敌我矛盾是分清敌我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但是，是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如果混淆了这两种界线，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

（二）解决两类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毛泽东说：“我们历来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因为敌我矛盾是根本利益对立的对抗性矛盾，不能不用专政的方法。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加以解决。

（三）两类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刘少奇在谈到群众闹事时说，“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也是为了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同时促使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

(四)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不仅指出怎样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而且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刘少奇也说:“现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五)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具体方法。例如,在经济工作中,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法,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方法;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法;在处理党群关系上,采取整风与教育的方针和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采取各民族团结平等,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方法;如此等等。

值得提出的是,刘少奇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例如,他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而真正的矛盾产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57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9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生在领导机关犯了官僚主义。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他又提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就分别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热点及产生的原因,从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同政治民主和物质利益问题联系起来。

当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对当时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类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内容。其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上的,所以特别强调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忽视用经济手段来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其三,对于民主与法制也重视不够,论述较少。因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第四节 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人民群众是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03页。

同上书,第303页。

历史的主人的科学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创造,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观点是党的领导工作的出发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的工作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形成

我们党在建党之后就明确提出,进行革命活动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党的任务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了《九月来信》,信中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这封信在谈到筹款工作时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谈到单纯军事观点时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的执行。”强调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号召“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一定要关心群众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对于柴米油盐等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要充分关心,切实解决。这时,群众观点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又科学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突出强调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1945年4月的《论联合政府》中,他进一步指出,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群众观点概括为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样,党的群众路线在理论形态上就正式形成和比较完备了。

全国解放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党的干部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而不能做官当老爷,不能搞特权。粉碎四人帮以后,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新的概括,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90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

二 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内容

党的群众路线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二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一)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在《延安 解放日报 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能不能坚持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群众路线所以是党的根本路线,是因为群众路线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运用。历史唯心主义认为,世界历史只是英雄、统帅、征服者、帝王将相等人物活动的结果,而把人民群众排斥在外。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大局,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是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才能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群众路线所以是党的根本路线,还因为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无产阶级政党不是谋私利的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它的全部目的和最高宗旨。无产阶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归根结底,就是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集中起来,形成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然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利益而奋斗。无产阶级政党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同时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它是适应无

转引自 1968 年 7 月 17 日《解放军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42 页。

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斗争需要产生的,它“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目的、行动准则和工作作风,都是由它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所决定的,这是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二) 群众观点是党的领导工作的出发点。

群众观点是党的领导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概括出的群众观点,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正如《国际歌》所高歌的那样,“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生气勃勃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

第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一切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群众的智慧,代表群众的利益,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个共产党员和干部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身为人民谋利益,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

第四,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党的干部绝不可脱离群众,高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06页。

踞于群众之上,而应当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深入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各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掌握的一部分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反之,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对群众专横跋扈,这实在是一种角色倒置,是对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的践踏。

第五,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所谓负责,就是指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中所担负的一种实际责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下级,要执行党的指示,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要对党负责。作为领导,要为群众服务,为群众谋利益,就要对人民群众负责。我们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因此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是不可分的。应当看到党的路线、政策,从总体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它要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在群众中贯彻实施。同时,共产党员又要随时准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对的,修正错的。

第六,党要依靠群众又要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党的工作必须依靠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离开了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就会一事无成。当然,依靠群众并不等于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是说要善于从本质上认清群众的智慧、力量和首创精神,从中汲取养料,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必须在依靠群众的同时,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而不能人云亦云,放任自流,更不能将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以上这些观点,这些年有的搞乱了,有的淡漠了,因此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切实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对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的工作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工作方法和领

导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理论形态上对这一基本方法作了深刻的概括和生动的说明,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比较,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基本内容和实施过程,而且深刻揭示了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致性,从而把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将群众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即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根据实际的条件和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正确的决策和办法,归根结底,只能来源于从事社会实践的广大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来必须注意两点:一是领导者必须切实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掌握大量的真实的材料。二是对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方针、政策、计划、办法。

“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拿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变为群众的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是因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只有再回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制定方针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人民谋利益。只有广大群众接受了党的方针政策,并自觉行动起来,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

的。因此一方面要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要在群众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及时调整党的方针政策。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企图一劳永逸是不现实的。群众—领导—群众同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是一致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统一的。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三 在新时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那么,如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呢?

(一) 必须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

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充分发扬民主与贯彻群众路线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坚持群众路线,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民主。反之,没有充分的民主,贯彻群众路线就是一句空话。充分发扬民主,就是在各项工作中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贯彻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发扬民主,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说过,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工作的本质。

建国以后,我们有许多干部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但是由于领导体制上还存在着种种弊端,使得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其主要表现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

行、互相推诿、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下瞒上、专横跋扈、循私行贿、贪脏枉法等等,这种状况不仅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损害,而且严重脱离群众,损害了党群关系。

(二) 必须坚持科学决策,反对独断专行。

决策是在若干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做出抉择,选取最佳方案。决策的基本程序是发现问题,确定目标,价值准则,拟制方案,分析评估,方案选优,试验证实,普遍实施。现代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重视智囊团、智力库的作用,鼓励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也就是说,要广开言路,形成一个民主、平等、协商的环境和气氛。

毛泽东曾经说过要多谋善断。多谋就是要同广大群众商量,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仔细思考,反复权衡。他批评有些人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听相同的意见。善断就是要把握时机,当机立断。决策者必须审时度势,掌握火候,拖延决策会使原来的最优方案大为逊色,甚至失去意义。多谋善断的重点是谋,谋是断的基础。而要真正同群众多谋,就要使群众敢讲话,讲真话,讲心里话。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并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又要敢于决断,既反对主观武断,又反对优柔寡断。总之,制定政策策略,拟制工作计划,决定重大事项,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种意见,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和论证,保证决策和决策的执行符合人民的利益。

(三) 必须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

我们党在反腐败问题上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问题还很多,有的还很严重,群众反映强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更需要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对此绝不能有丝毫懈怠。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切实抓紧廉政建设,层层落实,严肃党纪,继续抓紧查处大案要案,这是能否真正取信于民,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关键所在。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也说过,打个比喻,人民群众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只要我们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就能进一步缓解矛盾,理顺情绪,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对此,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

实际运用篇

毛泽东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过程中,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2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820页。

始终不渝地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各种实际领域,形成了毛泽东领导方法论、党的建设辩证法、政策和策略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等等,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些内容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

第六章 毛泽东领导方法论

领导方法问题是各行各业的各级领导者在实施领导活动中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方法,这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的一个新领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一节 必须讲究领导方法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目标,毛泽东很注意总结领导工作经验(教训也是经验),在他的著作中,对于领导方法的重要性及其实质等问题有过一系列的论述,这些内容是毛泽东领导方法论的重要部分。

一 方法与领导方法

任何哲学都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不过,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达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

由于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用哲学去解释世界,而在于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作为方法论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因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们在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观的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它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

武器”。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毛泽东则在1937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进一步指出，辩证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他还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

哲学上讲的方法论当然包含有方法的意思，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属于与世界观同一个层次以至于就是一个东西的概念，后者则是方法论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具体化。可以这样说，方法论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而方法则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采用的具体作法、方式或手段，是哲学方法论在实际工作中的转化形态。

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通常又称为思想方法，即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观察、思考、研究和分析各种事物、矛盾、现象和方法的方法。人们改造世界的方法通常又称为工作方法，即人们为了达到某种预定的目标，在实施工作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办法、程序和手段。从它们与哲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看，前者是其直接的转化形态，后者是间接的转化形态。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工作中的进一步具体化。当然工作方法不仅表现着某种思想方法，而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还反映着具体工作的特点。严格说来,工作方法是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思想方法与一定的具体工作特点的辩证统一体。毛泽东1959年4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曾经说: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他在其他的讲话里还说过,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唯物论辩证法。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等等。这些论述说明,工作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正确的科学的工作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世界上所有的人(正常的人)都承担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双重任务,因而都有一个解决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但是由于领导者在人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领导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解决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显得特别重要。

领导方法这个概念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从广义上讲,领导方法就是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称。从狭义上讲,领导方法就是领导者的工作方法。在毛泽东的著述中这两种情况都有,有时还有“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用的情况。

二 领导与领导方法

领导方法对于任何领导者都是重要的,对于处于中国革命和建设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领导者来说,这个问题就更重要。这是由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敌人异常强大,所承担的革命任务极其复杂,所管辖的地区广大而分散,所领导的部门和方面又极为繁多。在建国以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更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为了实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毛泽东一贯注意对领导方

法问题的研究。

早在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已经认识到掌握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他不但强调对于社会客观情况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亲自进行许多深入的社会调查,写出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其中不少是调查报告),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为党制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开始对党在领导实践中所创造的领导经验进行认真的总结。他不仅明确提出了“注意工作方法”的号召,而且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基本的领导方法都有了初步的但又是相当精彩的论述。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就奠定了这些基本领导方法的雏形,标志了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形成了理论体系,达到了成熟的程度,其标志就是毛泽东1943年6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他在这篇著作中明确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体系。其中特别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

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更可以看出我们党对领导方法问题的重视,他在这篇著作中进一步提出了“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毛泽东更加注重领导方法的研究。他不仅继续强调“注意领导方法”的问题,而且又有一系列关于领导方法的著述。1958年1月,他总结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新的领导经验,吸收了其他领导同志的集体智慧,写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目的是想在领导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经济情况的需要。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他在1959年4月举行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60年代初,他又重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结合新的形势任务,提倡和试验了一些新的领导方法。

在这样一系列著述中,毛泽东曾经从三个方面阐明了领导方法的重要性。

第一,讲注意领导方法与完成领导任务的关系。早在30年代,毛泽东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就会使我们的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他生动形象地把工作任务比作过河,用桥或船来形容工作方法。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3页。

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他还说,对于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这些说法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领导方法的重要性。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坚持这个观点,他进一步指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方法对是做好工作、完成任务的必要条件,没有正确的有效的领导方法,要完成预定的领导任务是不可能的。

第二,讲注意领导方法与实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关系。规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必要的,因为决策是领导者的第一个职责,但是如果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方法,那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制定不出来;既使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离开了正确的领导方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执行不了。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过:“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 建国以后,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1953年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的干部“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1959年4月,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还专门讲过实行好的领导方法与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要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3页。

针。虽然从历史经验的总结看,我们党 1958 年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存在着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缺点,但是,毛泽东的这段话所讲的路线与方法,以至前一段话所提到的理论、路线、政策与方法之间关系的道理,无疑是正确的。可以说,理论、路线、政策、方法,是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由领导到群众转化、飞跃的一个一个的阶梯,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梯级,都不可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化、这种飞跃。即是说,领导方法是实现领导任务进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阶梯。

第三,讲不注意领导方法与犯错误的关系。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那么为什么在领导者中会发生犯错误的情况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少人犯错误与不注意领导方法或者说领导方法不对头有关系。毛泽东早在 1937 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就说过: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他这里讲的错误的工作方法主要指的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主要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等现象。建国以后,他又指出:“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他还说过,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从以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领导方法问题对于领导者来讲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活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手段、武器和桥梁。因而,为了作一个称职的领导者,必须讲究领导方法。我们现在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时期,注意和改进领导方法,问题依然是一个大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要“注意工作方法,

克服官僚主义。”他还特别讲到：“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这都说明，领导方法问题忽视不得。为此，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三个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倡导的领导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思想体系。就其适用范围而言，可以将这个思想体系分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两个大的层次。所谓基本方法是指领导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所谓具体方法是指基本的领导方法的进一步具体化。本节先来讨论毛泽东领导方法中的三个基本的领导方法。

一 实事求是的方法

在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要属实事求是了。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中的精髓；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一条最根本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由来已久。且不说他在青年时代就曾经提出过，中国人必须切实加强对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的调查与研究的思想，在建党之后，他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领导实践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930年5月，他在《反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7—268页。

对本本主义》中已经相当明确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是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他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之后，他又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它是与“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的那样狂妄的态度相对立的“科学的态度”，惟有这种科学的态度，“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的涵义给予了深刻的解释，他指出：“‘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解释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的界定，但同时也说明是一种日常工作可操作的方法。毛泽东认为，要作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建国以后，他也多次阐述过实事求是问题。在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的努力中，他再一次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搞实事求是年。这些话哲学的色彩很浓，但直接的意义在领导方法上。

毛泽东指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2—66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是对立的。” 为了提倡实事求是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批评主观主义方法的内容。

早在 1929 年 12 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他说:“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 在他提出的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中特别强调,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同时,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会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之后,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点的主观主义。他揭露说,之所以会发生主观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唯心精神在作怪,因而他提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

1937 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对主观主义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批判。他指出,不管是哪种表现形式的主观主义,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后来,他在延安整风中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他指出:“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正是在对主观主义批判的同时加以阐述和确立的。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5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5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0 页。

还应该指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的几个基本点都具有领导方法的意义。

第一,从实际出发,是贯彻实事求是方法的根本前提,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从事实出发的唯物论思想的运用和发挥。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主义“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在《费尔巴哈论》中,他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所引起的革命变革时又指出:“现在无论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可见“从事实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认真贯彻这个观点,在中国革命的长期领导工作中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功,而且在于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更加丰富和发展了“从事实出发”的思想,其突出表现是他关于从实际出发的思想。

正如前述,毛泽东关于“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应该说由来已久,不过作为一个科学的命题,“从实际出发”的明确表述却是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在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后来,这个命题又发展为“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讲过:“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表述很快出现在两个月之后(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写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里。这封信中说:“一切从实际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0页。

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毛泽东关于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事实出发思想的继承,但是他把这个思想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更加深刻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实际首先是指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这段话是说,所有属于主体研究和认识对象的东西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研究和认识的依据,这里既有物质的东西,又有精神的东西,即又有一个从思想实际出发包括从主体的思想实际出发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这就成了从主观出发的唯心主义了呢?不是。从主观出发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种主观与客观完全是分离的。我们这里讲的可以从主体的思想实际出发,是因为这种思想实际不是人为编造的,不是虚假的,而且这种思想实际与客观实际有着密切的联系,归根到底,它是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另外,这里讲的从主体的思想实际出发,是专指主体自我研究、认识(比如一个团体或一个人要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批评)而讲的,除此之外,都是从客体出发。

同时,还要看到,“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通常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人们的行动(亦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概念,时常是双关的。因而从实际出发也有从实践出发的意思。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就曾明确使用过“从实践出发”的提法。把实践作为出发点是就人的认识同实践的关系角度来讲的。这是因为,客观世界只有纳入人们的社会实践领域之内,才能对人们的思想发生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直接影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反复讲“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因而社会实践是沟通主观与客观的桥梁。

另外,从实际出发这个命题还含有从群众出发和从国情出发等意思。总之,从实际出发作为实事求是的一个基本点有着丰富的内容,它是贯彻实事求是方法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前提。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是贯彻实事求是方法的根本途径。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早有论述。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这个思想已经相当明确。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通过阐述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特别是通过引证斯大林的那一段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等等,进一步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与中国的实际相联系的命题是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论新阶段》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正是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理论联系实际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以更概括更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3页。斯大林这段话见《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00页。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精练的语言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40年1月,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继而到了1941年3月,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直接使用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提法,他说:“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大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毛泽东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在延安整风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进一步的升华。在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的过程中,他用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和阐述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重要性和具体方法。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把是否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到党性纯与不纯、完全不完全以至有没有党性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实行这个原则,“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他还把这比作是“有的放矢”,其中“的”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的。他认为,只有真正贯彻了这个原则,才是有党性的表现。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涵义呢?毛泽东对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在 1942 年 2 月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有过一处经典性的表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段话至少包括以下三层意思:其一,必须善于把握和运用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方法论意义或直接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其二,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认真开展对于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其三,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必须是获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切实解决中国革命在各方面的问题,并上升为新的理论。

第三,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是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实践论》讲得很清楚,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1940 年 1 月,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到了 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能“经过实践的考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以此为中介,同年 11 月,他在修改一篇文章时,亲笔加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句话,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上最明确的表述。

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是确定的,绝对的,不容怀疑的。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63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40 页。

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90 页注 487。

但是,这个标准又具有不确定性,相对性,要做具体分析。毛泽东指出:“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这就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实践标准。一方面,实践对一个认识的检验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常常需要有反复检验的时间;另一方面,一个认识正确与否,终究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最终检验的。当然这个观点指的应该是总的思想、理论、原则是正确的,并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败就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是,对于具体的行动方针、政策、办法来说,实践失败了,就必须从自己的主观认识上去找原因,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自己的方针、政策、办法。这种认真使自己的具体行动的认识合于客观实际,也是最终证明总的思想是正确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实践的正确。

应该特别指出,把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点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这是邓小平的贡献。他1978年6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我们违反了这种观点和方法,“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980年2月,他在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113页。

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他看来,这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根本点。

邓小平在概括并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领导方法(及其上述三个基本点)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他指出:必须“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明确支持并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即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思想不解放,僵化保守,那只会导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窒息,而一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解放思想的历史。同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说到底,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是为了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真正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念。就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的思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称之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二 群众路线的方法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也是根本的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3页。

工作路线、工作方法。如果说,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实事求是作为一种领导方法通常主要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讲的,那么,群众路线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则更多的是从工作方法的角度提倡的。在能够称之为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群众路线,“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中的一条重要原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我们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党的任务是为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进行革命活动要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斗争。不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对群众路线的认识还处于一种不自觉、不深刻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比较自觉、深刻地认识群众路线的问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党的六大之后。这种自觉性和深刻性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这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

从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材料看,是周恩来最先在明确的含义上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1929年9月,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还说:红军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给养及需用品问题,“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个新概念很快被毛泽东所采用,他于同年12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群众路线概念的提出,说明了党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实现了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在30年代,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中,反复阐述了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深刻分析了动员群众与关心群众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了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两种领导方式的根本对立。他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实行“群众化的方式”,而“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

作为群众路线具备系统的和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是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他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详细地分析了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而且,他还从哲学的高度,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其作出理论概括,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创举。经过延安整风其中特别是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决定的学习,全党在群众路线问题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39、40页。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548—54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页。

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广泛宣传，全党同志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地把它运用于各项工作中。党正是靠群众路线，不仅赢得了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功。毛泽东 1956 年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的核心思想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实质上也就是贯彻群众路线。1957 年，他还强调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群众路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是观点和方法的统一，即群众路线观点和群众路线方法的统一。其中，群众路线观点是群众路线方法的本质，群众路线方法是群众路线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

所谓群众路线观点，就是我们对人民群众的基本看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我们对党与人民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对于群众路线观点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经有过一个经典性的说法，他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如果用更简练的语言来概括，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其中前者是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后者是群众路线的立足点；前者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后者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和基础。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4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60 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354 页。

所谓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一种无限循环的过程,通过这种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个方面有机结合的群众路线,正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的统一,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话叫做“三者一致”。

首先,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就是由实践到认识(经过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就是从认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飞跃过程。群众路线的公式“群众—领导—群众”与《实践论》中讲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公式“实践—认识—实践”是完全吻合的。

其次,群众路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除了表现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从个别(特殊)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就是拿一般的意见再到许多个别(特殊)单位中去检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做出新的指示去普遍指导群众上,而且还表现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互相渗透、无限循环的过程。群众路线的公式与《矛盾论》中讲到认识辩证法的公式“特殊—一般—特殊”也是非常一致的。

再次,群众路线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表述这两者一致的思想。他说:“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

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这三者的一致性,从哲学的高度为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科学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是一个总的工作方法,它有一系列的表现形式,其中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有两个:“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关于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是从同类个别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本性,是矛盾的共性,是普遍性,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不能否认一般号召的作用。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可以使领导的意见能迅速地直接地与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可以广泛地普遍地动员群众行动起来。如果没有一般的号召,就没有统一的领导,群众就没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的行动步伐。否认一般号召的作用,而满足于狭小范围和部门的个别工作,这是一种手工业方式的狭隘经验论。

然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重点在于一般号召必须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这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人们认识事物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然后再逐步扩大到认识到认识一般事物。因此,在工作中,就要求领导人员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个性中找出共性。凡属正确的一般号召,都只能从个别指导中取得,从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37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

许多个别单位的具体经验中概括出来。坐在办公室里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凭想当然决定和处理问题,或者根据未加详细审查的书面报告作结论、发指示,是必定要犯错误的。另一方面,一般号召产生之后,还必须回到个别指导中去进一步检验、丰富和发展,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事实上,离开了个别指导,不仅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不仅不能丰富和发展一般号召,而且也会使一般号召失去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和公式,因而也就无法进行普遍的指导。一切带有普遍性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一般性的东西。即使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那些东西,也只能成为我们研究具体事物的向导和指南,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仍然要从特殊开始。一般的重要性在于它能指导我们去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代替我们去进行这种分析。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客观世界以及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过程中,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组成部分。

关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一说起干工作,有人就以为这是领导干部的事;一说起走群众路线,有人又以为不必考虑领导干部的作用,一切似乎可以由群众说了算。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却要求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的方法。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本义决不是不要领导,不是去崇拜群众

的自发性,决不是放弃领导的职能,贬低领导的作用。毛泽东在很多讲话中曾经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还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他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在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说过:“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他还说:“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然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重点在于解决怎么样才能保证实行正确的领导的问题,这就要求领导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对于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有过很多的论述。他曾经把领导者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比作种子跟土地的关系。还比作过刘备跟孔明的关系。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象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他用这些比喻力图说明一个道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2页。

理,就是领导者千万不能脱离群众,领导脱离群众,什么事也干不成。

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这个加工厂所需要的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而这个加工厂制出的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认为,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该承认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作用的还是群众。因而,“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了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

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时还要十分重视领导骨干的中介作用。因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毛泽东指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同时他也指出:“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

总之,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讲究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重视发挥两个积极性。因为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的程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群众路线问题也是十分强调的。他完全赞同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论断,要求全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中要同样清醒地认识到:“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他指出:目前我们党虽然拥有众多的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虽然我们面临的困难还很大,问题还很多,但是,“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鉴于很多历史经验,执政党更要重视群众路线,它仍然是我们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的法宝。

三 独立自主的方法

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一条基本的领导方法。

在独立自主这个命题中,“立”是指事物的客观存在,“独立”是说事物的存在是相对独立的;“自主”是说事物自己内部的矛盾性主导着它的运动。由此得出结论就是,推动事物的发展必须依靠和发挥“内力”的作用。独立自主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和方法是说,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决不能照搬照抄书本或别国别党的经验;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各国无产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7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3,201页。

阶级及其政党应该互相援助,互相支持,但是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必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无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在解决本国本党的问题上都有绝对的不容侵犯的独立自主权,都必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内部事务,必须反对霸权主义的行径。

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原则,是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马克思在谈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时指出:“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工人阶级自己选择。”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也说:国际主义的概念就包含着各个国家“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指出:俄国的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但是把“独立自主”作为一个明确的哲学命题提出,并把它作为一条基本的领导方法原则,那是毛泽东。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独立自主思想的最初表述,是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着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而提出来的。随后,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又坚定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以此为中介,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使用了“独立自主”这个概念,并指出:“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此之后,“独立自主”这个概念多次出现在他的著作中,比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等。1947年12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也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精神。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结果,以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开展理论研究的结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方法。他的《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就是试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1958年6月,他在一个批示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在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方法中有一个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说过: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2—223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7页。

要的。”争取国际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之后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阐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之间的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又特别阐述了学习外国的问题。他当时讲的外国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同时也涉及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的问题。他说，对于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在讲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他强调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毛泽东也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既要反对那种不重视学习外国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排外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也要反对那种对外国的东西一概照搬、崇洋媚外的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倾向。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都是正确的，而且以这种辩证思想作指导，在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也应指出，由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16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于种种原因,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当年苏联的作法有区别甚至有重大区别,但在总的管理体制特别是经济管理体制上却基本上是照搬过来的,以至于在这个框架下进行过某些修补却总是收效不大。另外在长时间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制裁和封锁政策,我们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主张的独立自主在实际上带有某些关门主义的倾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大张旗鼓反帝反修的气氛下,学习外国也必然受到很大的局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传统,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比较好地解决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他一方面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因而他力主对外开放,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来讲,独立自主需要对外开放作为条件和补充,而对外开放的目的又在于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页。

义的奋斗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决不允许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关系的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它具有广泛的指导性,在地区与地区、单位与单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同样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提到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即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内因与外因的关系问题。还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的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第三节 生动具体的领导方法

在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体系中除了有已如上节讲的三个基本的领导方法外,还有一系列生动具体的领导方法。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指导现实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具体化,具体的领导方法则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具体体现着基本领导方法的精神。

一 调查研究,多谋善断

在毛泽东倡导的一系列具体领导方法中,讲的最早,最多,也最有系统性的是调查研究的方法。

早在1930年,毛泽东对这个方法就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括。他的《反对本本主义》当时的标题就叫《调查工作》。这篇文章的问世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而它的主要内容是讲调查研究的。他不仅以“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强调了实行这一方法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还认真总结了他和他的同志们有着切身经验的7条调查技术。在此之后,他有一系列阐述调查研究问题的论著,其中包括1937年和1941年两次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的序言和跋,1941年9月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作的题为《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还有1960年11月至1961年11月为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写的一组信件、批语和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等等。中央其他领导人论述这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另外还有几个中央文献也应特别重视,其中有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1961年3月,中共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写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等。

在这些著作和文献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进行科学决策的基础;是实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桥梁;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等等。毛泽东在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的几次讲话里都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第一条是情况明,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情况不明,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那种从主观臆想出发,或者仅仅根据某些表面现象甚至假象就作出决策的情况一定要避免。要制定出一整套正确的具体政策和方针、条例就必须建立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1961年3月,党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中,从分析“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入手,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信中指出: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

争期间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曾经分别阐述过个别访问、开调查会、“走马看花”和“下马看花”等更具体的调查研究方法。另外,他还曾经谈到过“四面受敌”法和“古今中外”法两个调查研究的方法。

“四面受敌”法,是毛泽东1941年9月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报告中提到的。他讲到:调查研究应该是又有分析又有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这种调查研究是就中国革命的全局讲的,它的思想实质在于,调查一个问题应该先用分析方法把事物的各个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地研究,然后再用综合方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结论。当然,这种分析和综合又是互相渗透的。“四面受敌”法对于整个中国革命的调查研究是适用的,对于各个具体单位的调查研究也同样适用。在这里,“四面受敌”法作为一种方法不应作机械的理解,有的是四面,有的可能要三面或五面,它的实质在于,不能只是一面的调查,而应该是多面的调查。

“古今中外”法,是1942年3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学习组所作的一次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到的。他说:实行“古

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196页。

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也是调查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它的思想实质在于,对于任何一件调查对象来讲,要想对这件事物有真切的了解,不仅要调查它的现在,而且要调查它的过去,特别是对人的调查,更要了解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仅要调查这个事物本身,而且要调查与它相关联的其他事物。当然采用“古今中外”法调查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把握“今”和“中”。对于一个单位来讲这个“中”也就是“我”,就是我那个地区、那个单位、那个部门。

不管是采用哪种具体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都十分强调要有正确的态度,其中包括必须树立眼睛向下、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必须坚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贯彻辩证的矛盾统一的态度;必须采取艰苦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等等。

关于多谋善断。

多谋善断作为一种领导方法,是毛泽东 1959 年 4 月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所讲话中提出来的,它是调查研究思想的运用和发挥。当时提出这个方法的针对性主要是纠正 1958 年“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瞎指挥。

什么叫多谋善断?所谓“多谋”,就是要对客观情况有完全正确的了解;所谓“善断”,就是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和及时的决断。多谋与善断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多谋是善断的前提和基础,善断是多谋的目的和结果,二者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多谋善断的重点是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怎么才能作到多谋呢?毛泽东同志主张要谋于各种人;谋于各种意见;谋

参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 214 页。

的办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谋的时间应该尽量长一点,等等。这当中特别是关于要办大事、决定大计,一定要问问工农群众,跟接近群众的干部商量商量的思想;关于在领导层里要解除封锁、与人通气的思想;关于要注意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思想等等,都是很重要的思想。

有谋不是目的,谋的目的是为了断。不多谋肯定不会善断,但是多谋与善断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在断的方面,毛泽东同志强调了两条:一是要断的正确。而要作到这一点,就要在谋的基础上多思,多研究,要学会使用各种逻辑的方法;同时要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去进行重大问题的决策。二是要当机立断,要追求决断的正确性与时效性的统一。

二 “弹钢琴”,“两条腿走路”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写道:“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又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是一种中心工作与一般工作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弹钢琴”。

弹钢琴要有主旋律,不能十个指头同时都一下子按下去,那就不成调子。这个方法要求必须找准并且抓紧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中心工作来进行。中心工作是各种工作中带关键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性的工作,抓住了中心工作,就能把握住整个链条,抓住全局,并以此带动其他工作。领导应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能带动全局的中心工作上。领导对全局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在领导工作中,切忌不分主次、轻重、缓急、先后,平均地使用力量或乱碰乱抓,造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在工作中不分主次地平均使用力量的方法,是一种否认矛盾不平衡性的形而上学方法。

确定中心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从大的方面讲,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战争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包括经济工作在内的其他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中心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经济建设来展开。从小的方面讲,每一地区和部门在一段时间里的中心工作的确定必须依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而定。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无疑是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各地的情况不同,具体的中心工作也有所不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里提出,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经济与教育成为大多数人的中心工作,第一位的工作。边区的党、政府、人民做好了经济工作,就是极大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当时他批评了一些人轻视经济工作而空谈抗日与革命的错误倾向。

在解放战争时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在已经进行了土改的老区和已解放了的的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就成了中心任务。因此,领导要善于依据每一地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分析各种工作在其总的任务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正确地找出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安排好工作秩序,切不可根据某种刻板的公式到处套用。

弹钢琴是一门艺术,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是互相关联的,中心工作可以带动其他工作,其

他工作也可以反过来促进中心工作。所谓要抓紧中心工作,并非是说可以“单打一”,可以放松甚至放弃其他工作。这里面要讲究一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工作重点是在农村。但是这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可以放弃城市的工作。相反,必须形成一种围绕中心工作的整体配合。同样的,我们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丝毫也不能放松。领导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那种把中心工作与其他工作对立起来,只抓中心工作的方法,同样是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

另外,“弹钢琴”的领导方法还有一个适时地变换曲调的问题,即要求我们注意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在一定条件下的转移。弹钢琴不能老弹一个曲子,而新曲子对老曲子来说,常常要变调,变主旋律。对于工作来说,也是这样,由于情况的变化,原来的中心工作后来不再是中心了,而原先处于一般工作中的某一项工作倒成了中心工作,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实行工作重心的转移。1927年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是在农村,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种情况到1949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及时地领导全党实现了工作重心由农村变为城市的转移。这是一个宝贵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由阶级斗争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我们长期没能实现这个转移,留下了严重的教训。是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实现了自己工作重心的转移,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

关于“两条腿走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领导方法,其中包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业与农业同时并

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土洋生产同时并举。还有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实行劳逸结合;大集体与小自由相结合;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相结合,等等。这个方法的意思是说,各项工作要“兼顾”、“结合”、“并举”。正如人走路得用两条腿一样,一条腿或一条半腿就走不好;而这两条腿还不能同时都迈,总迈一条腿也不行,必须是用两条腿,而且要一条腿先迈,另一条腿后迈,否则就无法前进。

“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与“弹钢琴”的方法在道理上是相通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比喻,一个是比作用手弹琴,一个是比作用腿走路。这两种方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三 胸中有“数”,留有余地

任何事物都是数量和质量的辩证统一。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要正确认识事物,不仅要认识事物的质,而且还要认识事物的量,从质和量的统一上加以把握。毛泽东运用这个道理指导工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了一个领导方法叫做“胸中有‘数’”。

这个领导方法要求我们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阶级状况、剥削程度等等,进行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农村中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的多少,各有多少土地,以及各阶级、阶层对待土地革命的态度情况等等,都有明确的数量统计和分析,我们党关于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是依据这些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统计和分析而制定出来的。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不仅注意敌我军队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而且十分注意数量上的变化。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有关指挥战争的文章,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列举有关敌我兵力的各种统计数字,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战略战术,规定一定时期的歼敌数量,就是很好的范例。在领导工作中必须有清晰的数量的概念,特别是对群众的心态要有准确的了解,对某一项工作,群众中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以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大多数群众不拥护、不赞成的事是不能办的,即使是好事也不能马上去办,这也是群众路线的要求。

胸中有“数”的方法还要求我们在领导工作中特别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即是说,要注意一事物转变为另一事物的关节点。超过了这个数量界限,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因而把握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对于认识事物以及事物的发展规律十分重要。在土地改革中,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界限。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土改的经验,毛泽东提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有了这个数量界限,对于克服和防止土改政策中的“左”的和右的倾向有重大意义。在实现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问题上也有一个划清界限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专门讲了一个方法叫做“划清两种界限”,即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他指出:“记住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4页。

胸中有“数”是毛泽东倡导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他认为：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关于留有余地。

与胸中有“数”方法相联系还有一个“留有余地”的方法。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中特别强调了留有余地的问题。他指出：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这个领导方法体现着可能性与现实性、需要与可能之间的辩证关系。它要求我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要充分估计到工作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不要把话说死，不要满打满算，而要留有机动数，留有回旋的余地。

我们在工作中要准备各种可能性，要准备应付发生意外的情况。毛泽东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说过：“要想到事物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他特别提醒人们要估计到坏的可能性，为此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留有余地就是承认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样做，可以使我们避免头脑僵化，及时地把握新的情况，调整原来的计划，这样做有益无害。毛泽东曾经讲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单行本，第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4页。

留有余地是一种保护群众积极性的方法。我们的计划不能提得太重,不能超过群众负担的可能性,要给群众留有充分的余地,要使群众经过努力能够完成这个计划。这样做,有利于鼓舞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从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不给别人留有余地,也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领导给群众留有余地,正是为了领导工作的顺利进行。当然留有余地与右倾保守是严格区别的。留有余地也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不是我们讲的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同胸中有“数”等其他的领导方法一样,它的精神实质是积极的、主动的、进取的。

四 不断革命,波浪式前进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里提到这样一个领导方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后来,他把这个意思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为第21条,概括为“不断革命”。被后来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组成的、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应该坚决否定的,这一点已经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但是这里讲的作为领导方法的“不断革命”与此不能等同看待。

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几次讲话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5页。

案)中曾经反复讲不断革命的问题。他指出,他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斯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同的不断革命论。当时,他把中国革命分成这样几个步骤:(1)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1949年就完成了;(2)反封建的土地改革,1950年至1952年三年基本上完成了;(3)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在1956年基本完成;(4)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当时毛泽东说,这个革命在1958年7月1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5)开展技术革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要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思路里虽然有“左”的思想成分,但其中转移工作重点继续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从领导方法来说,毛泽东这里讲的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是,我们的工作要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要趁热打铁,中间不能冷场,不能断气,不能间隔得太久,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自满,不能停步不前。

当时的问题是没有同时强调阶段论,而这个理论上的缺陷在实际运用上就产生了失误,1958年“大跃进”,一味地求快,就是证明。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倒是比较快地发现了。1958年12月,他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必须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的科学命题。后来他在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还阐述了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思想,为他的不断革命论进一步作了哲学上的论证。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方法,体现着不断进取、不断向前的精神。我们现在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第二次革命,也需要在准确的理解上去继承和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贯彻和执行不断革命的方法。

关于波浪式前进。

我们要不断革命,不断前进,它的道路是什么样子呢?有可能是直线上升吗?这是一些人的幻想,现实生活则不然,它只能是一

种曲线的运动。毛泽东曾经根据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之间关系的道理并结合实际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进而在1959年4月,他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也是个工作方法。这个方法,除了表现在我们做工作总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过程外,还特别表现在工作中的有进有退、有起有伏、有快有慢、有张有弛上。

波浪式前进的方法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巩固的关系,工农业生产中的试验和推广、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涉及到人们日常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即劳和逸的关系等等。总之,我们是前进,不是不进,更不是倒退;同时又是波浪式的前进,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式的前进。

除了上面谈到的几个领导方法之外,毛泽东还提倡过其他一些领导方法,其中包括“一切经过试验”、“抓两头带中间”、“互通情报”、“安民告示”、“精兵简政”等;更具体的方法还有“蹲点”、“种试验田”、“开现场会”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领导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和现实的道路。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具有长久的和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不应该把这些基本原则当作是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它的生命力在于,这些基本原则要与新的具体工作相结合。只有这样,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体系才能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第七章 毛泽东党的建设 辩证法思想

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邓小平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但“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全面总结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注重自身建设的一系列经验,科学阐述了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等辩证关系,创造性地建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毛泽东党的建设辩证法思想。这个思想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党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

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两个不可分割的基本方面,如何正确地开展这两个方面的建设以及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这是党的建设辩证法首先遇到的问题。

一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又是思想建设,又是组织建设,毛泽东提出,必须把党的思想

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1页。

建设放在首位,必须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毛泽东党的建设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成功经验。

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的无产阶级的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又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给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一个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难题来。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解决这个难题的正确而有效的办法。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在党内要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毛泽东关于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思想在40年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这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处讲话中。其中一处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另一处是他在党的七大上的报告中说的:“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展壮大党的队伍,无疑是需要的;但是党的组织是要由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组成的,他们的思想路线是否端正,思想方法是否对头,思想认识是否一致,对于组织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党的组织不仅在于成员的数量,而且更主要在于成员的质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即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作为一对矛盾,其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后者,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对于这一点,刘少奇曾经在《论党》中讲的也很明确,他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

列宁曾经说:“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列宁在这里讲的“革命理论”不是别的什么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但是由于在党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比较短,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弱点。对于这个弱点,毛泽东早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有察觉并努力进行弥补和克服。早在 1929 年 12 月,他就提出了党员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的任务,他认为这是纠正对政治形势分析和阶级势力估量中的主观主义的方法之一。1937 年 5 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为了克服在我们党内存在的种种不良倾向,“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1938 年 10 月,他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为了作到这一点,我们党在延安整风中规定了 22 个必读文件;七届二中全会又规定了“干部必读”12 种;1963 年又提出了 30 本书的学习任务。在这些书目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原则。在《实践论》中,他就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针对党内一些同志教条主义、书本主义的学习方法即“理论和实际分离”的方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反复提倡“理论和实际统一”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为此,他还在《整顿党的作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92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2 页。

风》中对这种学习方法的科学涵义作过一个经典性的表述,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经验证明,只有毛泽东所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才是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方法,只有这样作,才能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

(二) 重视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

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本质规定对党员思想和行为的要求。所谓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就是要求党员按照党的性质的要求去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以全面提高自身的基本素质,真正作到从思想上入党。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应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概括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同年9月,他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又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这些论述,更加充实了党员党性修养的内容。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不仅明确提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加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的问题,并且强调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在上述这些讲话中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应该高一些,不能使其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改造自己,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提高到党所要求的水平。

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党中央在这个文件中严肃揭露了党内一些同志中存在的缺乏党性的种种表现,明确把“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作为“巩固党的主要工作”。这个文件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学习文件之一,对于党的思想建设曾经产生了历史性的作用。

随着革命的发展和组织工作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抗日战争以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人数已达120万。但是这么多人在组织上入了党并不就意味着他们全都在思想上也真的入了党。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到了,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1945年4月27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又指出:“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克服这个困难,唯有重视思想教育,重视党性修养,才能真正使组织上入党同思想上入党二者统一起来,真正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建设和发展党。

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并且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结晶,是唯物辩证法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成功运用。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一支宏大的队伍,而且有着很高的素养,很好的传统,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很好的形象。

二 抓紧抓好党的组织建设

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决不意味着可以放松以至放弃党的组织建设,如果那样理解就会陷入形而上学。党的组织建设是维护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本保证。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以外,没有别的武器。”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于党的组织建设也是抓的很紧的,他对于党的组织发展、组织原则等问题都有过深刻的充满辩证法的论述。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列宁选集》第1卷,第510页。

（一）大胆与谨慎相结合的发展方针。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结论。毛泽东早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十年之后,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则进一步指出:“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

为了使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从组织发展的方针来说就必须大胆一些,应该向一切真心愿意参加而又切实具备条件的人敞开大门。这个问题是需要与可能的统一。从需要上说,要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组织。这个组织人太少了不成,它不仅需要将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而且需要将出身于别的阶级但确能站到无产阶级立场的分子也吸收过来。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工人数量少的特殊国情更显得特殊的重要。从可能上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仅使无产阶级日益觉醒,而且有大批出身于农民阶级、其他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向无产阶级靠拢,其中不少人放弃了原有的立场,要求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5—6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3—524页。

毛泽东在组织发展的问题上又强调要谨慎对待。大胆发展不是可以把所有表示愿意参加的人都发展进来,那样作就放弃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共产党员的标准,问题特别在于必须防止那些无产阶级的敌人钻了进来,那就后患无穷。就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党要“开门”,要大胆发展的同时,他又指出“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的面目,以图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这是讲的党组织的纯洁性的问题。

在党的组织发展问题既讲大胆,又讲谨慎;既讲群众性,又讲纯洁性,这是矛盾的统一。不能把这两个方面绝对对立起来,也不能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指出:“不可因为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还特别提到,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他认为,1937年至1947年的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4万人发展到170万,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中间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这是一种严重的情况。他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顿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

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毛泽东以上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大胆与谨慎相结合的发展方针。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强调大胆发展这一面,有时强调谨慎发展这一面,但是在我们的思想中,这两个方面是不能割裂的。只有把这两个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合乎党的组织建设的辩证法。

(二) 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组织原则。

民主与集中相统一,即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时,就提出了把党内生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又必须保持统一纪律的思想。列宁在1905年12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首次使用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并写进了会议通过的《党的改组》的决议中。在1906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把民主集中制原则正式写进了党章。后来又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为各国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而使这一原则成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普遍遵从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页。

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这个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又要民主又要集中的一种制度,是民主制与集中制的辩证统一关系。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过多处阐述。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进一步说:“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是对民主集中制涵义的科学规定。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还是主张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党内必须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如果没有民主,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毛泽东说:“如果离开充分发挥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这是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同样的,党内也必须有集中,没有集中就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什么叫集中?毛泽东同志说:“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党不讲集中统一,不讲组织纪律,允许各行其事,那就不可能有力量。

民主和集中是民主集中制内部相辅相成的一对矛盾,两者不可偏废。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压制民主、破坏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同时,党的民主制,又是有领导、有集中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破坏集中的自由放任主义。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致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当然,在民主与集中的矛盾中,矛盾双方也不是绝对平衡的,在一定条件下民主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在另外的条件下集中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两者的地位可以转化。正如毛泽东1937年5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的:“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鉴于中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78页。

国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毛泽东通常把论述的重点是放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的,他认为正是这种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但不管那一方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不能排斥另一方的制约与促进作用,“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民主集中制又是群众路线在党的建设上的运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现象是党内生活中的两种错误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极大地妨害着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同党内的群众路线是不相容的。

总之,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组织原则,坚决地毫不动摇地贯彻这条原则,既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保证,又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 自由与纪律相联系的政治局面。

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毛泽东还强调党内自由与纪律的对立统一。他一再提倡在我们党内以至于在我们国家内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只有造成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能有利于革命和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在我们党内是要讲民主的、讲自由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积极性。但是正如民主不能离开集中的道理一样,自由也离不开纪律。党内民主和自由都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

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遵照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但是,由于带有自由散慢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中国党内占了很大的比重,因而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要建设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行动和步调高度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毛泽东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他指出:“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到了1938年10月,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张国焘事件的经验教训时就系统而全面地概括了党的纪律,那就是:(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他要求:“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党的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从革命发展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出发,进一步强调了实行党的纪律的重要性。1948年1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中,严肃批评了一些党的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良习惯”。5月,他又在《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批评了部分地区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他指出:“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著名口号。

对于党的组织建设来说,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含糊不得的。但是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自觉的基础之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由与创造精神的东西。毛泽东一再强调应该把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性结合起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就批评过那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形式主义的态度。他认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办法。”相反的,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对上级的指示进行讨论,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精神,这才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和纪律性的体现。

刘少奇也说过:“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性精神。”在我们党内,必须讲纪律,否则就不成其为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讲纪律无疑对每个党员是个约束,但是这对于有自觉性的党员来说往往并不会觉得对自身活动的自由有多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8页。

大的限制。纪律对于自觉遵守纪律的党员来讲它是自由的,这是党内纪律与党内自由的辩证法。

第二节 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要有战斗力,必须保证党内的团结。马克思曾经说:“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列宁也曾经指出:“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他一向认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党内矛盾的根源和特点,研究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探索实现党内团结的方法和途径。毛泽东党内团结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党的建设辩证法思想体系中的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

一 党内矛盾的根源和特点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都充满着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共产党作为世界上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一个具体事物,当然也是一个充满着自身矛盾斗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479页。

体。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并不能说共产党内的每个成员都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进入共产党的人并不都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内并非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并不是一进了共产党就都是圣人。我们党从总体上说是团结的、统一的,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党内就没有任何分歧、争论、隔阂、误会等等,相反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正因为党内客观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而,解决党内团结就是一个党的建设中经常性的现实问题。而要实现党内团结,又必须以对党内矛盾的根源、特点和性质等问题的科学分析为前提。

(一) 产生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根源。

毛泽东曾经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两个方面去分析党内之所以产生矛盾和斗争的原因。

其一,社会根源。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从社会上各种矛盾斗争有密切的联系,即是说,社会上各种矛盾斗争对党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毛泽东通过冷静的观察和认真的分析,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

从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这方面来看有几种情况:第一是,党员在入党时从各个方面带进了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不是社会上各个阶级的联络站;但是共产党员并不是也不可能只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

队伍里,除了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以外,还有人数不少的其他社会阶级出身的人,包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在我们党内,大多数的人来自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毛泽东认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因而我们党从党外说必然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同时又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社会的政治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在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寻求出路,这样就使共产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党员,在中国的特殊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这些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由于思想上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所以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等。他们以自己的本来面貌改造党,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矛盾和斗争,主要是来自小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有一部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第二是,敌对阶级策略手法上的变换对党内一些人产生影响。共产党生存和活动在有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党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地位,十分引人注目。社会上各个阶级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总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接近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去影响以至收买某些不坚定分子。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1页。

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了“三反”“五反”斗争,他把反贪污、反浪费看作是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其目的是为“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

建国以后,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问题。鉴于党内在执政的条件下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问题,他指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 毛泽东这个“挂账”的说法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党内矛盾与社会的阶级矛盾不能等同,挂账指的就是反映;其二是党内矛盾与社会的阶级矛盾总有联系,总可以挂上账,总可以找到它的根源。

第三是国际阶级斗争对党内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社会环境本身就包括国际环境,阶级斗争本身就包括国际阶级斗争。毛泽东一向认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和平演变”策略,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的一些人乃至整个党发生蜕变的重要外部原因。

关于什么是社会的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未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6页。

展开论述。从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一些话来看,是指与阶级矛盾相区别的另一类社会矛盾的影响。这类矛盾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会有这类矛盾,虽然这类矛盾在有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里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影响以至制约,但是一般说来,这类矛盾总是区别于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另一类矛盾。这类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又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无产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异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其二是人民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的影响,这通常指的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守旧,以及由于所处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待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所发生的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与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之间的矛盾。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级斗争不仅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它的范围必将日趋缩小,而新旧事物矛盾的活动范围相应会日趋扩大,因而后者对党内的影响比起以往阶级矛盾占居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期有很大变化。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将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范围里长期存在,而且也不能排除这种阶级斗争在特殊条件下激化,因而否认阶级矛盾和斗争对党内的影响也是错误的。

其二,思想根源。

党内的矛盾和斗争除了有它的社会根源外,还有它的不容忽视的思想根源。这就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任何人都会遇到这种矛盾,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在实践中解决这种矛盾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正确,二是错误。所谓正确,就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主观与客观相适合”;所谓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方法不对头”,“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毛泽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东对于思想方法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即使一万年以后也总是会有的。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多次错误路线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在党内的反映。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而这种主观性和片面性也就是主观主义。有主观主义,就必然要犯错误,而错误与正确又必然发生矛盾,发生斗争,由此也说明,党内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

(二) 党内矛盾和斗争的特点和性质。

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指的是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党内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党内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内部的思想斗争。刘少奇曾经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个定义是准确的。

有比较才能看清事物的特点,有区别才能把握事物的性质。对于党内矛盾和斗争的特点和性质是在与阶级矛盾和斗争的比较、区别中实现的。

前面在研究党内矛盾和斗争产生的原因时我们说它(严格说来是它的一部分)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实际上分析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是这个定义本身就说明了两者之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994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间的区别。这种区别除了有并不是全部的党内矛盾都是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这个方面以外,就拿确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联的那种党内矛盾来讲也不能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为党与阶级不同,党是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在党员之间、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的组织与党员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一般说来,不仅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党内发生的矛盾是指在观点、主张、策略、路线等方面存在的思想原则上的分歧甚至对抗。这些分歧、对抗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倾向和要求,而不是说提出某项原则的人,就是敌对分子。所谓党内矛盾是社会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就它的斗争内容而言,并不是说党内存在不同的阶级。

在我们研究党内矛盾和斗争的性质和特点时,自然会遇到一个问题,即如何认识党内混有敌人和后来蜕变成了敌人的问题。列宁说过:“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斯大林也说过:“党知道,加入它的队伍的不仅有忠诚老实的人,而且还有乘机混入的分子,还有企图利用党的旗帜达到个人目的的野心家。”毛泽东从多年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他在1939年10月就指出:“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他在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

《列宁选集》第4卷,第21页。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24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2页。

须看到,原则我们是要吃亏的。”毛泽东这里讲的“不纯粹”包括广泛的涵义,其中就包括那些“变了质的分子”。党的以往斗争的历史已经证明并且今后的历史发展也会证明,党内混有敌人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是一种以党内形式出现的党外问题。严格说起来,我们同这些敌人之间的斗争不属于党内斗争,而是一种阶级斗争。虽然这些敌人在其政治面目尚未暴露之前,这些人还主要以思想斗争的形式进行活动;而我们在还未识别他们的时候,一般也只能采取党内斗争的方式同他们斗争。但是,一旦确认他们是阶级敌人,那么斗争的性质就应明确,就应该按阶级斗争去处理。

毛泽东还认为,党内矛盾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条件的、可变动的。党内的正确和错误之间的矛盾,在开始时,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但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也是如此。因此,为了尽可能防止这种转化的发生,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同时也要注意,“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二 党内斗争与党内团结的辩证关系

党内既然有矛盾,因而就必然有斗争,有分歧,有不团结;同时,党内又必须团结,否则党就会成为一堆散沙,就没有力量。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争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取解放的战斗指挥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更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且,实现党内团结又是实现阶级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关键。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曾经深刻地指出:“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与此同时,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他深深懂得,团结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党内团结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得到,它必须通过不断的斗争才能实现。团结与斗争相辅相成,否认团结的斗争与否认斗争的团结都是违反辩证法的。

(一) 党内斗争是实现党内团结的手段和途径。

我们讲的党内团结,不是无原则的结合,而是有原则的统一。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实现的,否则,就没有坚强的团结和真正的统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基础上的团结。”

为了达到有原则的团结,必须划清两个界限:一是要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二是要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我们不能同混在党内的敌人讲团结。混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识破并清除这些敌人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前提和保证。同时,我们同志之间也不能在错误的基础上讲团结,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载1943年5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际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是是还是非,是对还是错,应该分清,不能敷衍,团结就是要分清是非,服从真理,思想统一。

讲团结的根由在于有不团结的问题存在。毛泽东说过:“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而现实的情况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在我们党内有各种对立的意见,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从哲学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没有绝对的纯,纯只是相对的。一只手伸出来,四个指头向一边,大姆指向另一边,这就是不纯,党内也是这样。不仅党内意见分歧时有发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不同倾向的形成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倡导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随时准备拿起斗争的武器。他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而党内斗争的基本武器就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也就是毛泽东明确指出的:“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一方面,为了形成党内有原则的团结,应该提倡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他认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44年5月24日),载1944年5月31日延安《解放日报》。

另一方面,又要提倡在同志之间开展批评。毛泽东是主张思想交锋的,他说:思想交锋这个办法有两个好处:“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反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在开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上,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共产党人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有责任经常打扫和洗涤在我们同志的思想上和我们党的工作中所沾染的灰尘。经常地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二) 党内团结是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

党内是要开展斗争的,但是这种斗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党内团结,并通过这种团结去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去赢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方面,我们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说:“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致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在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不论是进行批评也好,还是进行自我批评也好,都要实事求是。毛泽东提出,党内批评应该是严肃的、尖锐的,批评错误要不讲情面,不怕得罪人,不要把棱角磨掉;但与此同时,批评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另外,批评也要及时,不要老是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应该批评,但最好是缺点刚露头时就批评。同样的,对于自我批评,也要在严肃、认真、深刻的同时,讲求中肯、实在,不要作违心的、应付性的检讨,那样做,对己对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毛泽东总结了我们党在斗争与团结关系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一个处理党内矛盾的公式,那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验证明,这是解决党内矛盾的一个完全正确和有效的方法。

三 必须正确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

在研究党内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党内同志犯错误和如何去同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搞好团结的问题,这当中又涉及到如何认识和处理成绩与错误、看与帮、原则性与灵活性等几个关系问题。

(一) 成绩与错误。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8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这是在具体解决党内团结问题时首先遇到的一对矛盾,即要回答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看待一个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反对那种对犯错误的同志否定人家的一切、一棍子打死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而主张采取辩证分析的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承认任何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点错误也没有的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仅仅就缺乏经验这一点,人们就难免要犯错误,更不待说其它复杂的原因了。列宁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毛泽东也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圣贤,也还有过嘛!也许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没有见过他。他明确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既然错误是难免的,就要对同志犯错误作辩证的分析。首先,要坚持全面地看问题。要承认任何革命者、任何党员同志都有成绩和错误两点。如果只见成绩,不见错误,或只见错误,不见成绩,都是一点论,都是形而上学。犯错误的同志有错误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因为他在某一个时候、在某一件事情上出了毛病,就否定人家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错误与成绩在任何一个同志身上都是对立的统一,在犯错误同志身上也是如此。因而,当人们犯了错误,在指出他有错误之后,还要指出,他们有许多成绩。反之,当人们自以为了不得,头脑发昏时,就要指出他的错误,这才是两点论,才是辩证的方法。

毛泽东曾经明确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他曾经拿了这种辩证的方法典型分析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他认为,一方面,那个时期的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策略,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也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他还认为,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他批评许多同志缺乏分析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后来他还指出,对于我们的同志,对于我们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而“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其次,要坚持发展地看问题。就是说不要静止地看人,不但要看到一个同志现在他有错误,而且要看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正错误,吸取教训,赢得成绩,即实现由错误向成绩的转化。毛泽东从彻底的辩证法的观点,指出了成绩与错误都有两重性。他说:“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毛泽东还根据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互相转化的原理,对犯错误是形成正确路线的一个必要条件作了阐述。他认为:“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页。

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为了实现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还多次劝人们不要学鲁迅先生在小说《阿 Q 正传》中描写的那种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他说:我们党内有些人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二) 看与帮。

讲到由错误向成绩的转化,就必须讲条件,看与帮,就是实现这种转化的两个必要的条件。

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在如何促使犯错误同志进步的问题,毛泽东正是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外因关系的道理指出:“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看是必要的。犯错误同志本人的态度和表现,对于犯错误同志的进步来说是主要的、决定的因素,没有这一条是断然不行的。毛泽东认为:“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个别人犯了错误,硬是不承认,不改正,头撞南墙不回头,陷在泥坛里不出来,你有什么办法?毛泽东曾经风趣地向人们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和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9—30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

猪谁聪明？一般的回答当然是人聪明了。可他说：不尽然。猪遇到障碍就回头，有些人犯了大错误，即使知道了也不改，岂不是比猪都不如。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强调帮助的作用。他认为，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他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他还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总之，一要看，二要帮；既要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给以充分的信任，同时又要造成各种条件帮助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样就有可能使由错误向成绩的转化成为现实。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

在党内批评与斗争中，还存在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这里讲的原则性，就是讲的团结的基础、原则，而灵活性是具体地表现原则性的东西，即为实现原则而采取的方式方法。离开了原则性讲方式方法，那就会失去方向，失去原则；但是光讲原则，没有方式方法，

参见《红旗》1979年第1期吴黎平文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6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则原则性也实现不了。

毛泽东历来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要求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讲原则,讲保持距离,但是在小是小非问题上又要讲谅解,讲求同存异。在延安整风时,他要求对于党内的错误问题,要分清它是原则性的错误,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还是组织纪律上的问题;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全都错了,还是只错了一部分,等等。总之,要进行具体分析,并且要认真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还要找出改正的办法。毛泽东有一个思想很重要,那就是:对待党内发生的错误,“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上面主要说的是在原则问题上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体现在同志间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非和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

毛泽东主张,要努力发扬党内民主,欢迎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鸣。我们正是在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在党内造成一种良好的民主气氛,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因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讲求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又要求同志之间在非原则问题上讲妥协,即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

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在同志之间“如有纠纷,应该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另外,还要允许少数同志保留意见。一时意见不能统一怎么办?那就要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的意见,只要求在他的意见未被通过的时候,服从组织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经讲过,这样作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少数人的意见确是错误的,那就相信这些同志将来是会改正的,应该允许人家有一个认识的时间;二是少数人的意见有可能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起初真理不在多数人手里,而在少数人手里。

以上,成绩与错误、看与帮、原则性与灵活性等关系是党内团结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关系和斗争与团结的关系一起构成了党内团结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范畴。

第三节 党的建设与反倾向斗争

在党内斗争问题,毛泽东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倾向斗争的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党的建设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左”右倾向的界定

“左”与右,是在制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所使用的一对政治概念。它是指在某个时期或某类问题上,对于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偏差,这种偏离通常不是指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指比较普遍的和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3页。

对于“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涵义，毛泽东曾经作过这样的界定：“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什么是右？“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另外，他还有几处类似的说法。比如，他说：“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在速度问题上，“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右了。”在党内团结问题上，“左”的倾向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右的倾向是“一潭死水，一团和气”。在反对主观主义问题上，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是“左”，保守的主观主义是右。比如他讲过：“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的。”等等。毛泽东曾经在《实践论》中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他又指出：革命队伍中的“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94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一般把教条主义的倾向称作是“左”,其主要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上,或是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是完全扭曲的认识上,表现为一系列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和政策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使用的“左”与右的概念的涵义有些变化。我们现在一般把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称作右,而把僵化倾向称作“左”。这是以前用语的沿用现象。因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企图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而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拉历史车轮向后倒退的倾向,因而是右。而僵化倾向是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仍然坚持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继续坚持以往那种“左”的思想,因而还称为“左”。

二 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我们党对待“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态度就是毛泽东明确指出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既不能右,也不能“左”,对右的倾向和“左”的倾向都要反对,都要纠正,因为“左”和右都是与正确相对立的错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

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建国初期,他又明确提出过“戒左戒右”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50年代后期以后,“左”的指导思想长期得不到解脱,以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和思潮。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更加明确地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

马克思主义者是两点论者,既反右,也反“左”,随时都要注意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客观存在着“左”与右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与错误是一种矛盾关系,而就错误来讲,其内部也是一分为二,又分为“左”、右两种,这种分化不是人们的主观臆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毛泽东正确地指出: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有人说:“‘左’比右好”,也有人说:“右比‘左’好”。客观上就有这么两种意见。从理论上他也说过:“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说:“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事实上,干挠我们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既有右的东西,也有“左”的东西,二者都是不好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为此,我们的主观认识应该全面地反映这种客观情况,既反右,也反“左”,是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而不是只进行一条战线的斗争。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是重点论者,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6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4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5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5页。

一。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应该正确地确定和捕捉主要的错误倾向,要把主要的精力和气力用于反对主要的错误倾向上。

怎么确定主要倾向?这要依据于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具体分析。这种具体条件包括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革命的深入程度以及群众所受的锻炼的多少等等,按毛泽东的话叫作:“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

例如,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芦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是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则是右,是投降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的缘故。这是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而产生的主要错误倾向转化的适例。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所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主要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则必须主要防止“左”倾。这又是在某项运动深入到不同阶段所容易发生的错误倾向的适例。

关于打仗,在军队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这又是随着革命事业有无成就或成就大小而发生的主要错误倾向之间相互转化的适例。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必须善于观察事物变化的客观过程,及时地掌握事物或过程中各种倾向的脉搏的跳动,敏锐地、及时地抓住主要倾向,对症下药,切不可不看时机、条件、重点,而去盲目地反。

在我国目前时期,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目前主要应该防止什么倾向呢?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

们。从目前时期来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呢?第一,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即是说,“左”的东西根深蒂固,积习很深。从历史来看,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长期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要是“左”的错误。从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到1934年底,连续发生“左”倾,特别是第三次王明的“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建国以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的主要也是“左”。正是由于“左”的错误,中国社会实际上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的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因而在邓小平看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左”的一套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要改它很不容易,因而我们主要是防止“左”。

第二,这与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有关系。我们国家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工作重点是经济建设。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而要在同资本主义国际世界相抗衡进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快一点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把我们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胆地解放思想,冲破原先的种种思想障碍和习惯势力。事实上,把经济搞上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转换脑筋,解放思想。很多问题,脑筋不换,工作就推不动,而一旦思想解放了,脑筋换了,想问题的面就宽了,办法也就有了。所谓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就是要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解放思想、转换脑筋的主要针对性是“左”的习惯。

第三,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各级领导者讲的。在人群中,处在领导岗位特别是中高层领导岗位上的同志相对来讲中老年要多一些,而这些同志由于以往长时期受到“左”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比

较多一些。因而在反倾向问题上,对于这些领导同志来讲主要是防止“左”。

三 一种倾向常常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这是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历史经验之后所提出来的一个辩证法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倾向,而且还在于它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解决了反对主要倾向与防止可能发生的另一种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

错误倾向的发展同其它一切事物的发展的规律一样,是此长彼消、彼长此消的。毛泽东说,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纠正了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他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历史经验,揭示了一条规律性的现象,即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左”;在反对“左”倾的时候就可能出右。由此又合乎逻辑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反右防“左”,反“左”防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所以会有这种状况和我们需要采取这样的对策,除了有事物变动规律这个普遍性的原因之外,也和中国革命队伍里小资产阶级成份占大多数这一点分不开的。按照列宁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不定,华而不实,他可以从发狂很快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废,耽于幻想,甚至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而且这种错误在特殊的或多少特殊一些环境里,由于意外的原因,总是会以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束,重新表现出来。毛泽东也曾经指出,中国是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

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而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他们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每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他说:“这种动摇分子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在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重点反“左”时提防右,重点反右时提防“左”。只有如此,才可能既不会反“左”时愈来愈右,也不会反右时愈来愈“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对一种倾向常常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也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来讲,必须坚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但是不能把这个方针当作教条到处去套用,而主张:“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即是说,就局部的情况看,在某个地区、某个领域、某个群体中,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究竟哪种倾向是主要倾向,应当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比如,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针对思想战线上一些人搞精神污染变得很突出的情况,他指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这里讲的“着重解决”右的倾向有两个限制词,一是“当前”,二是“思想战线”,而不是“长期”和“所有战线”。即使在当时提思想战线着重反右时,邓小平也讲: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34页。

《邓小平同志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109页。

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即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再比如，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在强调‘我们既有‘左’的干挠，也有右的干挠，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的同时，他又指出：“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还可以带出其他一些例子。这些表明，邓小平在反倾向问题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既坚持了全局工作中主要防止“左”这个重点，又没有忽视在某种情况下或某个特定领域中可能而且应该以反右为重点，至少应该注意这种掩盖倾向的问题。因而在反倾向的问题上，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既戒“左”又戒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

四 反倾向与反派别

在党内斗争中，与倾向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一个派别问题。

倾向与派别，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两个概念。倾向是表示人们已经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不是完全形成了的东西，还是可以纠正的。而派别则是比较成熟，有固定形态，甚至是有组织结构的东西，列宁说：派别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别立门户并规定自己派别纪律的小团体”。

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存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普遍贯彻的一条原则。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必须使一切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是个别派别的代表人物极力想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第29页。

转引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7页。

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毛泽东对于党内出现反对派也是十分警惕的。他曾经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他还特别指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这里讲的“小组织行动”就是派别活动。

毛泽东认为从倾向发展到派别,应当作为过程来研究。他在《矛盾论》中,在分析党内斗争发展规律时就指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之间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乃至后来,由于种种内部与外部条件的作用,便发展成为对抗性了。因而在开展反倾向斗争时,就要注意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反倾向的问题上,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而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毛泽东曾经指出:“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当然,如果犯错误特别是犯有严重政治倾向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即发展到组织派别和分裂

《列宁选集》第4卷,第478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页。

党的危险道路上去。

总之,在党内斗争问题上要注意错误、倾向、派别这几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即是说,在分析党内矛盾时,必须注意分析决定事物数量的数量界限,注意党内矛盾发展的过程和阶段,并根据这不同的发展过程和阶段,采取正确有效的斗争方式方法,以求得矛盾的解决,从而真正实现党内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第八章 毛泽东政策与策略 辩证法思想

政策与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其领导目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和艺术,是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每个时期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而规定的行动路线,以及与这个行动路线相配套的斗争形式和手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策和策略。列宁说:马克思“毕生除了从事写作以外,还毫不松懈地注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公正地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自觉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去,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充满着唯物辩证法色彩的政策与策略,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和重要内容。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页。

第一节 政策和策略的客观依据

对于制定政策与策略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客观依据,这是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过很多的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又为这些阐述的真理性提供了证明。

一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

对于制定政策与策略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深刻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认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规,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能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会在实际工作中迷失方向,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在党的各个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政策与策略问题。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通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严肃指出了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的重要性。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这篇著作中,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待革命的政治态度作了深刻的研究,从而提出了党对各个阶级应当采取的政策,即:“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

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些思想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政策与策略的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武装斗争的策略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政策方面,毛泽东不同意“土地国有”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好田必先分给贫农雇农、不迁就中农”等“左”的主张,而提出了分配土地应实行“抽多补少”、“搜肥补瘦”的原则以及按人口分配的办法。1934年1月,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这些正确的土地政策,为推动土地革命斗争的顺利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武装斗争策略方面,毛泽东在1928年5月提出了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929年,他又根据红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游击战术。“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领导全党逐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纠正和清算了王明“左”倾的错误政策与策略,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调整是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代替“左”倾关门主义的策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政策与策略思想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这两个时期,他提出了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法;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这些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不可树敌太多;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并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奠定了政策与策略的基础。

毛泽东一向重视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他曾经强调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而,他认为,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二 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与策略

早在 30 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共产党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当时反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说到底就是没有调查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他认为,必须注意社会经济以及各方面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才能决定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如果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会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泥坑。

前面提到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的斗争策略,正是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经济情况和对待革命的态度,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写成的。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来的一系列关于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的政策主张,更是与他当年潜心进行调查研究分不开。当时,“左”倾教条主义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开始也并不十分明确。但是他通过大量的调查,特别是作了“寻邬调查”和“兴国调查”这两次调查之后,他就有把握地提出了正确的政策主张。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政策与策略问题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即是说,尽管这几个时期情况极其复杂,斗争极其激烈,可是我们党在政策与策略这个大问题上一直比较清醒,比较主动,没有发生大的失误,因而革命进展得相当顺利。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了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15 页。

的实际情况有比较准确的了解,能够做到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政策与策略,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后,我们在政策与策略方面出现了很多失误,最大的一条失误就是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陷入了超阶段论和主观空想论,等等。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失误,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党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对此,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作自我批评说过: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很少,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鉴于这个教训,他曾经强调:“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我们党之所以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治党治国治军的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重新恢复了毛泽东曾经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传统,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科学了解。

毛泽东曾经在30年代正确地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比起战争年代来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我们要赢得这项事业的成功,尤其需要这个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很好地研究新情况,处理新问题,及时地制定并坚决执行正确的政策与策略。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2页。

第二节 政策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策略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既坚持革命的原则,同时又注意讲究斗争的艺术,这是毛泽东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 坚定的原则性

所谓原则是指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准绳。对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原则,它反映着一定阶级和集团的立场和利益。我们讲的原则性是坚持正确的立场,即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必须服从党的奋斗目标。这种原则性有着科学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是按其必然趋势发展变化的。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同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完全一致的。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是十分重视原则性的。他要求党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策略的时候,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革命的战略目标,而不能追求个人的私利而忘记了阶级和人民的利益,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那样就失去了革命的原则性。他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

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

原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渗透和具体体现在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之中。我们自觉地去贯彻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就是坚持原则性的实际表现。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贯彻执行党在一定时期的总政策上面。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总政策或者称之为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住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策与策略都体现了这个原则性,从而最终取得了这场革命的胜利。

同样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的总政策亦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则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目前时期形成和实行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一整套政策与策略的原则性。为了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我们一定要保持坚定的原则性。

二 必需的灵活性

什么是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原则性于工作中的东西。毛泽东曾就战争指挥中如何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角度指出:“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6页。

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他这里讲的“运用之妙”就是灵活性。在制定和执行政策与策略的时候除了要强调原则性,还要讲求灵活性,即是说,我们在坚持革命原则的前提下,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阶级力量的对比,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政策与策略,使政策与策略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政策与策略的灵活性之所以是必需的,也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但是它的具体发展过程却是波浪式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途是光明的,但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却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过程。革命斗争的形势是经常变化的,有时比较顺利,有时又相当困难,甚至有时还会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采取适合情况变化需要的斗争策略。一般来说,在革命处于高潮时,党的策略是进攻的,采取比较公开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当革命处于低潮时,党就应该实行正确的退却策略,采取隐蔽的、秘密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当然,在有合法条件可以利用的时候,党的策略就应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形式,积极开展斗争,以便教育群众,扩大影响,积蓄力量,准备最后战胜敌人。如果我们看不到事物发展的这种变化,不善于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的策略和具体方法,而一味地用一种死板统一的公式去机械地套用,那么,党的政策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三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

毛泽东指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原则性是灵活性的基础和前提。即是说，灵活性必须是原则性所许可的范围内的灵活性，必须要以原则性作为标准和尺度。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实行一系列让步政策，这集中表现在中共中央 1937 年 2 月 10 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国策的同时，又作出了四项保证：一是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二是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三是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四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毛泽东认为，我们作出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同时他又明确指出：“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而且，“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98 页。

亡而奋斗。”我们党实行一系列让步政策体现了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以坚持原则性为前提和基础的,这里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

对于这一点,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经指出: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性,超出原则的让步和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和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他认为,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符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错误的。刘少奇同志讲的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

第二,灵活性又是为了实现原则性所必需和许可的。我们是强调坚持原则性的,但是这种原则性的实现往往又需要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事物,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又要讲机动、灵活,讲差异、个性,这不仅是实现原则性所必需的,又是所许可的。否则,原则性只能是空的东西,落不到实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加紧备战,企图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另一方面,迫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又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党的原则性当然是坚决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但是面对着当时复杂的形势:由于长期进行战争,人民渴望和平,我们的朋友和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士也对和平抱有幻想;从力量的对比来讲,仍然处在敌强我弱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页。

的阶段。因而,我们党一方面充分揭露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阴谋,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作好充分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我们又讲究原则性必需和许可的灵活性。为了揭露反动派的政治欺骗,教育人民群众和争取中间势力,并且我们也要争取准备力量的时间,毛泽东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谈判中,我们党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前提下,作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准备让出分布在南方八个省区的革命根据地,并压缩人民军队。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这样作“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这种政策与策略的制定,充分体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与必需的灵活性相结合、相统一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 1954 年 6 月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问题上的一次讲话,对于政策策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讲,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一个是民主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些是原则性。但是光有原则性还不成,还需要有灵活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个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搞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毛泽东主张,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60 页。

写。这就表现了灵活性。再比如公民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宪法草案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毛泽东说:“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总之,我们在政策与策略问题上必须很好地认识和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既不失掉原则,又能够真正灵活地去贯彻这些原则。

第三节 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

在毛泽东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中,阐述得最多、运用也最娴熟的即是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称之为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同等重要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是我们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夺取胜利的一大法宝。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于实行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既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等策略思想有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一 社会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的制定来源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和及时的把握。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基本矛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其特殊的表现,即表现为中国人民与各个时期的主要敌人之间的主要矛盾。在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人民大众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企图把中国从多个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独家的殖民地。因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矛盾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中国人民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来讲则下降为次要矛盾。在这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情况下,及时而正确地变化自己的政策与策略的问题就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党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毛泽东则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以及后来发表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全面而系统地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从必要性来讲,建立统一战线这是由于中国革命所面对的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十分弱小这一重要特点所决定的,即是说,为了达到反对强大的敌人和壮大自己的力量的目

的。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要解决中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就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作战。而当时的力量却是明显的敌强我弱。下了凶横直进决心要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严重的力量；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在一段时间里也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的。因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决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而且也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从当时的情况看，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产生了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一个事实。毛泽东指出：正是这些事实的存在，“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

中国共产党人取得对统一战线必要性的认识，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以往某些过左政策作了认真清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对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缺乏足够的认识，产生了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看成是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这些过左的政策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页。

毛泽东认为这一系列过左政策集中表现为关门主义策略,并且着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和高度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之所以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关门主义的种种表现,具体的原因有好几条,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一些人总是以为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以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这些人在思想上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在毛泽东看来,关门主义的这一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而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同一切可能团结的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所结成的联盟。中国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为此,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

对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足够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即要足够地估计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后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关系的新变化。由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积极欢迎和参加的态度,所以“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他们参加革命统一战线并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是没有疑问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大

毛泽东 1937 年 6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孙惠娟、田铸:《读毛泽东 群众工作问题 一文札记》,《党史研究资料》1989 年第 9 期。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7 页。

举侵略面前,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坚决抗战这是无疑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性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因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和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而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并尽可能保持统一战线的。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就造成了分别替不同的帝国主义服务和代表不同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营垒内部的分裂和冲突,这样就有可能在必要的时候同他们之中的某些势力建立暂时性的统一战线。另外,除了有国内统一战线问题外,还有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由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就要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正确地提出并解决统一战线问题,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变化”。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论述,就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

二 统一战线的具体斗争策略

统一战线政策有着丰富的内容,毛泽东指出:对于这些内容,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必须克服“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对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斗争策略的唯物辩证的阐述,是毛泽东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中的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一) 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时的一条坚定的政治原则。毛泽东明确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由于这个特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建立并尽可能地保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当然需要在一定条件下作出适当的妥协和让步。因为没有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就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但是这种妥协和让步又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自五四运动以后就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即由资产阶级领导变为无产阶级领导,这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首要标志。但是在阶级斗争严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并不是象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当然的领导权”,而是充满了斗争的。在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核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它关系到革命的性质、方向、目的和命运。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必须是在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因而,他常向人们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这样尖锐的问题。他曾经严厉批评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的右倾观点,即模糊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的观点,并提醒全党不能忘记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搞的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沉重灾难的历史教训。

周恩来也认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在他看来,统一战线中的三大问题即敌人、队伍和司令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司令官”问题。他说:“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8页。

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这与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在统一战线中必须既讲统一,又讲独立。如果只讲统一,不讲独立,那就等于拱手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走向投降主义,那样,革命的统一战线也将不可能存在。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另一方面是为了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去发展和扩大新的阵地,即为了实现使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动员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更积极的目的。毛泽东不赞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他看来,国民党当时是一个当权的党,它不承认其他党派的存在,一直在宣传和奉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切“经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要求国民党一切“经过”、“服从”我们,那是做不到的,那只能是我们一切“经过”、“服从”国民党。因而提出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只会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限制自己的行动,牺牲自己的独立性。经验证明,这是不可取的。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不斩不奏”的灵活方法,就是为了保持我们党的独立自主地位。

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要求共产党人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万勿把一定条件下的政治联盟当作思想上的绝对一致。因为有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因而就有一个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毛泽东指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

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其相同的部分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有基本相同的政纲。所不同的部分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而三民主义没有这些部分;共产主义不仅有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而且还有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纲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的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的彻底性,等等。毛泽东指出:“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他又说:“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因而,要坚持统一战线,必须弄清并记住这些差别。从思想上加以武装,无疑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问题,因为没有思想上的独立性,也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了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还正确论述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共产党只有高举民族斗争的旗帜,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才能领导人民,团结人民,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战胜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2页。

日本帝国主义,并在这种民族斗争中,逐渐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为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准备条件。毛泽东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在抗日的情况下,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大局需要为出发点,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条件。即是说,各阶级、各政党之间要有让步,没有让步就不可能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应该承认,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毛泽东说:“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无产阶级决不能因为民族斗争当头就忘记了阶级斗争,在统一战线内部实行有限度的必要的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妨碍统一战线。相反,统一战线也需要这种阶级斗争来充实自己,这是坚持民族斗争所需要的。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的辩证法。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既坚持了统一战线,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统一,又独立,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

(二) 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以往处理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关系问题上曾经走过弯路。陈独秀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一个过右,一个过左。这两种极端的政策都曾经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遭到极大的损失。鉴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所谓联合,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以至某些个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极不稳定的同盟者),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最主要的敌人。所谓斗争,就是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依照他们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同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斗争;这种斗争一般应该是和平的不流血的,但是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还要进行坚决而又有限度的流血斗争,即武装斗争。

毛泽东曾经从几个方面阐述了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

首先,联合与斗争这两个方面是互为条件的、相辅相成的。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在他看来,联合本身就是斗争的产物,联合本身就是有矛盾、有斗争的联合,因而,“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充分说明了斗争对于形成联合的重要性。但是,斗争本身不是目的,斗争的目的在于形成一定条件下的联合。因而,这种斗争就不能不加限制地使用,斗争应该以不破裂联合为限度。

其次,联合与斗争的程度及方式因统一战线对象的不同而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另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中的顽固势力。对这两种势力都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但是在联合与斗争的程度及方式上又不完全一样。民族资产阶级从总体上来讲,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是一份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大资产阶级从总体上来讲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们依附于不同的外国资产阶级,因此当革命在集中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时,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间接的同盟者。这是两种不同程度的联合。

同时,在斗争的方式上也有区别。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是争取的方法,针对他们在革命过程中的动摇态度,无产阶级应该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在这里有三个条件是不可忽视的:“(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我们的说服和批评就没有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就会动摇起来,甚至会变成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对付顽固势力则是必须采取反抗他们的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毛泽东曾经规定了对付顽固势力的三条原则:(1)自卫原则。即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2)胜利原则。即实行“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原则,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并且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这就是斗争的局限性。(3)休战原则。即实行“适可而止”的原则,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三个原则,换一个说法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间走向好转的可能。”

再次,综合联合与斗争两个方面的政策,并不是不讲重点。我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7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750页、第76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0页。

们在统一战线的政策上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即有重点的两点论。这个重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着事物的变化以及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有时侧重于强调联合,有时又侧重于强调斗争。例如,当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一战线尚未建立和建立后国民党尚能抗战时,应强调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强调联合抗日;但当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则应强调斗争,而且是坚决的武装斗争,以斗争来达到联合。这种重点论并不是一点论,还是两点论。又联合又斗争,这在统一战线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同时存在的,必须兼顾的。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所侧重并不等于只要其一点。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都是错误的政策。

最后,在联合与斗争的问题上,必须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他们不认识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区别,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有这种错误思想的人,忽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方面的原则差别;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发生冲突时,他

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周恩来也指出,犯有右倾错误的人,只注意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为他们擦粉。犯有“左”倾错误的人,只注意他们的反动性,看不到同他们联合的可能。他认为,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违背了联合与斗争、统一性与差别性的辩证法,结果不是投降于人,就是自陷于孤立。

在重视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在一定时期的主要错误倾向。他认为,一般说来,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右的错误;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错误。在芦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还未参加抗日,统一战线还未形成,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而在芦沟桥事变之后,国民党已参加抗战,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党内的主要危险又是右倾投降主义。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提醒人们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的抬头。即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时,要防止右倾投降主义;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时,要防止“左”倾关门主义。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了避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三) 利用矛盾的思想。

利用矛盾,是毛泽东为和一部分反共的顽固派建立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战线而提出一条十分重要的策略思想。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家们就已十分重视利用矛盾以反对自己的主要敌人。此后,利用矛盾的思想为历来的政治家所注意。这个思想在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那里也是极为重视的。列宁就曾经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9页。

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古代传统的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利用矛盾的思想被毛泽东很好地继承下来了,并且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特别是统一战线的实践出色地加以发挥。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和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他1935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则从政治策略的角度透彻地论述了利用矛盾的思想。他说:“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而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由于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争夺的半殖民地,由于主子和靠山的利益不同,因而在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营垒中其利益和观点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这就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这些敌人营垒中的争斗、缺口、矛盾都是可以利用的。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1940年3月,他又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利用矛盾的思想。他说:“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份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整

《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³³ 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就是对待顽固派,他认为也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而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继而在同年 12 月,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明确地指出:“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毛泽东关于利用矛盾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反共顽固派所具有的两面性的具体矛盾分析上。他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在顽固派营垒中也出现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矛盾。比如国民党顽固派也有其两面性,他们既有坚决反共的一面,又有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抗日的一面;在抗战方面,他们又有两面性,既有尚能抗日的一面,又有其动摇的一面(例如暗中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一方面他们尚不愿意在根本上破裂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对我党和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以上这些都说明,需要而且可以“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又比如对汉奸亲日派,毛泽东认为他们中间也有可以利用的矛盾。即使在汉奸亲日派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其中又有坚决的汉奸亲日派与兼有亲日和动摇的两面性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再比如对帝国主义,毛泽东不仅认为必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大举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而且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帝国主义,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成赞成中国抗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50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3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4 页。

日时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以上这些区别都是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利用的。

在《论政策》中,毛泽东讲,正是“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经验证明,只有善于利用矛盾,才能争取多数,只有争取了多数,才能做到集中主要力量反对少数。也只有真正做到了集中力量反对少数最主要的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争取多数,进一步促使敌人营垒内部发生分化,进而达到先是各个击破,最后是彻底消灭敌人的目的。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中指出:因为“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和右的错误。”

毛泽东在对敌斗争中,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彻底消灭最顽固的敌人,还规定了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的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的政策。这是利用矛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矛盾着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只要我们认真地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从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的作用。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要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对伤兵要给予医治,而后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给路费释放。这样就可以把敌人所谓我党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他认为,这是一种瓦解敌人的好办法。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瓦解敌军、优待俘虏规定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在《论政策》中,他指出:“对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4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0—211页。

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我们继续坚决执行了优待俘虏、“给出路”的政策,因而使许多敌人自动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有的经过教育后加入了人民军队。这成了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之一。仅在解放战争的四年时间里我军共歼敌 800 多万人,其中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就有 117.3 万人,俘虏多达 450 余万人。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明确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来,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建国以后,我们党在这方面执行这个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总之,利用矛盾的思想是矛盾分析方法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杰出运用,是毛泽东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中很有创造性的部分之一。

第四节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特点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一大法宝,虽然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務变了,情况变了,但是这个法宝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统一战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6 页。

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路线和总政策服务,它具有几个新的特点。

一 社会主义劳动者与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邓小平说:“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统一战线的性质,叫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就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这样范围就宽了,具有广泛的性质。”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对我国新时期社会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在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新时期以后,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几十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于1966年停止。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我国的各民主党派现在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我国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台湾同胞、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8—159页。

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以上各个方面的情况表明,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在邓小平看来,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统一战线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他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中间有一个正确理解和处理两者的辩证关系问题。首先,这两者并不等同,即热爱祖国并不等于热爱社会主义。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包括我国大陆的公民,而且还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大陆的繁荣和强大十分高兴,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祖国的关心和热爱。因而,爱国主义有比社会主义更宽泛的意义,只要爱国,赞成祖国统一,即使还不赞成社会主义,也要加以团结。我们之所以把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叫作爱国统一战线,就是要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特别是考虑到最终实现香港、澳门、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还有海外的侨胞,我们应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范围广大的统一战线。

其次,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的。这是因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主体部分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因而对于他们来讲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随着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 239 页。

那些爱国并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们终究会发生变化的,把两者统一起来的人总会越来越多。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那也不叫爱祖国。

总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从总体上来说,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致性更加增强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更加广泛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二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特点。

我国的民主党派大都产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其中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致公)、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九三学社(九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8个。这些民主党派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先后成立的,是爱国民主运动的产物。它们的主要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部分爱国分子。民主党派作为上述阶级、阶层和人们的政党,主要是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但又从来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带有阶级联盟的性质。这些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帮助和影响下,各自经历了成长发展的过程,采取各种形式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建国以后,这些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先后都以共同纲领和宪法作为他们的政治纲领,现在,它们都把拥护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写进了各自的章程。几十年来,虽然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不少曲折,但是,各民主党派始终同共产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一直是共产党的诤友,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现在,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已经发展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从各民主党派的纲领、成员的构成和工作实践来考察,已经是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党,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发展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依靠力量。民主党派的这种历史性进步,为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和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少人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人是造诣很深的专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我国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1956年,毛泽东代表中共提出了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正确方针。我们党的十二大又将这一方针进一步完善表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样16个字。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中,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互相监督、合作共事的一种新型的友党关系,是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各个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联盟。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本来就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同共产党相对抗的纯粹资产阶级政党。它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赋予的政

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它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政权工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通力合作。它们从来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

我国虽然是一个多党派的国家,但是我们实行的既不是一党制,更不是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

人民政协不同于国家权力机关,不能象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对政府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权。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民主监督作用,其中特别是密切联系各方面的人民群众,充分反映各方面的意见、要求、建议和批评,以利于党和人民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各方面的工作顺利开展。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种民主监督作用是国家权力机关所不能代替的。

总之,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一大特点。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党外朋友们的合作,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爱国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

局面而努力奋斗。”

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我们党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国家分裂问题,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一种国家建设的战略构想,这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新特点。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至今有些国土还没有统一,如台湾尚未回归祖国,香港、澳门还没有恢复行使我国的主权。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虽做过种种努力,但统一的愿望尚未实现。究竟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其中提出: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中“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尊重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年1月30日,邓小平在访美期间向美国众参两院议员讲中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能够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这次讲话,首次原则地涉及了如何对待台湾的现状和现行制度的问题。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重要谈话,其中特别提到: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250页。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3页。

资不受侵犯。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命题。他说,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解决。我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这样一个构想被全国人大会议所接受。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战略构想有这样几个基本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认识前提下实行两种社会制度。第二,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大陆十多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但允许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就是在大陆也允许一些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这种“主体社会主义”的思想,明确了在一个国家中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和地位。第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一种长期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国家内部,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竞赛,互相支援,50年不变,50年之后还是不变。这是讲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政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这一点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将予以保证。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构想的哲学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构想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中国需要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这里就有一个统一的方式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

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呢？只能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是武力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采用前一种方式势必造成损失，对各方面都不利，因而还是采用后一种方式好。但是，采用和平方式还有一个各有关方面都能接受的办法问题。采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正是从香港、台湾和大陆三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尤其是充分照顾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必须既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也是这个道理。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太缺乏现实感了，而我们如果用社会主义去统一也不现实。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国两制”可行。如果采用了这个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而且美国的利益也不致受损害。因而，这是一个好办法。

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去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新发展，是毛泽东政策与策略辩证法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要表现。

第九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毛泽东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了这些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概要地说,包括唯物辩证的战争观;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特殊性;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辩证法范畴。

第一节 唯物辩证的战争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这一论断,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精确的表述。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一 战争的起源

战争起源于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战争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战争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合乎规律的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但是，战争在历史上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突然出现的，还是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过程又分哪些阶段？各个阶段又有什么具体的特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并无定见，大体有两种明显的有差异的观点。有同志认为：在原始社会不存在战争，即或有过类似于战争的行为，也只能叫“部落武装斗争”而不叫战争。另一些同志却持反对意见，认为从原始公社母系氏族时期起已经有战争，并引证恩格斯的话以为佐证。

其实，上述两种看法虽说不尽一致，但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因为它们在一个最根本之点上取得了一致，即都承认战争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型有过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而能够打开这一座迷宫的钥匙不是别的，正是毛泽东在他著作中说的“私有财产”。

考古学资料和近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即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是一个没有战争的时期。到大约距今至少一万年以前，开始有了战争的雏形。西班牙勒文特地区反映原始人作战的壁画和我国西安半坡村遗址留存的为防御其它氏族侵犯而在村落旁边构筑的壕沟均证明这一点。

历史资料和现存原始部落的调查资料又证明：在原始部落之间初期的战争，虽说有经济利益的冲突，但在最初阶段，其根本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4页。

点是血亲复仇。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一书里说得很对：原始人心中，部落是最高利益和最高荣誉的象征，因而，氏族的成员为捍卫本部族利益也是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每一部落成员都有为受侮辱而复仇的责任。“复仇带有象结婚和财产那样的集体的性质”。

只是到了较后一个时期，也就是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几次大的分工之后，随着人们向自然界索取财富能力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引发了少数人独占产品的念头，剩余产品出现使劳动力有新的价值，这样，就萌发了原始人对俘虏不再杀死的念头，而是把战俘充作奴隶；与此同时，武器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由原先的石器、木器、青铜器演化为铁制武器，使得战争行为增加和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也就从这时起，战争开始蜕变，出现了各部落间为争夺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为目的战争。具体来说，一是，战争越来越摆脱血亲复仇的性质，渗入了经济内容。扩大私有财产和夺取别人的财产成为人们从事战争行为的动力；二是，战争双方所夺取的已不限于天然资源，也包括人类通过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三是，战争的目的已不再局限于集体自卫，而是变成对战败者的奴役。总而言之，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产品逐渐增加，氏族集团私有制急剧膨胀，这样一来，用战争手段去掠夺别人的财产成为扩大财富的有力杠杆，战争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恩格斯评述道：“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攫取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又说：“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 1963 年版，第 7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04 页。

业了。”毛泽东所说的战争是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便开始了的解决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同恩格斯上述分析是一脉相承的。所谓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无一不是由扩大私有财产这一根本性企图而引起的。

二 战争的本质

列宁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公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又说:“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策的另一种’(即暴力)‘方式的继续’。”毛泽东赞同这一对战争本质的科学规定,同时在自己的军事著作里又对它进行了补充和深化。

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这就精辟地阐明了战争和政治的一致性。照他的说法,战争离不开一定的政治目的,离不开政治总方针,离不开政治思想动员,也离不开友邻、友邦和一切同情者和赞助者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声援。至于在革命战争中,政治还有自己的独特内容,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贯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673页。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5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然而,毛泽东又认为,战争虽然从属于政治,但它毕竟只是政治的一部分、一个侧面、一种特殊表现。即是说:“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显然,这又是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区别的方面。战争的特殊性表现在它有特殊组织、特殊方法和特殊过程三个方面。特殊组织是指军队及其相应的编成与体制;特殊方法是指双方的武力冲突,都要采用相应的一整套战略和战术;特殊过程是指交战双方总是运用一定暴力手段、通过攻防矛盾的发展、推移、交错等形式,乃至通过剧烈的斗争过程包括流血在内,达到矛盾的解决。总之,战争作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特别的斗争形式,无论就其组织形式、方法和过程而言,都有其特异之点。毛泽东说:“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轻视、抹煞战争的特殊性,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战争和指挥战争。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论断,是对战争本质的科学揭示。而战争和政治却又是同一矛盾事物的两个有机联系着的侧面,它们既不能彼此代替,又不能相互割裂。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才是坚持了辩证法。

既然战争是政治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么,现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考察。

他以中日战争为例说:由于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他并说:“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如果把视野放宽阔些,就本世纪 30 年代来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难以避免也在于它是政治的继续。这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掠夺政策。” 这充分说明,战争是一种特殊手段,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使用的手段。

既然战争是一定阶级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有进步与反动之分;那么,一切历史上的和现代战争,均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 他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

三 战争中经济与政治、人与物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在深刻地揭示战争本质的基础上,又科学地考察了战争中经济与政治、人与物的辩证关系。

任何战争中,参战双方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常理。毛泽东在分析中日战争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基本要素时,把日本军力、经济力之强和中国军力、经济力之弱作了明显的对比,认为是中国不能速胜的主要依据。这就是说,一切战争都有它的物质基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9 页。

参见《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 年 1 卷,第 9 期,第 12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5—476 页。

础。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便指出,适时改革经济制度,尤其是变革封建的生产关系、是解放农业生产力,获得大量物质资源的重要措施。抗日战争中,他又说:“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建国以后,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里,继续地强调这一观点。他告诫全党,在实行工业、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要致力于国防建设的现代化。还说:我们的陆、海、空三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装备和设备,而且要掌握比较复杂的专门技术。对现代军队来说,组织良好的后勤防务工作对夺取战争的胜利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强调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并不是认为经济是战中唯一的制胜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地理、人口、外交等许多因素。在上述因素中,政治因素犹不可忽视。这是因为,如上面所说,战争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只要战争还存在,它就“一刻也离不开政治”。他举例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以及争取国际力量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进行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的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必须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人民,动员人民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自觉地斗争;必须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并要以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从而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使一切技术和战术能有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的效力。“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3—894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还有战争中人和物的相互关系。战争中必须重视物的因素,注重武器的研制与改进。比方拿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它之所以是持久战,虽说首先取决于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的联系与对比,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但客观地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条件的薄弱。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里说:“敌人不及我数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抗日军民必须努力以政治的、地理的、战略战术的种种优势弥补自己与敌人在技术条件方面的差距。他还说:毫无疑问,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他还特别强调了技术条件在战争反攻阶段的巨大作用,指出: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

在充分重视战争中物的作用的同时,毛泽东又认为,同物相比,战争中人的因素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也就是说,承认战争中武器的重要性,但不等同于赞同唯武器论。他说过: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其所以这样,首先,在于人在战争中具有胶合和凝聚的能力,它可以把战斗力的诸种要素,包括武器在内,当作不同的战争工具或战争手段综合到一起,形成整体力量投入到战争中间;其次,还在于人具有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1页。

毛泽东:《论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引自《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新华日报馆印行,1939年5月。

毛泽东:《论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引自《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新华日报馆印行,1939年5月。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一种创造和再生能力,能够通过人的智谋,使分别存在着的人和物这两种战争力量的要素重新排列和组合,寻找到一种适合于当时战争情况的最佳运用方式并发挥其最大效能;再次,还因为人不只具有综合力和再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还是一种有形力量 and 无形力量的结合。常言说,一“计”之出,可以倾复百万师,一“谋”之就,孤军亦可以致胜。这种计谋的作用便是无形的力量。毛泽东说:“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就是指的这样的意思。

第二节 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 规律的特殊性

毛泽东和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特别强调了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原理,强调研究任何一次战争,都必须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一 战争是发展的,战争规律和战争 指导规律也是发展的

战争规律指的是战争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由这种联系而形成的战争从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趋势;战争指导规律则是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自觉运用。两种规律不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从根本上说是辩证统一的。

既然这两种规律是统一的,又何必在战争规律之外提出战争指导规律?这是因为,战争指导规律虽说是由探索战争规律的过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

程中总结出来,但它同时又兼有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从它的来源、内容来看,它仍然是客观的,是客观的战争运动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认识战争的方法它又含有主观因素,即如果熟识它,掌握了它,使人们能更快或更容易地去认识和把握战争客观规律,成为人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例如,强能制弱乃客观规律,当人们了解并掌握了这一规律之后,作为力量小而弱的一方依然可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去打击对方的薄弱部位,在总体劣势的状况下形成局部优势,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这样做,并没有违背战争规律,而恰恰是以尊重战争规律、仔细研究战争规律作用的条件、范围和方式为前提的。

毛泽东说:“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段话说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间、地域及战争性质诸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着的。

毛泽东又指出:一般战争有一般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有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象层层剥笋一样,提出了从一般战争深入到如何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再到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这种研究战争的方法,从哲学上说,就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是坚持了共性、个性的辩证法。

什么是一般战争的规律？所谓一般战争的规律，就是指古今中外一切战争都必须遵循的最普遍地起作用的规律。例如，所有战争的基本原则都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有战争都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所有作战的都是采取攻防两种基本形式；所有战争的指导者都必须“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等等；不过，这些规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寓于特殊的战争规律之中的。所谓特殊战争规律，就是战争因素之间由于特殊的条件而形成的特殊的联结。例如，一般战争的规律不能全部包括和代替革命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它能推动历史前进，因而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要使战争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因此凡是革命战争都必须动员人民，而反革命战争恰恰相反，靠欺骗和屠杀人民来实现。列宁曾举出十八世纪的一位普鲁士君主说过的一句泄露“天机”的话：“如果我们的士兵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战，那连一次仗也不能打。”在革命战争中又要区分出中国革命战争与其它国家革命战争（例如俄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也就是说，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也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总之，一切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都依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不能把甲种战争等同于乙种战争，也不能把彼时战争等同于此时战争，更不能奢望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去指导所有战争。假如不顾每一战争的具体特点，不顾时间、地域和性

《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46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1 页。

质的区别,将战争的方法互相套用,就一定要犯“削足适履”的错误。

二 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指导规律的历史演变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里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暴动和起义的另一类型的革命战争。无论战争的性质、发展的趋势、作战方式、指导原则等,均有其特异之点。同时,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条件的变更,它的某些具体规律和具体指导规律也在不断地发生变更。

中国革命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所谓政治发展不平衡,是指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了分裂剥削和分割统治的政策,形成了反革命势力的不统一,使它们的力量彼此抵销,革命力量的发展便有了可乘之隙。所谓经济不平衡,是说中国工业的比重小,农村对城市依赖性也小,农业经济自给自足,革命力量这一方在经济上也站得住脚;加上中国幅员广大,革命不愁无回旋余地。

第二,敌人的强大。中国既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大国,中国革命就面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逐步发展了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三种势力。从帝国主义方面说,英、日、美等帝国主义均属强国;从国内反动势力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装备优越,物资雄厚,军队数量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代。

第三,革命力量的弱小。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看,革命力量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属于相对劣势的。中国革命军队是从游击队活动开始的,革命根据地分散而孤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时人口不满2千,产谷不足万担。抗日战争开始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只有5万余人,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发起全面进攻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也只有 127 万余人,只是到解放战争后期,敌我双方的力量才强弱易位,革命战争就很快胜利结束了。

第四,有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战争由始至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表现于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军队、指导军队的建设,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建军路线、方针和原则,巩固和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健全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一切,造成了一支进行人民战争的强大骨干力量。又由于土地革命,逐步满足了中国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吸引了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支持战争和参加战争,从而造成了战胜强敌的政治基础。

上述四点,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正是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结,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

在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结中,中国革命战争发生、发展的根本规律以及战争指导规律基本上被决定了。比如,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中国革命战争必须先在农村发动,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就被提出了;由于敌强我弱,战争开始时敌我力量悬殊,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发生了,从而战略上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重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战略方针也被规定了;作战的基本形式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这个问题也产生了,如此等等。

但是,上述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寓于各个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规律之中的。中国革命战争,如果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算起,共三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三个时期又分两种类型: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每一个革命战争时期,战争发展趋势,战争历程,采取的作战形式,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等等,都是发展、变化的。

从战争的发展趋势来看,不论是哪一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都是既有困难条件,又有顺利条件,而每一个时期,其困难和顺利的程度都不相同,敌我双方的强弱状况也不相同,由此决定了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及其实现程度也不尽相同。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结论是: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地战胜敌人。如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变,但有若干具体变化,即是虽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强国之一,但入侵中国又是以少兵临多兵,以小国临大国。这样,其强点受到了较大的制约,而中国的弱点又得到较多的弥补。所有这些,又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所区别。毛泽东对这次战争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待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又有大的变化。除了整个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变得更加有利于我和不利于敌之外,人民武装力量也大为增长,已经具有了一支进行人民战争的强大骨干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已臻于完善,敌我力量的对比也不象先前那样悬殊。这样,毛泽东对战争发展前途的估计是: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把这三个战争时期联系起来考察,战争的双方都循着自己固有的规律在发展。总的说,敌方是循着下降的路线发展,我军则循着上升的路线发展。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我军取胜的把握愈益增长,敌人则相反。毛泽东对于这几个不同的战争时期的战争发展趋势和实现程度的分析以及具体的结论,概出于敌我力量对比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变化。

与每一次革命战争时期不同的战争规律相适应,战争指导规律、作战形式等等也有不同。纵观夺取全国胜利之前的22年革命战争,前20年基本上是战略防御,后两年则转变为战略进攻。但即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几经变化。例如,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诱敌深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

战略持久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大踏步地前进与大踏步的后退的运动战方针以及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最后夺取了对敌斗争的全胜。可见,一成不变的战略方针是没有的。

同样,战争形式也是变化发展的。由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到抗日战争时期敌我之间的几层包围与反包围,到解放战争时期在各个战区内采取运动战形式,在广阔的战区和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以后,则逐步演变为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及战略追击,由战略上内线作战变为战略上外线作战。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战争指导规律,包括战略方针、作战形式等,都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是活生生的、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不是僵死的、凝固的和一成不变的。

三 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机械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机械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的特点是:不承认产生战争的条件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不重视战争中人的能动因素,不懂得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变化和发展,而是凭主观想象、凭已有经验,企图探求出一种永恒不变的战争规律和适用于一切战争的战争指导规律。

在中国古代,最初的机械论是同宿命论纠合在一起。它认为在每次战争进行以前,由于某种特异现象之出现,胜负就能预先判定。例如:“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就是用占卜星

参见《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页。

象,对照龟甲上的裂纹等办法预测战争的吉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这种宿命论的观点经不起战争实践的检验,不得不动退位。人们偏向于更多地重视战争中人的能动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由此消失。特别是由于近代科学的昌明使技术条件的优势上升为重要地位之后,近代的机械论观点就以更多地夸大某种军事技术优势为特征。例如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劳埃德就认为,通过单纯的计算战争双方的兵力和物力,可以预断战争的胜败。机械论的另一种表现,是把历史上成功的战争经验绝对化,认为谁要是把这些经验学到手,便可以毫不困难地去应付一切未来的战争。拿破仑战争中的“决战”(即会战)理论,英国的“海战”理论,德国的“总体战”和“闪击战”,法国的“消耗战”理论,都曾名噪一时,被渲染为久胜不衰的理论。

机械论与辩证法是截然对立的。从古到今,机械论都受到辩证法的无情鞭挞。孙子说:“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是以朴素的辩证法批评机械论。中国其他兵家强调作战应“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也是用辩证法指导战争的生动体现。至于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高度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作出深刻批判更是尽人皆知的。恩格斯认为,作战方式的改变,最终的根源在于经济,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飞跃。他说过:“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这些科学论断,结合批评在中国革命中产生的教条主义错误,不仅从历史观上,而且着重从方法论上,批评了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十一家注孙子》,第1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集,第211页。

首先,毛泽东从辩证法的宇宙观的高度指出了机械论的错误。他指出,人们认识事物,固然应认识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谈到战争的特殊性时,他具体地捉住了战争运动及发展变化的三个重要关节,即前面说过的时间、地域和性质。十分明显,既然战争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便都在运动、发展和变化。机械论者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想用千篇一律的公式来指导战争,就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起码要求。

其次,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照搬苏联内战时期的经验和北伐战争时期攻打大城市的经验,而使中国革命战争屡遭挫败的事实,剖析了机械论的错误。

从时间说,苏联的国内战争发生于1918年到1920年,北伐战争发生在1925年至1927年,都处在革命高潮时期,而第二次国内战争却处于革命的低潮;从地域说,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中国虽都是大国,但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性质说,也有所不同,本世纪20年代,俄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而中国革命尚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由此可见,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所发生的革命战争,不能不带有它自己的特殊性。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即机械论者不承认或不懂得战争的这些差别,因而不能不使自己弄出了许多错误。

最后,毛泽东还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并从预见未来战争的特点方面批评了机械论的错误。

毛泽东在1952年间指出: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

25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外,是无与伦比的。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接着,毛泽东运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考察了建国之后所面临的客观状况,即中国军队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阶段。为了实现这个转变,除了有相应的客观条件外,还要有不疲倦的主观努力。这里,他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建设区分为低级的阶段和高级的阶段,就是着眼于战争的变化和发展。1958年,当他讲到在未来战争中将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时,又一次反对了刻板地照搬。他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它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毛泽东这些论述,对于探索未来战争的规律,批判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极锐利的思想武器。

总之,持机械论观点的人,其思维方法的本质,是否认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它是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直接对立的。

第三节 战争的客观规律和 人的自觉能动性

战争是变化莫测的,但它又是有规律可循的。战争规律是可

以被人们所认识的。探索战争规律,实现对战争的正确指导,充分发挥全体将士的自觉能动性,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战争的经验,把人的自觉性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紧密结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思想。

一 战争的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论证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性及其认识的可能性。他断然肯定:“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又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人们常常又认为战争没有规律或战争规律是不可知的呢?这常常是和还不能正确把握战争的特点有关。

毛泽东说,通常说来,战争有四个特点:

第一,战争带有更大的流动性。毛泽东说:“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

第二,战争有其不确实性。这不仅由于战争常常受天时、地利诸条件的影响和战略战术的经常改变,而且由于战争双方都要求对敌方保密而造成的在战争中特有的不确实性。因此,实现计划性于战争有较多的困难。

第三,战争有更大的偶然性。凡事物的发展均是必然性与偶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6页。

然性的统一,但不及战争中的偶然性这么明显。战争本身是双方互争优势和主动权的激烈竞赛,双方都竭力剥夺对方驾驭战争的能力,将对方抛入偶然性的深渊,使其举止失措,被动挨打;再则,自己方面的错觉或疏忽大意也往往被对方所利用。这样,就使战争运动有双重的偶然性。

第四,战争指挥员最容易受周围环境和部下情绪的影响;而指挥员自身的弱点又妨碍他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所批评的那种专凭热情办事的鲁莽的军事家,就是常常由于“受敌人的欺骗,被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或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从而以感情代政策,以至于吃了大亏。

战争虽然有上述特点,但只是规律的特殊性问题,而不是规律之有无。就是说,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上述特点完全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处置。拿战争的流动性说,毛泽东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流动,一是数的流动,二是质的流动。并且说,在一个战略阶段,尽管战役战术上会有若干变化,但总的战略指导方针不会改变,这就构成了事物在一定时间内存在着相对的固定性,从而使制定战争计划成为可能。再拿战争的不确实性说,虽说一场战争,有四分之三的情况好象在迷雾里,使得战争的指挥员难以决断。但此种情况又不能否定战争有相对的确实性。

对此,毛泽东说:“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某种情况的相对的确实性。”这就形成战争计划的客观基础。再有,战争虽然受偶然因素影响较大,但不能排除透过战争的偶然现象能把握其必然性。这表现在:从一方面说,纯粹由偶然因素之影响而成功或失败,其几率极少,且不能长久维持;从另一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5页。

方面说,正因为战争中充满偶然性,人们又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机缘来夺取胜利。至于战争之指挥员易受周围环境、战情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部下和自身情绪的变化所左右,但这是可以主观努力尽量避免或减少由此而带来的损失的。

总之,尽管战争瞬息万变,时不我待,但战争规律总是可以认识的。不过,这种认识并不是要求人的主观认识与战争规律之间绝对的完全地符合,只要求两者间大体符合。毛泽东说:“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二 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

上面说过,战争规律可以认识。但究竟怎样去认识,以及在认识之后怎样去作战,这就要靠人们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所谓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指的是战争过程中人们的自觉活动和努力。它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或环节,一是能动地认识战争,二是能动地指导和实行战争。

认识战争和实行战争,都须正确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鉴于中国革命战争是由反动势力逼出来的,难以事先作出训练或准备,因而他特别强调从战争学习战争。他说,一切军事理论,是前人或后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研究这些血的经验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件事,就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他又说:“读书是学习,

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战争中的认识是从接触战争的实践开始。“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这是解决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根本途径。对于战争中人的认识的辩证运动,毛泽东曾有如下一段表述。他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的情况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一论述用极其精炼的语言说明了在指导战争过程中以实践为基础,认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是一个认识从低级向高级逐步深化的过程。

战争中的认识运动,不仅表现于感性认识必然要上升为理性认识,即在对侦察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决心与计划,而且表现于将这些判断、决心与计划拿到客观战争实践中去检验。这是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认识过程的又一次飞跃。毛泽东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1页。

同上书,第17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9—180页。

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毛泽东还举例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原计划攻打南丰,但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总之,从战争的发生、计划的制订,到计划的执行,再到执行过程中的修改,一直到战争终止,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其第一阶段,即军事计划的形成阶段,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事物表面的外部联系上升为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其第二阶段,即执行军事计划的阶段,是使计划在战争的客观实践中经受检验,或者说是以这种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仍然是认识过程的继续。这两个阶段的结合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全部内容。从认识论的观点看,是认识战争和实行战争的统一,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见地看,是知与行的统一。其中,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归宿。两者紧密相关,缺一不可。

既然能动性在战争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人们便应当十分注重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高度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战争中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离不开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也不能违反由这些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战争发展规律。离开客观条件的幻想和蔑视客观规律的蛮干,对指导战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尊重客观物质条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1页。

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然而,这不是说,人们只是客观规律的奴隶,只能听任客观规律去摆布自己的命运。恰恰相反,人们只要掌握了战争规律,便可以驾驭它和支配它,成为战争的主人。

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们在战争实践中通过自觉的努力来运用战争规律;二是,人们在战争过程中,在不违背客观规律要求的前提下和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改变已有的不利条件和创造新的有利条件,以达到战争或某一战局的最后胜利。就是说,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不是抹煞或限制人们的自觉能动性;恰恰相反,人们愈是研究战争规律,愈是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于客观规律,也愈能在战争实践中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自觉能动性也能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的作用。毛泽东在谈到战争的胜负时多次指出,战争中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要实现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三 兵民是胜利之本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同样,人民群众对战争胜败也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依据人民群众是进行战争的主要力量的观点,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

士兵是战斗任务的直接承担者,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无论战争属于何种类型,也无论战争处于哪个时代,离开了广大的士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就不成其为军队。士兵在战争中,不应只作为个体来看,而应看成是群体,是按照一定编制组织起来进行攻击和防御的武装集团,是以集群的方式发挥作用。同时,也不应把士兵孤立于社会以外,应该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联系起来看待。士兵对战争的情绪取决于它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属性,取决于它同当前战争的利害关系。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的经验时说:“革命战争如果真正是由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的,是同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同剥削者作斗争,那么,这种革命战争就会唤起创造奇迹的毅力和才能。”这也是肯定了士兵在战争中的极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特别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把士兵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明确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重要的条件。他说:“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十分鲜明地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后来又写下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不朽诗篇。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是因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切革命战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人民军队依靠了人民,就会如鱼得水;反之,一旦离开人民,会一事无成。拿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淮海战

《列宁选集》第4卷,第9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7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役说,便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而取胜的。解放区人民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还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极大的支援。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北、华东和中原三大解放区,共动员担架 73900 副、大小车 410900 辆,运送粮食 57000 万斤。这些粮食如果用小车装载,每车以 200 斤计,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五行。陈毅形象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如果离开了这种人力、物力的支援,要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还表现在战争中要走群众路线。这是因为,只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论持久战》里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主张,应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参加战争和支援战争的热忱,使他们认识革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人民军队应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唯一宗旨,尊重士兵、尊重人民群众,用进步的政治精神去动员全国军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也表现在人民军队的建设方面。在军队内部要实行官兵一致,在军队外部要实行军民一致和军政一致。这样,全军将士会同仇敌忾、患难与共,能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威力。毛泽东指出,在军队建设上,要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用以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这三大目的。为了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他还提出了政治工作的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80 页。

三大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

总起来说,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中心就是要依靠群众。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在战争问题上的生动体现,也是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又一具体表现。

第四节 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辩证法范畴

毛泽东在研究战略学、战术学及其相互关系时,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特别是着重运用和发挥了关于矛盾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原理。对于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量与质、得与失、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等等的军事辩证法范畴,作了精湛的论述。在论述这些范畴时,也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军事哲学中的某些有益内容。

一 全局与局部

这里说的全局和局部,专指战争中的全局和局部,是研究战争总体和各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

战争全局指的是一场战争或一次战役的总体。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句话,凡属要照顾战争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战争的全局是相对于战争的局部而言的。如果说全局是战争的总体;那么,局部就是这个总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和一个发展阶段。毛泽东对于战争中的全局与局部,作过一系列精彩的论

述。

首先,他对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规定。

什么是战争的全局呢?它包括战争的总体及其各个侧面,也包括了战争各个历史阶段的全过程。什么是战争的局部呢?是指战争的某一个方面和某一段具体发展过程。根据这个规定,毛泽东提出了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各自不同的研究任务。他说:“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如果展开来说,那么,战略学研究的问题是:战争总方针的制定,敌、我、友关系的处理,战争的基本打击方向,军事斗争和其它各种斗争形式的配合等。战术学要研究的问题是:某一次战役或战斗具体方针的制定,作战形式的选择,战斗样式的交替,军队的部署与调动等。

其次,毛泽东又指出:全局高于局部,局部隶属于全局,是两者关系的主导方面。

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情况,毛泽东批判了那种毫无战略头脑,打一仗说一仗,只企求以战役、战斗的胜利来代替战略上正确方针的观点。他强调指出,战略指导者,最要紧的是要有战略头脑,要时刻把注意力的重心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因为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只有善于通观全局,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战役战术服从于战略的要求;也只有服从于总的战略意图的前提下,才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争取全局胜利作出贡献。毛泽东指出,一个战略指导者,当其处于某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的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缺乏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5页。

战略眼光的人,在一步棋走出之后尚不知下一步之所措,常使自己处于被动。在红军长征时期,张国焘企图在毫无革命战争影响和缺乏群众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遭到失败,就是丧失了战略头脑的实例。

虽然局部隶属于全局,但局部又可反过来影响全局,对全局起某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反作用。毛泽东认为,这种反作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战争中某一局部被破坏了,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其原因是该局部并不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二是,多数局部破坏了,往往使整个战局起了变化。这是由于局部积累多了,上升为全局,由量变引起了质变。三是,某一局部破坏了,引起整个战局的变化。这是因为这个局部如同列宁所说,是链条上的中心环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转换全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毛泽东说:“战争历史中有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

杜甫在《前出塞》里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他用文学语言生动地表达了善于捕捉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重要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把复杂的政治事变比作一根链条,认为: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则是链条上的中心环节,你若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中心环节。他在另一处还把抓中心环节形象地比喻为“擒牛先擒角”。毛泽东关于在战争中抓对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6页。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8页。

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的思想,是对列宁的链与环的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所谓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依据具体情况而定。毛泽东举例说,作战时突击方向和突击点的选择,要按照当时的敌情、地形和士兵兵力的状况去规定。比方说,在中国内战时期的白区,可以因为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战斗失败,在红区就显得不那么重要,如此等等。

二 量 与 质

事物的质和量是它的两种不同的规定性,量变和质变则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形式或两种状态。这些在战争中都有特殊的表现。毛泽东对于战争中的量和质作过多方面考察。

首先,他依据在战争中双方力量消长起伏的具体特点,对战争中的量和质作了新旧、上下的区分。他在分析抗日战争第一阶段中国与日本两方发生的质和量两方面的变化时,有过如下的生动描述:在这一阶段,日本和中国都有向上和向下两种变化。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其劣的程度将更为严重,表现于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与文化机关的缩减,而且会缩减到相当大的程度;但还有另一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就是战争经验之取得,军队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显然,这是方向相反的两种变化。这两种变化不只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区别。有些变化代表事物发展的前进方向,有些则不是。他还认为,就这一个阶段而论,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而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

最后胜利的根据。

从敌人方面说,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巨额的财政支出,国际舆论的谴责等方面。这些变化,使我们有最后胜利的根据。但是也要估计到敌人向上的变化,那就是领土的扩大,可控制人口和可掠夺资源的增加。从这方面看,又有利于敌而不利於我。于是产生了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会被人们用来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

但是,我们又必须估计到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局部性和暂时性。它是行将灭亡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加上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日本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加深等等,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其次,战争中对于部分质变原理的运用。

部分质变是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原理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战争中无论是哪一方,也无论是在战争的哪个阶段,它的力量的变化往往是分层次、分方面、分阶段的。这样,战争指导者应当在敌我力量对比的总形势中,选取敌人薄弱的部位,击而胜之,再击再胜,如此波浪式地扩大战果,使局部性的胜利扩展为全胜。毛泽东说:“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这段话用浅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7—468页。

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

显易懂的语言说明了事物发展中部分质变这一深刻哲理。

我国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 22 年的战争,就是由局部地区的工农武装割据开始,然后一块一块地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在当时的根据地内,借助于人民武装力量建立的地方革命政权,实行土地改革或减租减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从根据地的局部范围看,已经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引起了社会性质的根本变革。尽管这种变革同 1949 年建立起全国性的人民民主政权有原则的区别,但是从局部的地区说,它毕竟是社会性质的质的变化。

在实战过程中,也同样地需要运用事物部分质变的原理。例如,歼灭战之所以优于击溃战或消耗战,正像毛泽东所说,就因为歼灭战“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某一个师。”他又说,我们的战争,在于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这些论述,无疑也是事物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的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再次,毛泽东还强调说,无论是大的战略胜利,还是小的战役或战斗的胜利,必须先有量的积累为之先行。

恩格斯说过:“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的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中国古代军事家孙臆也说过,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休民,其伤在于数战。意思是说:军需品够用,在于速战速决;军队战斗力强,在于养精蓄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8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85 页。

《孙臆兵法·篡卒》。

锐；军队战斗力挫伤，在于频繁作战。毛泽东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践也说过：我们积累的力量愈多、愈充分，我们胜利的把握就大一分，胜利的时间便早一日，此外并没有别的取巧图便的法门。又说：“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

三 得 与 失

战争中的得与失，是战略学中有关战争行为价值的一对范畴。所谓战争中之得，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战争手段或战役、战斗行为，获得某种政治、经济、军事或外交等方面的利益。战争中的失则相反，是由于上述手段的实施，丧失某种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利益。战争中的得与失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付出较小代价而获得较大战果为得大于失；反之是失大于得。

毛泽东对战争中得与失的考察，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人心的得与失。他在考察每一次战争时，一贯地强调人心向背的重要。认为这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他的名言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说过：“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他所说的得民心，即包括自己方面的人民，也包括敌对营垒里一切可以被争取的人。为此，他除了强调在人民军队内部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以及我军与友军的一致之外，还制定出正确的对待敌军官兵和争取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1页。

同上书，第470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

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对于俘虏，不得杀害、虐待和侮辱。

其次，是正确地衡量人地得失的相互关系。人是指兵员，地是指地盘。由于在战争中，消灭敌人和占领土地往往不可兼得，尤其在军力有限的情况下，用于前者便不能同时用于后者，反之亦然；再加上战争是一种迅速流动着的事物，参战双方的攻守、进退等等是常有的事，长期地或始终一贯地固守一块土地也往往为战争的客观状况所不容许。这样，就必须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说过，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对革命战争的某些发展阶段说，“得地不是喜，失地不是忧”。后来，他又总结了解放战争初期的运动战经验。在撤离延安的前夕又说：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在战争的某些阶段，得和失不可只看表面，虽说敌人占领了土地，但也分散了兵力，消磨了斗志，激起了被占领地区人民的仇恨与反抗；我方虽然失去了土地，但却换来了机动、赢得了消灭敌人的战绩，也能逐步地积蓄自己的力量。双方皆有得有失。对革命军队一方来说，只有不害怕部分土地暂时的丧失才能达到最终克服强敌和实现自由与解放的目的。毛泽东批评了在十年内战时期的某些教条主义者，由于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全然不懂：“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一辩证哲理。第二次大战期间，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再次，是关于决战。决战在战争形式中有特殊含义，是指战争双方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和火力，进行较大规模的拼死较量。决战不同于一般的战斗，它直接关系到战争发展的趋势，战略的全局，甚至还决定整个战争的命运。毛泽东对待决战的一贯观点是：进行有利的决战，避免不利的决战。他说：“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

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这里说的战略守势的作战,是指弱军与强军作战。当弱军处在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阶段时,对战略决战尤其要取慎重态度。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依据当时战争的客观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把决战划分为三类:

- (一) 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
- (二) 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
- (三) 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

毛泽东解释说:“ 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待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毛泽东论战争中的得和失当然不只是上面这三个问题,然而这三个问题:民心的得失、人地的得失、决战。无疑是其中的最紧要者。

四 进攻与防御

进攻是战争中一方对另一方采取主动出击的态势,目的在于歼灭敌人和攻占重要地域(地区、目标)。内容包括:使用兵器杀伤敌人,实施坚决的冲击,消灭与俘获有生力量,夺取武器、军事技术装备和占领预定地域(地区)。防御则相反,是战争中一方对另一方实行据守的态势,目的在于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突击),掩护(扼守)一定的方向(地域、目标),节省次要方向上的兵力兵器而在主要方向造成对敌优势。事情常常是:当不能进攻或不宜进攻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7页。

时,军队就被迫或有计划地使用防御手段。很显然,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交替使用的两种基本战斗形式,其它各种战斗形式,都是攻和防两种战斗形式的交替和反复。

进攻和防御,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侧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就战争总体而言,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防御则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毛泽东说,通战争的全体来看,“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他还说,进攻虽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

然而,进攻和防御,作为事物矛盾的两个侧面,它们不仅相互对立,而且又是依一定的条件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毛泽东特别总结了中国的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对防中有攻的辩证内容作了极透彻的说明。同时又提出了战略防御中的战役战斗进攻;战略持久中的战役战斗速决;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外线这三大著名军事原则。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对待进攻与防御的关系,曾出现过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党内一些持教条主义观点的人以为:哪里有进攻哪里便不能有防御;哪里有防御哪里便不能有进攻。要么是否认防御的进攻,要么是否认进攻的防御。前者是冒险进攻,后者是消极防御,各走向一个极端。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由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发展到退却和逃跑。正如毛泽东所说,右的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错误为之先行。“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针对中国革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2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

命战争中敌强我弱、革命方面短期内无力对反革命方面举行全面的、大规模的进攻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阐述进攻和防御的辩证关系时,主要是通过对消极防御方针的系统批判来实现的。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还说:“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

党内一些持教条主义观点的人为他们反对积极防御的方针找到了一个借口。他们机械地搬用马克思的话,即“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马克思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恩格斯还说,在革命政党领导工人阶段进行武装起义的情况下,要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甚至主张“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但这些话都是针对武装起义而言的。相反,这两位导师在分析两军在军事对抗中应采取什么战斗形式时,并不是一味地只强调进攻,例如,恩格斯研究过的大量战例,都证明积极防御有独到的优点。

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时,把两种情况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马克思的话“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的反动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8—19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6页。

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毛泽东这段充分说理的论述,击中了形而上学机械论者的要害。

毛泽东不仅尖锐地批评了把进攻和防御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的错误,而且还进一步全面阐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特别吸收并参照了孙子提出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著名军事原则,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对防御手段在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充分的估价。他深入揭示出了小国对大国、弱者对强者在执行防御时攻防矛盾的具体规律,详尽地发挥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指出,执行战略防御方针常常和战略退却连在一起,即是说战略退却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退却又不是纯消极的。他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还指出,从战略发展的全过程看,面对强敌,先退一步,甚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采取防御战术,是允许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进攻的前奏。其优点:第一,是有理,是自卫还击而非主动出击;第二,是有利,可以扬己之长,避己之短,使自己的兵力相应集中;第三,是能把敌人置于被动局面,使敌人兵力分散,处处失算,士气低落,疲劳沮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齐鲁长勺之战,以此来具体地阐明弱军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对于全战局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9—200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五 主动与被动

在战争中,人的自觉活动和努力集中地表现在双方都要争夺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即主动权。如果丧失了行动的自由权,军队便会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毛泽东首先阐述了争取主动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说,在战争中,最要紧的是争取战略的主动权。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迫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他还说:“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战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事实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既是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劣势装备的革命军队打败优势装备的反革命军队的历史,也是不断地争取战略主动权,化被动为主动的历史。

争取战争中的主动权,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指导能力。就是说,首先,应承认,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强军和弱军打,强军处于优势,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强与弱之分又是相对的。强军不是一切都强,是强中有弱,实中有虚,优中有劣;弱军也不是一切都弱,而是弱中有强,虚中有实,劣中有优。例如,拿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说,毛泽东指出,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这是必须承认的。然而,日军虽强,但有三个弱点:兵力不足,异国作战、指挥笨拙;我军虽弱,又有三个优点,地广人多,得道多助,指挥灵活。因此,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1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其次，还要看主观指导能力。优势的一方指导失误，劣势的一方指导得法，常常使战争双方强弱易位。如毛泽东举出的韩信破赵之战，赵军是韩信所部之数倍；楚汉成皋之战，楚军为汉军之四倍；新汉昆阳之战，王莽（新）军比刘秀（汉）军大了近 20 倍；吴魏赤壁之战，魏军为吴军 30 倍，但是，这些强军均因指挥失误而败北、弱军以战术得法而获胜。可见，否认一定的客观条件，是拚命主义和冒险主义，是军事哲学中的唯心论，把客观条件凝固化，不承认在运用客观条件时，有会用和不会用的差别，又会导致逃跑主义和失败主义，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要取得战争中的主动权，须有一支强大而有活力的军队。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采取积极防御方针，不使自己的兵力作无谓的消耗；二是，要善于集中兵力，在局部范围内使自己先取得胜利。毛泽东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还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能改变进退形势；二能改变攻守形势，三是能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所以，这种敌我双方在力量对比方面矛盾的转化，基本上靠集中兵力这一着。最后，他还深刻地阐明了打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之间的关系。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红军打好歼灭战主要靠集中兵力。又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除了要集结大量而有活力的军队外，毛泽东也指出，还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进攻与防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4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7 页。

御,人与地等军事辩证法诸范畴关系。例如,当我们在全局上处于被动时,要力争局部主动;在内线作战处于不利地位时,打到外线去;在战略上持久时,在战术上要速决;在总体上防御时,在部分上要取进攻之势;在存人与存地发生矛盾时,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这一切都体现了辩证法中所说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发挥人的主动性,可以改变战争中不利的形势,达到“化敌为弱、变我为强”的目的。

毛泽东还详尽地阐述了战争中善于把计划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善于审时度势,善于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等等,这一切在争取战略主动权中有特殊的作用。

毛泽东关于战略学和战术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范畴,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除了上述几对重要范畴外,还有直线与曲线、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兵力的集中和分散,战术运用中的虚和实等等。这些军事辩证法中的范畴,同他的整个军事辩证法理论一样,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

第十章 毛泽东社会主义 建设辩证法思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其先期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他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艰巨任务,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里的各种复杂矛盾,提出了包括独立自主原则在内的一系列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的方针和原则,在这些方针和原则里渗透着活生生的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毛泽东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这一段话，是他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经验的深刻总结。

一 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特殊性

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不是偶然的，它有历史的、实践的、认识的多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历史特点。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说：“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也就是说，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只有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获得解决。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是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适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同历史上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惯例完全不同。人们知道，封建主义经济制度代替奴隶制经济制度，资本主义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列宁选集》第2卷，第599页。

经济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经济制度,都是通过新兴阶级进行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取得政权来实现的。但是,在这些社会制度更替前,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在旧社会内部适应生产力要求自发地产生了。所以,严格地说,这些革命都是新兴阶级在已经有了适合自己利益的生产关系的条件下进行革命的。在革命胜利后,他们不过是依靠政权的帮助,使适合自己利益的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中成长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已,从而也就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则不然,如上所述,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没有或者几乎没有适合无产阶级利益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自发地生长,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通过对资本家财产实行剥夺或赎买的方式才能创造出来,而且一经创立,主要生产资料、大型企业、公用事业等,无不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归国家支配。这种经济制度的特殊产生方式很容易在人们头脑里造成一种观念:政权的意志仿佛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决定经济,可以随意向经济发号施令,同时,也易于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从而在相当大程度上诱使人们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

(二)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实践过程。

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很久,苏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它经过苏维埃政权建立时期、国内战争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新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用前后2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的产生,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理论向现实转化的初步完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初期的发展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胜利起了明显的保证作用。但是,也如人们所知,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建设模式由于其所有制形式过于划一,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加上片面强调行政管理手

段和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等,都表现了它明显的弊端。由于这些弊端,极大地束缚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勃勃生机,也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干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正常发挥。而究其根源,除了若干特殊的历史因素之外,重要的一条是在许多方面偏离乃至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众所周知,我国建国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使我国的革命分成了两个步骤: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步骤互相联系,互相衔接。按照毛泽东的分析,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有人认为,我国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低,没有条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我国生产力水平虽然低,但并不意味着毫无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也不意味着缺乏建立这一社会制度的主观条件。更不要说有利的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条件和机遇,都促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合乎历史规律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正是反映了这一事实。然而,也应冷静地看到,在建立起适合于中国情况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再继续怎样向前发展,仍然面临着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严重任务。虽说,自50年代末期开始,毛泽东便十分赞赏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论断,因为它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也赞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里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论断,并为探索适合于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但总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

说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还不能说是很好的。

(三)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一个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在地平线之后,人们对它的认识总是要经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浅层次认识到深层次认识的历史过程。由于中国革命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得以成功,因而便容易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传统;又由于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基本上仿效苏联做法,对产品经济大力提倡,对商品经济则有意压抑,因而又形成了比较浓厚的产品经济意识,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妨碍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如同毛泽东所说,当着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使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并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更不要说,即使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探索,也决不会是一蹴而就。这是因为,对于客观的规律,开始时往往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逐步被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也有一个从完全不认识到开始有认识,从有较片断的认识到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有一个实践和学习的过程。毛泽东在50年代说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也有类似的意思,所谓天生的圣人和天生的先知先觉者是从来也没有的。

综上所述,从历史特点、实践过程和人的认识几个方面,都说明了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极端重要性。

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点

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必须研究中国社会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主义建设的历史特点,就是应着眼于某一特定事物运动过程和其它事物运动过程的质的区别。在这方面,毛泽东虽未给我们提供出系统的现成答案,但是,他在若干篇重要著作里的相关论述,事实上已经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解答。概括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点是:

(一) 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转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

在旧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换言之,中国是在相当落后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和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

建国以前,我国资本主义经济虽有百余年发展历史,对原先就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有一定的破坏和解体作用;但即使如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全部国民经济总比重的10%,其中,占大多数并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官僚资本。毛泽东对于这种落后的、畸形的经济结构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 中国地广人多,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

中国地域广大,领土面积约960余万平方公里,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虽有广大的肥田沃地,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有大片的森林、丰富的矿藏和数不清的江河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9—1430页。

湖泽,又有很长的海岸线,便于国际交往。然而,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很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非常不够;另一方面,人口基数大,增长又快,使得每一个人所能利用的自然资源又极其有限,非但比不上苏联,也比不上美国和巴西。这样,国土大,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平均每人占有的自然资源十分微薄,成为我们的基本国情。

在普遍经济落后的状况下,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状况,毛泽东早在30年代描述的“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城市和停滞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种状况,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未改观。据统计,在旧中国总计修铁路二万二千多公里,仅东北和沿海地区就占去全国铁路的 $\frac{3}{5}$,西北和西南地区铁路很少,交通闭塞。解放初,我国的公路约8万公里,大部分分布于东南沿海较平坦的地带,占全国土地面积 $\frac{1}{3}$ 以上的山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没有公路。

(三) 中国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榨,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低,民主传统也较为缺乏。

毛泽东早就说,旧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长时期内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其贫困、不自由和文化低下的程度,为世界所罕见。以知识分子来说,各类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不足500万;而且,一般说来,也缺乏进行现代化大生产的素养和经验。文化水平既低,民主传统又缺乏,各种思潮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空想主义、冒险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潮容易泛滥,独裁专断的家长制作作风易于滋长,也难以根除。

(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酷爱自由的民族,又是一个有进取精神和富有智慧的民族,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又

得到了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毛泽东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为反抗国内外各种黑暗势力，有过大小数百次的战争和起义，产生了难以数计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后，又集中中华民族之精英，经过数十年艰苦努力，最终地掀掉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更进步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的，这里说的进步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条件，二是指技术条件。

所谓社会条件，是说中国的经验有前车可鉴，有先例可循，又能得到主要来自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人们记得，从 1953 年开始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 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致使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些工业部门，包括飞机、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冶金、矿山设备、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22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98 页。

所谓技术条件,是指在这一个时期,各先进国家的科学与技术飞跃发展,低技术经济过渡到高技术经济、一国型经济演变为世界型经济。这样便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便有可能及时采用科学技术新成果,在更高的起点上起飞,以尽快地跻身于世界先进的民族之林。

上述五个方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历史特点,这些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也不是细微末节的点缀,而是作为最突出的内容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之中。这些特点,既有困难的方面,又有有利的方面,因而决定了中国建设也有两方面特点和两种前途,一是能够发展,能取得胜利;二是又不能发展很快或很急,弄得不好,还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挫折甚至失败。

三 揭示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领导我国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注意于研究和探索适合于自己的特殊道路。在这方面,他有过许多天才的构想和卓越的贡献,也出现过严重挫折和造成难以挽回的失误。他的探索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启动阶段,大约从 1953 年至 1956 年底。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应当从何时开始,在 50 年代初期并不明确。毛泽东在 1950 年 6 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讲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时,还解释说“这种时候还是很远的将来”。因此,当时确定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总方针,意在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为以后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作准备。后来,由于各方面情况发生的变

转引自龚育之著:《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第 141 页。

化,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形成,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自1953年9月起,我国开始拟制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突出了重点,即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强国家工业基础建设。为实现这一要求,又提出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毛泽东把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称作是“大仁政”。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他并以发展重工业作为例子,认为这是施大仁政,认为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后来,毛泽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作出了肯定的评价。1956年11月间他说:从前四年的情况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又说:“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第二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大约是从1956年底至1959年。

1955年底,农业合作化高潮迅速到来,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毛泽东感到异乎寻常的高兴。原打算用15年时间完成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大地提前完成。毛泽东认为,从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日起,开始了一次伟大的转折,即从阶级斗争转为“向自然界开战”,由社会革命变为向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革命,由革命转向建设。鉴于苏共20大召开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弱点和弊病暴露得比较充分,促使他在着手规划中国下一步的建设时,试图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成果。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于因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而引起的形势变化过于乐观,急躁冒进的思想也明显膨胀,开始提出要反对社会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4—315页。

主义建设上的“右倾保守”。1955年12月,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上半年出现了冒进,经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同志的纠正,冒进暂时得到抑制。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酝酿大跃进。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七年超过英国,十五年或二十年赶上美国。于是,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勃发起来。这一运动的积极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从最终结果来看,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第三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及为了挽救这些挫折而进行不懈努力的阶段。大约从1959年底至1962年。

由于反右派斗争形成的阶级关系的重新紧张和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使得毛泽东开始背离了自己关于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正确决策,又由于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成绩的过高估计和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片面理解,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顺利发展过程中脱离了正确的轨道。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思想里表露出了浓厚的空想性质和“左”的色彩,虽然他的主观愿望是要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但由于严重地违背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大跃进是毛泽东率先搞起来的,但党内首先起来反对高指标和浮夸风的也是他。在1958年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他指出,要压缩空气,降低指标,反对浮夸,反对作假。一直至1959年7月间,他和党中央曾努力领导

全党开始纠正在前一时期广为泛滥的冒险主义错误。可惜由于对错误的思想根源缺乏根本性认识,又提出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不能动摇,使这种纠正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及至同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继而扩展为全党的“反右倾”斗争,纠正“左”的错误的的工作被迫中断,而“左”的东西以更猛烈之势向全国蔓延。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先后产生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标志着党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又重新纳入正确的轨道。

第四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探索阶段,大约从1962年末至1966年。

1962年9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提阶级斗争,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重新确定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但一方面接受庐山会议教训,不把这一观点传达到基层;另一方面当形势趋于好转时,毛泽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断言调整任务尚未结束,尚须作两年调整。这样,带来了我国在文化革命前经济复苏的好形势。当然,也应看到,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的一些正确思想还继续有所发展,比如提出“必须打破常规,尽量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论断,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必须要打”的论断,规划了“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可惜,由于他以后不久又对形势作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估计、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上述正确的构想未能实现。

从上面几个历史阶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曾作过长时期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中,有过许多突出的贡献和天才构想,也有过许多挫折、曲折和难以挽回的失误。无论是成功与失误,对于我们继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来

说,都是难以估量的宝贵财富。

第二节 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

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改造和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改造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改造都提供了一些十分有益的经验,对于后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是作了铺垫的工作。

一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

对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如何改造,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在解决这个难题方面,毛泽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们知道,无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以后,如何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暴力剥夺的方法;另一种是和平赎买的方法。关于后一种方法,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论述,但都没有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列宁在俄国条件下又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并论证了国家资本主义学说,说这种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国家“能够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列宁倡导的和平赎买政策,他们的财产最终是通过剥夺的手段回归到无产阶级国家手里的。

在中国,能否成功地实现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取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能熟练地掌握马克思列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4—315页。

主义以及是否善于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说：“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这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如果用这一方法考察，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理由主要是：

第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它存在着两面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植根于中国这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从一开始就有革命性和妥协性这两种品格。针对这种情况，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内，我们党曾对它采取“慎重”的政策，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对它的两面性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基于这种两面性，他断言：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它同俄国资产阶级有很大的差别。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历来对外奉行扩张侵略政策，资产阶级政党又是一度当权的党，它的资产阶级只有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面而没有两面性。

第二，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过近三十年的合作历史，有利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政策的实施。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0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人们不会忘记,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始,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把旧民主主义发展成了新民主主义,他本人也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朋友。从此,开创了民族资产阶级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阵线的历史。这中间,虽说在1927年以后的九年里,他们曾抛弃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同地主买办阶级作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和半破产的境遇”。这次教训之后,他们基本上能够保持同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联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与锻炼,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愿意同共产党合作;而且,从中已经产生出一部分不怕“共产”,而且下决心准备“共产”的进步分子,毛泽东及时地抓住这些先进典型去带动一般。例如,1952年9月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就提出“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第三,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时,一项重要任务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而这一举动既是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又包含有社会主义改造性质,这一点与俄国也不相同。

能不能顺利地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改造,要看无产阶级国家手里有没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前面说过,俄国资产阶级之所以不接受列宁提出的和平赎买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甚至以怠工、反抗,直至发动反革命内战,在于他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政

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0—181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2页。

权尚缺少经济实力,许多生产部门有待于恢复。中国则不同,经过22年武装斗争,无产阶级手里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1949年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大大有利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和改造。毛泽东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而且,由剥夺官僚资本而来的国营经济,虽说还在恢复和发展中,但已经具备了改造民族资本的基础性力量。

毛泽东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便说过: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有两重性: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即反对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对官僚资本又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级,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具有两重性质的,毛泽东关于反对官僚资本两重性质的揭示,实际上指明了建国以后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这一方从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地位。

第四,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对于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和刺激。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下面还会说到。这里要说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与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相比较,第一种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第二种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不过,他又特别指出,在象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两者“都是必要的”。这两种联盟在社会主义时期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为什么要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要搞到更多的工业品,以便改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

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为什么又要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呢？是为了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限制资产阶级。毛泽东十分形象地说：“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正因为两者相互依赖又相互关联，因此，中国农民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态度如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选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上，1955年下半年由于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大大加速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因为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便彻底割断了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资产阶级被彻底地孤立起来，也就为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提。

第五，党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改造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上述各种条件，只是具备了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改造的可能性，要把可能变为现实，还要党制订出正确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正确的政策的提出与实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还在1953年，毛泽东就指出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他说过：国家资本主义对我们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资产阶级不走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不走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它。他还具体指出，实行改造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在另一处，当他解释什么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时，又说：“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7—198页。

参见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7卷，第68页。

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他又进一步解释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要用自愿互利原则，而不是诉诸于暴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从上面几段话看出，毛泽东充分领会和具体发挥了列宁提出但在俄国未能真正兑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上述构想作了创造性的运用，从而为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和政策。邓小平指出：“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二 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着重谈谈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农业合作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对此，毛泽东也作过系统的和连贯的考察。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农民最终要走合作化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恩格斯在 1894 年就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而是要“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列宁在十月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8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99—100 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10 页。

革命后也有过吸引农民走“合作制”道路的设想。正是基于上面论断和以后苏联建立集体农庄的历史经验,毛泽东还在建国前夕,就多次提出农业近代化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过:“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的性质必须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人据此认为:农业集体化作为一种新生产关系不是随时都能建立的,它应以使用大机器为先决条件。在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的条件下,急于搞农业合作化,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由此断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结论是:“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

对于这个决定中国农民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的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作了创造性的和有益的探索。

首先,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性质的认识。

毛泽东认为:一切对新经济组织形式的采用和对于现存生产关系的变革,都应有利于扩大和提高生产力。这个原则无可非议,但如何提高,应依据当时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就中国土改以后生产力发展水平说,确实难以在短期内为农民提供出大批的拖拉机和化肥,但并不等于只有拖拉机和化肥能提高生产力。毛泽东说:“互助合作组织是介于手工劳动和机械化之间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88—189页。

础,也是可行的。”实际上,他的这一想法,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已产生。1943年,当他总结根据地军民组织生产互助的经验时就说过: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提高生产力,二人可以抵三人,甚至一人抵二人或二人以上。

这就说明,建立在农业合作化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其目的正是为了在现有基础上扩大和提高生产力,它符合于生产关系变革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性质这一规律。

其次,是对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的要求究竟怎样看。

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就农业自身的生产力状况来看。诚如毛泽东所说,就其基本形态来说,是和古代近似的,仅就这一点而言,此时实现合作化,似有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之嫌;另一种不是就农业谈农业,而是联系到农业和工业,农业合作化和工业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来看,那么,就会认为:农业方面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不仅没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恰恰是适应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详尽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因为,其一,只有农业合作化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小规模经营,为使用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也才能进一步解决我国年年增长的商品粮及工业原料的需要及现实农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尖锐矛盾。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1页。

见《论合作社》(1943年)《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89—890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1431页。

到绝大的困难, 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其二, 实现农业合作化可以为工业积累更多的资金。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 有相当大的比例要由农业来积累, 除了直接的农业税外, 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 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 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 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其三、农业合作化为工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如属于重工业部分的农业机械、农用化肥、农业运输工具生产及供农用的煤、电、水利机械等等的生产“ 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再次, 是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的两极分化及工农联盟如何巩固的问题。

农民从地主手里分到土地以后, 确实调动了人的生产积极性, 但也可能形成两极分化, 由此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积极性, 即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外, 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自1951年土地改革以后的四年间, 农村里两极分化现象已日趋明显。毛泽东说, 土地改革以后, 农民分得了土地, 有了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人口众多, 耕地不足, 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的落后, “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 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 比以前有所改善, 或者大为改善, 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 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少数, 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因势利导, 适时把他们引上合作化道路。如果任其自流, 将使两部分人都对我们不满, 失去土地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埋怨我们见死不救, 向资本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181—182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182页。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179页。

道路发展的一部分富裕农民将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他们更多的剥削要求也对我们耿耿于怀。这样,党就难于在广大农村找到自己真正可以继续依靠的力量,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也难于巩固,整个中国现代化事业会变得无望。由此可见,只有不失时机地实现农业方面社会主义改造,才能使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并使它不断地得到巩固。

正由于毛泽东从上述几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才使得我们党在对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获得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并为尔后的实际进程铺平了道路。在具体实施时,又创造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又到高级社这样一系列过渡形式,使得农民对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不感觉到是突如其来地到来的,这就大大地方便了改造工作的进行。由此可见,中国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一个好的范例。

我们这样说,决不是否认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发生过一些缺点和偏差。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在1955年夏秋以后,无论农业合作化或是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都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去简单划一”等一些弊端。但是,“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第三节 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初步阐述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现了高潮。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积累了初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

的经验。在这种条件下,对比苏联建设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自己的独特经验,探索适合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可能。《论十大关系》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思想的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这里说的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实现工业化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一 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

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首先遇到的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

提出农、轻、重的相互关系,同苏联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有关。苏联的工业化是从本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在最初一段时期,保持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难与相比的高速度,因而完成了使俄国“由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一个飞跃。”由于这一成就,不仅为40年代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胜利后恢复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前提。如人们所知,苏联在卫国战争结束后,仅用三年时间,就使国民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1950年比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一倍多,国民收入增加了83%。苏联之所以能用十二年时间,即从1928年起到1940年,使自己的工业总产值增长7.5倍,国民经济收入增长5.1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里的比重达到86%,从而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二百年时间里走过的路,与坚决贯彻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方针不无关系。

然而,到了50年代初,尤其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95页。

工业化模式中隐藏着的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这些弊端是：1. 对重工业投资比例过高，造成农业、轻工业的长期落后。从 1929 年到 1940 年，工业年均增长 16.8%，而谷物产量只是勉强地赶上和超过了沙俄时代最高水平。2. 国民经济比例安排严重失调，影响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在“一·五”期间，苏联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例为 9：1，并在长期内居高不下，使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3. 部门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又基本上实行排斥市场调节的指令性计划。在苏联的经济建设中，决策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行政机构，其权力所及，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所有经济环节，对于企业的生产方向、品种规格与产品数量、物资来源、取得方式、销售途径乃至工资基金额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同时又否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结果在相当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

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弊端，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5 年底，他提出“以苏为鉴”，其后，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里，依据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面经验的总结，对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

毛泽东在对待上述三者的关系上，坚持使用辩证的观点。一方面肯定重工业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不主张把农轻重三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

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 55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0 页。

问题。”既要工业化，当然首先要确定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毛泽东对于我国重工业基础之薄弱深有感慨。建国初期，我国的不少能源部门供应紧张尚且不说，就以基础工业而言，如矿山设备、冶金设备、高精度机床制造、发电设备制造、拖拉机、汽车、船舶、飞机等等的制造业以及新兴的石油化工、电子等工业还根本没有。在这种条件下，想要使工业给农业以更大的支持，也难于办到。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他劝诫人们，“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据此，他斩钉截铁地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然而，在确定重工业为发展重点的前提下，他又十分强调，应妥善地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这三者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如果不能相应地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的优先增长地位也难于保持。具体来说：其一，农业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而吃饭是人们从事一切其它活动的基础。毛泽东说：“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其二，“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制烟要有烟叶，制糖得有甘蔗，织布先要种棉，制作皮革也必须先养猪、养羊、养牛。就是说，只有在农业生产提供充足原料的前提下，轻工业生产才可能迅速发展。毛泽东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其三，农业是工业的重要市场，特别是属于后期实现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0页。

同上书，第268页。

同上书，第36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业化的国家,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国内。随着农村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轻工业品的需求固然可观,对重工业品如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的需求也不可低估。其四,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其五,现在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农产品。正是基于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的深刻的剖析,毛泽东对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关系作了双向思考。他尖锐地发问: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后一种办法可以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使它的发展基础更加巩固。从辩证的观点看,这叫“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或者叫“相反相成”。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关系作了辩证思考,使得他逐渐酝酿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农轻重序列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以后则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

二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构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两个重要方面。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社会主义就没有坚强的支柱,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社会主义就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整个国防建设还是作为国防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建设,其目标、规模、速度和现代化程度无一不受国家经济实力所制约。这样,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条件下,就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有一个妥善的分配问题,多用于前者,必少用于后者,反之亦然。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一矛盾,是一个难题。

毛泽东在 50 年代就说:“国防不可不有”,“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基于这一考虑,还在我国生产力基础十分薄弱、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他果断地决策搞两弹一星。 据统计资料,1956 年石景山钢铁厂约有 13% 的职工家庭人均月收入不足 8 元,29% 的职工人均在 8 元到 10 元之间。而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在 1955 年只有 82 元。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建议用有限的资金搞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等。这不能不说反映了他作为战略家的眼光。同年,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我国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择原子能、航天、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电子学及自动化技术为国家重点,也是把国防工业建设放在首位。对于这一点,不少著名学者及海外人士极为赞赏。他们说:“五十年代,我们曾不失时机地注意发展新兴技术,促进国防的现代化。经验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战略决策。” 军事理论界的人们也承认,决策搞两弹,证明我们把握住了时机,瞄准军用高技术的发展前沿。这些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不但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而且带动了全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如果联系地看问题,国防建设虽然能促进经济建设,但最终又依赖于经济建设。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也就休想有强大的国防建设。

毛泽东认为,加强国防建设似乎也可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1 页。

指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

《迎接新的技术革命》上册,第 65 页。

参见《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现代化》,第 106 页。

法,是按老章程办事,即增加国防建设费用,如“一·五”期间,军政费用占全国预算全部支出的30%,其结果是减少经济建设投资,从长远看,恰恰是由于削弱经济建设而削弱了国防建设。另一种办法,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这种办法是“可靠的办法”。降低军政费用,抽出更多资金搞经济建设,表面看来,似乎对国防建设有所削弱;实际上恰恰相反,只有经济建设发展了,资金积累增加了,才能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建设。这符合于老子说的“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的道理。

毛泽东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风趣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并发挥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他依据世界形势的总的变化,作出“和平是可以争取的”新的论断,适时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大局这一新的论断。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接着指出:“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从方法论考察,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两条腿的问题。两者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8页。

之间,既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渗透的一面。为了使我们不致于成为独脚的跛子,而成为一个体魄健全的人,就必须学会正确地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真正学会用两条腿走路。

三 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首先从中央工业入手以加强综合国力,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便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自然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的经济运动所引向的目标。”列宁也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建成集中的经济,由中央统一领导的经济。”

然而,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工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否定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恰恰相反,两者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很清楚,中央和地方是互相联结,互相依存的,地方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快慢,不仅影响地方经济本身,而且影响到中央工业。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论十大关系》一文里提出要正确处理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的相互关系。

1956年初,他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十分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计委汇报说,现在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要求多办工厂。上海、天津要求发展较高级的产品,两广要求发展糖和纸,四川要求办甘蔗糖厂,云南、贵州要求发展食品工业、亚热带作物加工厂,地方不但有兴趣搞轻工业,而且也有兴趣搞重工业,如小煤厂、小电站、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8页。

化肥厂、生产和修理农具的小机械厂等。但他们有两个顾虑，一怕中央不准他们搞，二怕等工厂搞得象样子后被中央收走。又说：今后轻工业发展规模很大，想由中央两、三个部包办，无论如何是包不下来的，因此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就中央财权过大以致影响地方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的问题也作了专题汇报。

针对汇报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毛泽东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又说：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他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讲到这里，他着重指出：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

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一矛盾。他说：“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另一处，他还说过：二次大战后，欧洲小国林立，各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

搞一套,发展很快。中国自秦始皇以来有统一的好处,缺点是统得太死。据此,他建议中央应给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企业的收入应搞地方分成原则。

毛泽东把中央部门分作两类。有一类,它的领导一直可以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至于地方与地方的相互关系,如地方的上下级关系,也应仿照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办理,即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

毛泽东还从哲学方法论,即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相互联结方面来论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说过: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都有统一性和差别性。不能光有统一性,没有独立性,没有差别性。比如,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是独立性。有的人去散步,有的人去读书,有的人去吃饭,各人都有各人的独立性。如果一直把会开下去,无休止地开下去,那怎么行呢?那不是会把人开死吗?所以,每个生产单位,每个人都要有主动性,都要有一定的独立性,都要有同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作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毛泽东不只是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亲自领导过权力下放的实施。如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建议讨论决定对工业、财政、商业体制下放。同年9月,又一次督促放权,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史上有意义的尝试。只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左的指导思想作怪,1958年走了一个极端,来了个权力大下放,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将绝大部分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

给地方,造成了混乱。以后就不再注意扩大地方权力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中才开始真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四 大、中、小企业

正确处理大、中、小企业的关系,也是毛泽东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

大中型企业是指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小企业是指层次较低、技术和资金薄弱,只关系到某一方面生产或生活的非骨干企业,这两种企业也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 1958 年有很大的发展,他在举例时讲到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也讲到大中小企业、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讲到中国实现机械化时,又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全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后还会有的。怎么办?应当把机械化与半机械化结合起来,这里已萌发出了机械化大工业与半机械化及手工操作的小工业相结合的思想。在讲到兴修水利时,他又对比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排(排水)、大、国(由国家兴办);另一种方法是蓄(蓄水)、小、群(群众自办为主);实际上也是兴办水利工程中的大中小结合。并说前者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这里很明显地又是讲的水利工程中的大、中、小并举的思想。

在工业化过程中实行大、中、小并举,目的是为了调动现有企业潜力,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把各方面优势发挥出来,是符合辩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 489 页。

证法的。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说,必须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国40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在于我们从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建设。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而大中型项目就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项目数增加227个。五年中共有595个大中型项目全部建成并投入生产,这就大大增强了基础工业实力。不过,在重视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同时,也从未放松发展小企业。而是相反,在企业的布局上,贯彻了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说,既反对不分轻重缓急,妨碍重点工程建设的倾向,又反对单纯醉心于大企业建设、轻视中小企业建设的偏向。正象周恩来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只有把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很好地结合起来,国民经济才能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提出大、中、小并举指的是对工业发展模式的哲学思考,其核心内容是从实际出发,利用现有基础,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不是毫无目的、毫无计划地乱上纲目。同时,从我国工业发展现状看,由于原有的生产力低和技术基础薄弱,因而对于中小型企业地位与作用应当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在总体上,中小型企业不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骨干力量,也不能解决那些事关全局的关键问题,但它数量多、分布广,能够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能适应各种不同的技术层次,也能生产满足人民各种需要的多种产品,因而有较强的生命力。还有,从发展的眼光看,所谓土和小也不会永远如此。由小变大,由土到洋,是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因此,用先进技术武装的前提下,小企业也可以发展为现代化大企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32页。

五 实现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是推动人们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也就是说,“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前面说过,苏联在发展重工业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毛泽东对这一点也予以充分肯定。然而,后来的做法是重工业孤军突进,农、轻、重三者关系处理失当,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例如,农业产量长期没有明显提高,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这一后果又反馈于重工业,使其失去后劲,速度和规模也都受到限制,最后导致了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紧张。我国在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遇到了多搞些轻工业和多搞些重工业的争论,有的还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毛泽东对这些主张“小仁政”思想的人作了善意批评,主张在兼顾目前利益(改善人民生活)和长远利益(发展重工业和抗美援朝)的前提下重点要放在发展重工业上。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以后,他在总结了苏联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改善人民生活这一面强调得更多些,并且,对两者的关系概括得更加明确,即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他说:我们搞工业化,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你不关心人民的利益,让人民过分地束紧了裤带,重工业搞起来还得停。东欧的教训值得我们注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2页。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91页。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56—557页。

刘少奇也指出：波匈事件的教训之一，是苏联和东欧发展重工业中忽视了人民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又说：我们应遵照毛主席关于“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指示，不能把同人民的关系搞得太紧张。还指出：“我们应该注意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还高兴，还能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他还特别引述了周恩来、陈云关于左倾、右倾的精当的分析：究竟是左倾一点好，还是右倾一点好？看是什么右？如果是快慢的右，右一点是可以的，因为这和阶级斗争不同。对阶级敌人，你右了，人家就进来了。那个让不得，那个右是不许犯的。快一点慢一点不是失掉立场问题。因为慢一点，右一点，还有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辩证法思想的阐述还有若干；但举出这些，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四节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哲学意义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针，也是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得出的一个创造性结论。这个结论不仅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一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客观依据

什么是独立自主，就是认定一国的事情要依照自己的国情来办，靠自己国家的人民来办。社会主义建设也理当如此。这一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56—557页。

方针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为什么要提出独立自主原则，它的客观依据又是什么呢？

从哲学方法论说，正确理解事物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以及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这是最为直接的。

而非立足于外，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处理任何问题，都应把注意力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一基点上。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的差别。而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他还进一步指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毛泽东始终强调，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同样地，搞建设也必须依靠本国内部的力量。“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和基本前提。从这一认识出发，就必然得出各国的革命和建设最终要由各国人民群众来完成的这一基本结论。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号召应组织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

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1957年,毛泽东提出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又反复说明: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是党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独立自主的心理基础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与欺凌的民族一旦获得独立和解放之后一种普遍的心理态势。毛泽东正是这种自尊、自力、自强、自信等民族意识的杰出代表。他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敢于藐视强大的对手。他的名言是:“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力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一点,就是和我们有不同政见的人也是承认的。尼克松在回顾他在1972年第一次访华时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的情景。一位专家在此前曾预言,毛泽东要说的第一句话将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准备怎么帮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实际的谈话否定了这位专家的预测。毛泽东、周恩来在同尼克松会晤长达20小时中,中方没有提经济问题。这是因为,对中国领导人来说,“重要的不是美国的金钱而是美国的实力”。他还说:“中国人是个独立性极强的民族,对于外人企图影响或主宰他们的事务历来很有反感。”

如果说,在同敌对势力或者暂时处于统一战线之内的反动势力作斗争时坚持独立自主尚且不十分困难的话,那么,在同友邦相互交往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然而,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时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第253、269页。

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周恩来也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人民。说到斯大林,毛泽东曾称他“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他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确曾给了中国人民不少帮助。然而,也并不是他的每一个主张都符合实际,有些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这样一些主张,毛泽东未予采纳。邓小平谈到这一问题时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因为毛主席抵制了斯大林。中国党没有听他的,结果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方面,毛泽东对苏联的经验也是采取分析的态度。他在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回顾说: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同年5月18日又在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60年6月18日又在《十年总结》中进一步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上述可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哲学方法论说,还是就民族心理态势来说,以及从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原则都有其客观依据。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

二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 争取外援的相互关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但并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外国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取得外国的援助;恰恰相反,两者是有机统一和相反相成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是争取外援的基础和前提,而学习外国和争取外援又是反过来加强了自力更生的能力。

从哲学上说,事物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也是辩证统一的。前面说过,对一个具体事物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然而,从总体上说,外因的作用虽然是第二位的,但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对事物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可以促进或阻碍事物内部发展的成熟,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过程。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总方针,正是以对于内外因的辩证理解为其哲学根据。

学习外国和争取外援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同一件事的两个侧面。

毛泽东对待学习外国是态度十分鲜明的。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向外国学习时,他说:这个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点勇气的”。他不但要求我国在工业化起步时学外国,“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他并语重心长地说,即使一万年以后都要学习嘛!在此以前,他在听取重工业口的汇报时便说: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

“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学嘛！”在接待波兰统一党代表团时又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张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

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以及怎样去学，毛泽东也作了详尽的分析。

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他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又说：“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至于学习内容，应当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在社会科学方面，要学习“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在自然科学方面，鉴于我国在此方面落后的实际，应“特别努力向外国学习”。另外，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如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地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然而，他同时强调，在学习时应坚持分析，即“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更不能以风为准，时而西风派，时而北风派，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还强调说：“外国一切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争取外援是向外国学习的扩大和延伸。在这一方面，毛泽东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观点。还在建国前夕，他就曾声明：中国人民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作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4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742页。

生意。建国之初又重申：“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于生产和繁荣经济”。如人们所知，当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了包围、封锁等敌对政策，迫使我国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边，巩固和发展同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对我国政治与经济的友好合作，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苏联政府确定向中国提供优惠贷款和经济、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援助。陈云回忆说：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比方说，苏联造了两台机器，他们一台，我们一台。”毛泽东也说：“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

应当指出，当我们接受这些友好国家援助时，体现的仍然是平等互利的原则和精神。如中苏友好条约中明确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为了体现互利和互补，在中国接受苏联援助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对方一些援助。如两国签订的协议书中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五年间，中国向苏联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以作为苏联对华援助的补偿。

前面说过，在建国之后一段较长时期内，虽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经济文化往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6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00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8页。

受到了阻挡,但由于我们采取了打破封锁、争取外援的正确政策,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如在 60 年代以后,我国也从日本、原联邦德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电子等技术设备。1978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及中国同主要西方国家之间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及贸易往来、交流与合作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的前景。我们开始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先进技术设备,并陆续吸收了一些外资。1978 年中美建交前贸易额为零,1986 年达 73 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1986 年中美签订了官方科技合作议定书 27 个,中美合作项目达 500 多个,这一切都是党和毛泽东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学习外国、争取外援这一方针的重大胜利。

第十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推动改革开放;明确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对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两类矛盾进行再认识;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节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与发展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破除思想僵化,确立实践标准,就必须恢复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把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快更大一点,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一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遵循这条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我们党仍然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胜利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遗憾的是八大以后,由于不切实际地提出和实行了许多“左”的东西,特别是忽视了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造成了严重失误。如同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这就深切地告诉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才有胜利的保证。“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正是从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入手,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确立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科学地提出和解决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做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2页。

同上书,第133页。

同上书,第242页。

同上书,第133页。

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这些论述,鲜明地揭示了实事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而且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

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地概括和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党的十二大党章做了完整的表述,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二 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和解放思想密切联系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表明,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是一致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离开了实事求是,就无所谓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也就不可能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这一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只有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才能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说: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同上书,第64页。

同上书,第242页。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本)第7—8页。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才能果断地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两年的徘徊,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同批判“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密切联系的。粉碎“四人帮”,为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可是,“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却把毛泽东思想凝固化,成为妨碍工作重点转移,恢复党的思想路线的严重障碍。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践标准,其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开始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认为,进行这个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而阐明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破除“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内在统一性。表明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邓小平还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可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等对“两个凡是”所作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以及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1页。

同上书,第133页。

同上书,第133页。

的真理标准讨论,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人们从长期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对于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还是同破除思想僵化密切联系的。邓小平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因为“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思想僵化就是因循守旧,缺乏创新,一切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勇于创新。思想僵化归根结底是一种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同实事求是根本对立的,它窒息思想的创造性,使社会发展失去生机。因此,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必须破除思想僵化,决不能一切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应该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思想僵化,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结果。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3页。

同上书,第132页。

同上书,第109页。

三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新发展

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所有这些,都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而“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表明,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勇于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善于从实际出发,努力去开拓进取。因此,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都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

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时强调要开动脑筋。1992年邓小平在谈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时提出要换脑筋。从开动脑筋到换脑筋,标志着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新发展。要在国际风云变幻、竞争空前激烈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就必须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可以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1页。

同上书,第323页。

同上书,第165页。

那么,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呢?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排除各种干扰,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归根结底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除非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都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决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或者另搞一个什么中心。只有经济建设搞上去了,生产力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第二,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切不可丧失时机,迈不开发展的步子。近来,一些亚洲国家包括若干我们的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很快。因此,我国的国民经济要有一个积极发展的速度,慢了不行,停顿不前更不行。我们原来的基础很差,过去耽误的时间又太多了,现在还相当落后。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紧迫的、严峻的。如果对这种形势缺乏认识,不加倍努力,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可能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历史决定我们这一代和下几代中国人,必须警醒起来,团结一致,奋起直追,尽快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不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第三,要敢于创,敢于试,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要大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快一点。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错了就及时纠正。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包括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等等,都是解放思想,敢于创新,勇于试验的结果。要在新的形势下,加快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发扬敢于闯、敢于试的探索精神,而不能循规蹈矩,畏缩不前。

第四,要破除凡事拘泥于“姓资姓社”的思维模式。改革开放

迈不开步子的要害是“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认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三条标准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核心,不论是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只要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说到底,都不是社会主义。这进一步表明了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的重要性。表明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

第五,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当今世界,是一个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立于世界之外,任何一个国家要获得发展,都必须在相互交往中吸收和借鉴他国所创造的先进经验。如果拒绝交往,把自己封闭起来,其结局只能是落后。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只有在对外开放中,不断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国才可能获得较快地发展。

第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的表现主要是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认为搞改革开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右的表现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无论是“左”和右,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党的历史上“左”

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由于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有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以迷惑作用,这就特别需要注意防止“左”的干扰。

第二节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实践的哲学。理论同实践密切结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在于创造性地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与发展的最突出的体现。

一 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 和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

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遵循它的普遍规律,又要切合各国的具体国情。列宁曾经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一个什么统一的模式,也没有一个先验的公式,而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他强调“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

《列宁选集》第3卷,第113页。

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要具体分析本国实际,列宁深刻分析了俄国国情的特殊性,“一方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财政资本主义。” 俄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特殊道路,他认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国发展的具体道路,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充满着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每一事物的矛盾都有它的特殊性,具有不同的特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正确地把握这一问题,是理解矛盾规律,把握辩证法的关键。它提供了认识矛盾与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具有共同的本质和特点。但是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必然形成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具体形式和特征。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和普遍特点,不是独立地存在的,而是寓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的特殊性之中,并通过后者表现出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列宁全集》第13卷,第419页。

《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

会主义(普遍本质)和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就是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就是把反映社会主义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二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曲折历程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建立了新中国。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起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对如何解决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1956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论十大关系》强调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走自己的路的思想,阐述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如正确处理农轻重比例关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在中央的领导下,扩大地方的权力,使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正确处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要学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长处等等。《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规定了主要任务和基本方针。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点应当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八大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八大还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等等。很明显,党的八大在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根据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方针,较之《论十大关系》又前进了一步。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一系列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方法。在这一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向自然开战,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途径。这些思想都是对八大路线的补充和发挥。

但是,由于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再加上波匈事件等国际环境的影响,这些正确的思想和方针政策,没有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贯彻。相反,却出现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1959年的“反右倾”等“左”的错误。1960年,党提出了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和笔记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思想。如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共产风;不能超越阶段,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反对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综合平衡,两条腿走路,开展技术革命,等等。这些思想的提出,对于纠正当时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总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未

能得到纠正,最终还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从而中断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的确立和全面实践,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对这一基本结论的揭示和概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体现了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肯定了我们党在科学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3页。

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的科学理论观点,概括为12个方面,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国前进的轨道。

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十四年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指出这一理论包括的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强调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等等,党的十四大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宝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三 具体分析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具体地分析中国国情。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而且要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和具体道路,具体分析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

具体地分析中国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程。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既不能把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绝对化、凝固化,又不能简单地从其它国家的经验出发,照搬别国模式,而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勇于开拓,勇于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0、149、131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2页。

索,勇于创新。

总起来看,国情是指反映国家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社会性质、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等等的综合范畴。要从这一系列复杂的客观实际中认清和把握中国国情,需要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对这些互相联系的客观实际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真正做到从本质上把握中国国情。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几十年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困,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从政治上看,我国建立了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政治体制方面还有许多急待克服的弊端,官僚主义、腐败现象还很严重,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这就决定了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从教育、科学文化上看,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的说还都比较落后,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下大决心,化大气力,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把教育、科学、文化搞上去,真正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建立,但还不完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资源丰富,但许多还尚待开发,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科学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政治民主化的任务艰巨,这些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种国情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讲究实效,艰苦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经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大力发展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人的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定了我们必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我们必须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一句话,决定了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是改革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

一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改革的理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研究了我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自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坚持用矛盾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下,运用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指导各个方面的改革。并且结合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深化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如同邓小平所说:“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改革的理论依据,它决定改革的必然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贯穿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这一基本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有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例外。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和轮廓作过预见和设想,但是他们从没有把这种预见、设想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强调“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生活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则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尖锐批评了那种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模式观点,明确指出,“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革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有待改造的东西还很多。”这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和改革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只是标志社会主义在其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列宁选集》第4卷,第557页。

自身基础上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开始,它要经历一个逐步完善和成熟的长期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改革逐步实现的。

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体现,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是改革的理论基础。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运用、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首先,把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一系列改革,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大大深化了。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指出,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这种革命和推翻剥削制度不同,它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特点和规律。

其次,运用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开展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广大农村普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除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发展到城市,进入了新的阶段。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适应的僵化模式,其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才能建立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再次,运用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抓住上层建筑中最核心的部分,充分论述了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入手,以推动整个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尖锐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要求全党高度重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改革,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反复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

最后,党中央十分强调要进行全面改革,强调各个方面的改革要协调一致,配套进行。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改革,标志着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系统形成。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与中国改革的伟大实践,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二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有人认为没有矛盾,有人认为可以找到矛盾,毛泽东的回答是,不是可以找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斯大林认为是“完全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7、293、301页。

适合”的。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的“完全适合论”，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们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互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由于有相适应的一面，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又由于有相矛盾的一面，就决定了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在毛泽东的论述中，内在地蕴含了这两个方面的含义。看不到前者，就可能导致否定社会主义。而看不到后者，就不可能深刻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应当指出，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相适应的这一方面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因此，邓小平不仅一般地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且振聋发聩地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对我们全面认识改革的性质，推进改革的发展，就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那么，如何认识改革是一场革命呢？

首先，改革“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所谓体制，主要是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经济体制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经济管理体制，主要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对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巩固新生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就越来越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2页。

暴露和明显,主要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地妨碍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由于在农村强调一大二公,采取了急于向人民公社过渡,限制和取消自留地等“左”的政策,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长期徘徊不前。因此,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从政治体制来看,我国原有政治体制中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种体制对于迅速地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这种体制弊端也就逐渐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现象,严重地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改革就是对体制的革命。

其次,“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改革不仅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且要求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要取得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1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5页。

展,必须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方面和因素进行改革,改革不是对旧体制某一方面的修修补补,而是全面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而且管理方式和活动方式,都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改革是一场革命。

再次,改革还是对传统观念的革命。改革要求解放思想,变革思维方式,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冲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解,冲破对社会主义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因此,改革是一场革命。

第四节 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

正确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确立了对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真正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进一步阐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

一 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认识是一个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一个关系到党采取什么政治战略和经济建设方针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反复的过程。

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

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新中国初创时期，尽管民主革命的扫尾任务，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纷繁复杂，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但是，当时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在建国的头七年里，我们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两个转变，一是，头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实现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转变，即通过三年恢复时期的努力，摧毁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条件。二是，在后四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即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阶级剥削的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并且顺利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即体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八大的分析是正确的，当然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表述方法是不确切的，它会给人一种社会制度已是完美无缺，不需要改革的错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向自然界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页。

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957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先后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党员干部会上讲话,阐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在一篇讲话提纲中指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遗憾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1957年夏季那场反右派运动使毛泽东的思路发生了偏差,也使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偏差。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工作重心不能真正转移,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1958年以后,随着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不断发展,经济上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也不断滋长,并且在1958年下半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展到顶峰。以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和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1959年又错误地开展批判彭德怀的“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1960年我国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可是1962年在北戴河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并且提出了以后被称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理论,最终导致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蒙受了一场历史灾难。

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历经曲折,从 1956 年的八大到 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时二十多年,几经反复。八大虽然提出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但是由于“左”的错误而没能在实践中真正落实。1964 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提出了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可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无法贯彻。1975 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真正落实,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直到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终于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从而在二十多年的曲折之后,决定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1978 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明确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 年 3 月,邓小平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and 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0 年 1 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搞四个现代化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68、205 页。

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作了一段精辟概括，“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深刻总结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在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我们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切不可重犯历史错误。

二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过去我们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他还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的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4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52—53、116、52、15、116、53页。

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要体现在所有制、分配关系等方面,也应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在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之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对于社会发展来说,生产力是客观的,相对易于测定的度量指标。如果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标准,抽象地空谈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原则,就难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主观随意性。那末,如何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一) 要以对国际国内新情况的新认识为前提。邓小平指出:“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入落后不行。现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二) 要建立在历史经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但是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主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3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3页。

要原因是“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步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整整二十年，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因此，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三）要有新的立足点和新的认识视角。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消灭贫穷，创造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以后，邓小平又多次重申了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1987年4月，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1987年10月，邓小平又指出：“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就中国来说，首先是摆脱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明，没有什么抽象的空谈的社会主义。只有国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2—103、52页。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第409、411页。

1987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摆脱贫困,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才是真正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很不发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一些地区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有的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困,力争到本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个世纪中叶,使我国在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能具有吸引力。

(四)要从根本上确立生产力标准。发展生产力,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检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这一思想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马克思也曾经十分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是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时说过,“资本主义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流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主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

义制度优越,它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最重要的标志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它创造了过去从来未有过的新的社会生产力。

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归根结底,也要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为明确和深入地阐发了生产力标准问题。所有这些论述和思想,体现了对生产力标准问题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五)要坚信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不仅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是解放生产力。“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只有通过改革,革除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突破落后传统观念的束缚,才能解放生产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得到更快地发展。改革体制与摆脱贫困,是中国改革面临的双重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五节 社会主义现阶段两类 社会矛盾的再认识

正确认识和处理现阶段我国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社会矛盾问题,曾经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但是也曾产生了长时期的严重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和对我国现阶段两类社会矛盾的再认识,揭示了社会主义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规律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表现,阐述了两手抓的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理论。

一 阶级斗争问题的再认识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揭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分析的失误,毛泽东在实践中违背了这些原则,先是在局部问题上,以后是在全局性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实事求是地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这一论断建立在科学基础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之后,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呢?从形态上看,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从对象看,它已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主要是形形色色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从范围来看,已不是时时处处都存在,而是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从作用上看,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采取的方式看,已不需要采取过去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已不是经常处于激烈状态,虽然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但总的趋势是通过波浪起伏,逐步走向缓和、消亡。

因此,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总之,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是当前我国一切工作的中心,开展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决不可搞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能搞什么以反和平演变为主题。而应当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集中精力把经济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69、155、330—331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

建设搞上去。

二 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特点

邓小平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这表明人民内部矛盾是改革开放中必然存在的，并且会具有同历史上不同的形式。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一些新的表现和新的特点，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领域中：

一是经济领域。经济利益公开化、表面化，经济利益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最重要的特点。邓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同样，改革也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过去把人民内部矛盾只看作是政治范畴、思想范畴，很少从经济利益角度去着眼，这是一种片面性。改革使物质利益矛盾突出出来，它具体表现为多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矛盾，不同经济集团、经济部门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正当利益、合法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不合法利益的矛盾，劳动者先富与后富，富裕与贫困之间的矛盾，经济水平发展不一致的各个地区，比如沿海与内地、特区与其它地区之间的矛盾等等。

二是政治领域。现阶段政治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各阶层，诸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个体户、其它劳动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2、136页。

者、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之间的矛盾,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矛盾,民主与集中的矛盾,人民群众同官僚主义的矛盾,等等。

三是思想文化领域。现阶段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同资本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之间的矛盾,文艺、理论、学术界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之间的矛盾,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新的思想观念与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之间的矛盾,等等。

解决这些矛盾,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对于经济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当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处理好一部分人先富与共同富裕,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的关系。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两极分化,克服分配不公,脑体倒挂,消除官倒,消除腐败,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给人民看得见的实惠,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

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增加政治透明度,使人民真正享有参政权、发言权、决策权,真正使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形成生动活泼、团结和谐的政治局面。防止与克服个人崇拜、家长制、终身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官僚主义、特权和腐败。

对于思想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提倡自由探索,鼓励学术争鸣,变革陈旧的思想观念,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由于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具有一些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新表现和新特点,因此,处理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注意运用多种综合手段。这些手段有:第一,经济手段,例如价格、税收、工资、奖金等经济杠杆;第二,法律手段,即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包括经济矛盾在内的人民内部矛盾;第三,行政手段,即用必要的行政命令、

条例来管理社会生活;第四,思想工作,要关心群众生活,重视群众利益,做好疏导工作;第五,协商对话,领导和群众直接见面,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及时解决问题。

三 利益矛盾与两类矛盾

在上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新特点之中,利益矛盾,特别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与突出,这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特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同难以满足这一需要的经济文化现实的矛盾。这一矛盾通过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表现出来。利益矛盾是划分两类矛盾的依据和着眼点。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敌我矛盾,就是敌对阶级之间根本利益对立的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即由具体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因此可以说,利益矛盾是构成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

应当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多层次的利益矛盾复合体中,利益集团矛盾是当前利益矛盾的焦点,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所谓利益集团,就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由有共同的境遇、共同的利害、共同的追求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群体。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大致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乡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党政干部等利益集团。就利益集团的构成来看,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并存具有客观性,不同的利益追求和社会理想,是不同利益集团并存的客观根据。从利益集团内部来看,利益集团具有凝聚性,其凝聚力的大小是和该集团成员的认同感和受益度成正比的。从一利益集团与其它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来看,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竞争中,不同的

利益集团总是企图优先满足自身的利益,而各个利益集团的目标、方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这就必然发生磨擦与冲突。因此必须坚持顾全大局的原则,互相协商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分配的原则,瞻前顾后的原则,精神文明的原则,民主法制的原则,思想教育的原则,加强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充分估计到各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对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努力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揭示,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两类矛盾理论也存在一些缺陷,这除了理论界已经普遍论及的诸如正式发表时加进了一些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与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内容,对民主法制重视不够,论述很少等等之外,就是忽视对物质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分析与研究。这固然与历史条件有关,即当时物质利益矛盾还不够突出,利益集团也不明显。但是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重心是放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上的,所以特别强调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而对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研究不够,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产生、形成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协调和解决基本没有涉及,这一理论缺陷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两类矛盾理论应当在新的实践中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

改革的实质是对人们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呈现出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和利益冲突公开化的局面。面对着利益矛盾特别是利益集团矛盾冲突的新格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研究的重心和视角应当来个转换,即将重心转移到考察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考察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来。这不仅是研究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视角,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研究的新课题。

第六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在经济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在政治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在思想文化上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对于全面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也必然提上议事日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成功。”“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因此“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领域的改革”。只有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两者协调配套,同时相应进行其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3、140、138、137页。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第428页。

领域的改革,改革才能取得重大进展和成果。

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那么,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文献。这些年来,围绕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邓小平阐述了一系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逐步形成了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和蓝图。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方面:

第一,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实行党政分开。

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党政不分,是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首要弊端。只有切实克服权力过分集中,才能真正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尖锐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实行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也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关键。邓小平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党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能直接参与或干预政治事务的管理。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就要理顺党政关系,切实转变党和政府的工作职能。“党干预太多,就会妨碍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9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0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5页。

第二,反对与克服官僚主义。

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必须改革体制,从制度建设上着眼。只有克服官僚主义,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第三,权力下放。

邓小平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下放权力涉及到正确处理党和国家的中央机关与地方机构之间,地方各级机构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各级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既要保证在宏观上的有效控制,又要扩大地方的权力,让地方有更多的积极性。“我们这些年来搞改革,有一条经验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出权力下放。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工矿企业也要权力下放,下放到基层,调动工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即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精简机构。

实行党政分开,反对官僚主义,权力下放,都需要精简机构。实行机构改革,要从转变职能出发,改革党和政府机构,撤销重叠机构,减少冗员,提高效率。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87—288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0、147页。

第五,改革干部管理制度。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干部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只有切实改革干部管理制度,才能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干部队伍充满朝气和活力。

第六,健全民主与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健全民主与法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邓小平说:“民主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由于我们长期缺少法治,人治的传统有很大影响,因而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这种以言代法,人治代替法制的状况,必须切实加以纠正和改变。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由于领导层和领导者个人的意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人民的意志,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少数领导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不加限制地按照自己个人的意志滥用权力,做出违反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事。因此,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第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政治体制,必须彻底肃清封建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4、299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6页。

主义残余的影响。邓小平指出：“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历史 and 现实生活表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家长制、一言堂、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种种特权现象和腐败现象，同封建主义影响有着直接关系。改革政治体制，建设民主政治，是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基本途径。正如邓小平所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第八，关键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改革政治体制，关键是从制度上着眼，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这一方面是同资本主义制度比较而言的，“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人民真正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成为人们现实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这也是总结我国长期历史经验教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邓小平看来，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5、296、293、293页。

党对国家和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因此,“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

二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1979年9月,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全面论述,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回顾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状况,突出地强调了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适应我国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326页。

纲领性文献。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的新要求。

“文明”一词是历史的范畴,指的是人和社会的进步状态。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物质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则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精神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中,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对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没有一定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发展就要遭到破坏和窒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而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工程,只有十亿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主动积极地投身现代化建设,才能克服困难,不断前进。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引导人们把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二,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也是体现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必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三,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离开了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基础;而离开了精神文明建设,

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灵魂。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十分重视和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着重指出,这几年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其地位来看,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全党同志必须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须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必须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其内容来看,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3页。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80页。

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的论述,明确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强调了理想和纪律教育在思想建设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它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其根本任务来看,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其基本属性来说,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有文化是为了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实质,从而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考虑。

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共同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高度的文化修养、智力水平和审美情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26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0、15页。

趣，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振奋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结 束 语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历史地位,这是客观历史发展形成的。它既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也是中华民族哲学发展中的伟大革命变革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我们应当正确地阐明它,既要反对过分拔高,又要反对肆意贬低,而应当客观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作出科学的评价。因此,要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必须遵循继承和发展、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阐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作的独特贡献以及它的国际上所引起的重大影响,阐明它的产生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阐明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作用。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贡献

列宁曾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以来,已经历了 100 多年的历史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它的内容。列宁在新的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时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50 页。

代主流,对革命实践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增添了许多新东西,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备的科学的 worldview,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不是什么人凭空想象、自吹自封的结果,而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论断,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本人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哲学家。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优秀的杰出的哲学思想,不愧为马克思主义哲苑中绚丽多采的奇葩。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它体现了马克思学说发展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他说,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由于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所以,他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这就指明了20世纪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亚洲革命风暴、人民革命斗争相结合,必然揭开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为马克思学说增添新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适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体现了这个伟大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以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7、440页。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是多方面的,可概括说明如下。在唯物论方面,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提出著名的“实事求是”原则,深刻发挥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方面,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在辩证法方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上,集中论述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提出了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新思想;在唯物历史观方面,着重阐明了以社会基本矛盾为主题的历史唯物论,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辩证自然观方面,从辩证法的彻底性上,指出了物质内在的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在哲学解放方面,从哲学的历史使命上,多次指出要使哲学从课堂上和哲学家的手中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等等。此外,在实际运用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辩证法、党的建设辩证法、统一战线辩证法、军事辩证法、思想政治和文化工作辩证法、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等,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独创性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整体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鲜艳夺目的奇葩。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这里列举一些不完全的材料加以说明。

1950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评价《实践论》说:“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还说:“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并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

1951年,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第74期(中文版)上发表评价《实践论》的文章时说:这篇著作“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篇著作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验主义的

不可调和性”。“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晰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重要的资产”。

1952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10期上,发表署名文章,对《矛盾论》作了很高的评价。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的研究。”

1954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6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和主要的理论著作,明确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宝库的丰富,对于一切国际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的理论的和实际的益处。”

1955年,苏联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说:《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

1958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了高度评价。教科书说:“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篇杰出的、深刻的、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卓越贡献。”并在书中多处引用了《矛盾论》、《实践论》的重要论述。

在日本,有许多学者对《实践论》、《矛盾论》作了很多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松村一人。1952年,他在《思想》杂志上接连发表了《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以矛盾论为中心》三篇文章,来评价毛泽东哲学思想。他指出:毛泽东的“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毛泽东哲学“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

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且有中国民族形式,而且具有国际的意义”。

在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康福斯,在他 50 年代出版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一书的日文版序言中说:“由于中国革命及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增写了伟大的新的篇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说:《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完备的探讨”。

1961 年,南斯拉夫的普·弗兰尼茨基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史》一书,他在书中介绍了《实践论》、《矛盾论》的基本观点,指出:在《实践论》、《矛盾论》里,“卓越的辩证法家,无与伦比的革命实践家和战略家的思想是明显的”。由于他的这本著作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史专著,所以,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写入马克思主义史的学者。

6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理论家都纷纷撰文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指导作用。有的说《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是他们党的教科书,是党内思想建设的基本教材,是“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是“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1966 年 6 月,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机关报《先锋报》发表文章说:“每一个共产党人联系生活 and 实践,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将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巨大发展。”

60、70 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研究毛泽东的热潮。他们组织毛泽东思想学习会、讲习会和研究会,定期组织学习和研究活动。日本和欧美的一些研究机关不惜重金搜集和出版毛泽东的著作。70 年代初,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 10 卷本的《毛泽东集》(1917—1949),1983 年又出版了 5 卷《毛泽东补卷》和 1 卷著作年表。1974 年,美国的施拉姆编辑出版了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文集。1979 年,西德编辑出版了解放以后

的毛泽东著作(7卷本),在日本出版了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美国在著名的学者施拉姆主持下,正在编译出版一部多达50至60卷的《毛泽东全集》。在60、70年代,日本、欧美出版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据不完整的统计,从50年代以来海外出版的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英文著作近200种。这说明,尽管人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目的不同,但它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欧美的学者中引起了重大的反响。1964年,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在《中国季刊》第19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一文,他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而他关于矛盾的差别性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特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的辩证法来说都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的”。还说:《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它们都是既短小而又简洁,既丰富而又透辟,更主要的是那样完整和明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只能把它同马克思那篇有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来相提并论,这篇导言阐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实质”。

继60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中,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肆意歪曲、贬低和攻击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后,毛泽东逝世不久,国际上刮起了一股“非毛”的歪风。由于“非毛”不得人心,这股风刮了一阵子后也就渐渐平息下来了。国际上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注意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并没有消灭。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弗朗西斯·苏说:“不管你个人对毛泽东有什么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确实,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史上,因而在世界现代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还说:“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

的是对中国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有所了解”。1984年,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说:“今天,虽然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已不如60年代那么巨大,但并没有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消退”。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美国《新闻周刊》在《最后一位巨人》一文中说:毛泽东的一生,“使他的国家和整个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评价对他比对当前任何其他世界领袖更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国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通过在它指导下的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且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美国基辛格博士就曾说过:“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人物”。实践表明,毛泽东哲学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二 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不仅标志着中国一切旧哲学的解体 and 终结,而且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变革和划时代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历来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此,对待它们必须坚持历史的和发展的观点,做到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方针,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兼收并蓄,而是要研究它、扬弃它和发展它。毛泽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实现了中国哲学发展中的伟大革命。

关于认识论方面。知行关系问题曾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古代到现代,许多哲学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先后提出过: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行难知易,知重行轻、行重知轻,等等。但是,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出科学的回答。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哲学时,写作了《实践论》,全面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1950年12月,《实践论》重新发表时,毛泽东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当时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称赞《实践论》的文章,其中冯友兰的《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一文,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因为,这篇文章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认为《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1964年8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指出:“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贄)、王船山(夫之)、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孙中山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提出了“知难行易”说,主张在行中求知,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最后还是陷入了唯心主义。

《实践论》正是对中国2000多年来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批判总结和革命改造,使之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融为一体,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唯心论、机械论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这就赋予

了古老的知行学说以新的生命。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精辟地阐明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历史发展表明,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是中国哲学知行学说发展的科学形态和高级阶段。

关于辩证法方面。早在 2000 多年前,中国传统哲学中就存在着以《老子》和《周易》为代表的两大朴素辩证法思想系统。在《老子》中,承认对立面相互依存的普遍性,强调对立面中柔弱方面的决定作用,提出一套以贵柔为特征的消极辩证法思想。而《周易》,则认为万物均有阴阳两极,强调对立面的矛盾与转化倡导自强不息为特点的积极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后来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发展,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总的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中,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承认客观事物是互相对立和互相转化的,但其中也存在着形而上学因素;同时,又由于没有把方法论和宇宙观紧密联系起来,致使不少辩证法思想未能摆脱唯心主义体系的桎梏。毛泽东指出,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由于具有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没有也不可能看到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性。他强调说,仅仅承认事物对立普遍性和互相转化的必然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指出矛盾对立面相互转化是有条件的。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如果否定条件,就会导致相对主义,以致陷入自然命定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中辩证法思想的发展,系统地阐明了事物的矛盾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创立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论证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6—297 页。

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关于哲学体系方面。毛泽东具体地评价许多中国传统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命题。这方面的例证颇多,1939年他写给陈伯达、张闻天的三封信具有代表性。在这些信中,毛泽东深刻地评述了孔子、墨子的哲学思想和一些重要的哲学命题。

关于对孔子的哲学属性,毛泽东作了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他在评论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时说: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句话“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接着,他又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这就是说,在孔子的观念论体系中,包含有一些片面的真理性,这就要求具体分析。在谈到孔子的“正名”主张时,毛泽东指出,孔子的“正名”和我们主张“正名”有原则的区别:“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同时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他还指出,孔子在认识论和社会论上基本是形而上学的,但还有它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关于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他还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和道德范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地位。

关于孔墨的中庸思想,毛泽东也作了分析,阐述了孔墨关于中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148页。

庸思想的异同。毛泽东认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而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而“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认为,这个思想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毛泽东在赋予“中庸”以新的解释基础上,进一步对孔墨“中庸”观念的异同作了具体的比较。在此不再赘述。

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单纯传播不同,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遗产的科学的 worldview 和方法论,它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标志着中国哲学从传统哲学向新哲学的飞跃,它不仅体现了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的统一。因此,无论就其思想层次上,还是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传统哲学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它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否定。其主要区别大致如下:

其一,两者的宇宙观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宇宙观是唯心观念论、机械唯物论或二元论,基本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宇宙观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

其二,两者的社会作用不同。在中国近现代,作为封建社会产物的传统哲学已经衰微,其性质基本上是保守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唯一正确的哲学思想武器。

其三,两者的历史地位不同。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中,存在着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含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派流)和无产阶级的三种哲学思想的激烈斗争,其中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始终构成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主线,而且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由此可见,自从毛泽东思想产生以后,就宣告了中国旧哲学的终结,才有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志着中国哲学发展的伟大革命。因此,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什么“儒家哲学”“孔孟哲学”等等,都是违背事实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富于辩证思维的民族,其优秀的哲学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既深且广。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种哲学理论像毛泽东哲学思想那样,对劳动人民的觉醒,对中国社会的变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发挥过如此远大的作用。所以能够如此,因为它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哲学基础

科学地确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指明它的伟大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中国建设事业能否胜利发展的根本问题,关系到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邓小平也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0—51页。

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事实表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也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正确路线、方针和战略的决策,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并夺取了一个个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正确运用和发展。因此,它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灵魂,是联系各个组成部分的纽带,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运用和展开。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哲学理论和方法,即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理论的坚实哲学基础。我们要永远坚持,不断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的结晶,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思想武器。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才形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性地解决了三条道路问题。一是,确立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其特点是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二是,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特点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采取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实行逐步过渡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民族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8—159页。

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三是,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特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贯穿于这三条道路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并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思想保证。

四 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武器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在第三世界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认为,毛泽东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毛泽东“丰富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理论,现在和将来都是评论分析人类历史、政治和社会大事的可靠准则”。有的说,他们事业的成功得益于《毛泽东选集》的教导;有的说,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发了他们国家制定了革命纲领;有的发表文章说:“事实上,当代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战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理论和著作,才发现马列主义的。正因如此,他才被看作既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又是世界革命的导师。”1967年,英国出版了《在东方的失败·毛泽东的战争成绩》一书,作者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的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对世界上一些地区成功地领导了革命战争的人的思想有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影响着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那些被迫走向革命道路的领导人的思想。因此,“不懂毛泽东的理论的意义,过去导致了法国人在印支的失败,现在还导致美国人在越南的失败,而且看来还要导致英国军队在东方遭受类似的失败,并且有可能使非洲和拉丁美洲吞下类似这种无知的苦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科学真理,它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所启迪,并有着普遍意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一个落后的国家走上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珍贵经验;在于它提供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对不发达国家来说,不一定都适用,那末,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都是普遍适用的,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当然,学习和运用中国的经验,决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就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这就指明了中国革命最根本的经验,也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神髓。

后 记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神髓》一书,是作者近年来从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本书的编写,是以毛泽东的著作为依据,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而进行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成果。本书是作者在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一书的新版本。

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和结构作了新的探索。在体系上,本书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为灵魂,并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既阐明它的基本理论,又阐明它在各个领域的多方面展开,并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结构上,本书共分三篇十一章,一是总论篇,二是基本理论篇,三是实际运用篇。我们力图通过这样的叙述,来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性,比较系统真实地反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和中国化的特色。

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具有严密的科学体系。以我们的学识和水平来说,要对它作出完整地、准确地阐述,难度是相当大的。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只是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和探索。这种探索是否成功,当然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本书由宋一秀主编,各部分的执笔人是:宋一秀(前言、第一章、结束语);冯国瑞(第二、四章);陈葆华(第三章);陈战难(第六、七、八章);张文儒(第九、十章);郭建宁(第五、十一章)。全书由宋

一秀统改、定稿。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因此,本书中存在的不足和不当之处,甚至挂一漏万的地方,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作 者

1993年1月